

引 言

朱可夫元帅，是杰出的军事家、伟大的战略家，是苏军历史上的传奇式的英雄。曾荣获四次苏联英雄称号。他仅用 25 年的时间就从一名普通的士兵成长为名垂军史的伟大元帅，走过了光辉的战斗历程，在世界战争史上写下了不朽的篇章。

战争风云变幻无穷，1941 年 6 月希特勒背信弃义，按“巴巴罗萨计划”发兵苏联，进行突然袭击，一夜之间，突破苏联千里防线，使苏联边防部队节节败退。法西斯军队长驱直入，如入无人之地，直逼苏联首都莫斯科，苏军处于战略退却的不利形势之中。

在这生死攸关的紧要关头，最高统帅斯大林，召见身为苏军总参谋长的朱可夫，让他以共产党员党性作保，问他：“莫斯科能否保住？”朱可夫临危不惧，信心百倍地做出铿锵的回答：“一定能保住”斯大林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苏联军队在统帅的英明领导下，终于顶住了希特勒的“闪击战”，由战略退却转入战略防御，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尽管在战争初期，丧失了半壁江山、大片土地，开始反攻后，仅用一年多时间，就一鼓作气，肃清了苏联境内的希特勒残兵败将，势如秋风扫落叶，横扫五千里，尔后挥师南下，乘胜追击，一举解放东欧各国，最后攻克柏林，直捣希特勒老巢，将胜利的红旗插上帝国大厦，与开辟第二战场的盟军，在易北河会师，迫使德国无条件投降，结束这场罪恶的战争，拯救亿万人民于水火之中，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作为苏军最高统帅部的副统帅、重大战役的组织者和五个主攻方向上的方面军司令员的朱可夫，当然是功不可没的，里应受到世人有口皆碑的称赞。

记得，1945 年 5 月 25 日在为战胜德国法西斯而举行庆功宴上，斯大林曾有过这样一段满怀深情的演说，给予朱可夫高度评价：“祖国和党永远不会忘记苏军指挥员在我们的民族保卫战中起的作用。所有这些打了胜仗，拯救了祖国的将领们的名字，将被永远镌刻在历史的丰碑上流芳百世。这些战场之中，有一个战场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它就是苏联首都莫斯科会战的战场。而朱可夫同志的名字，作为胜利的象征，将永不分离地同这个战场联系在一起。”

翻开二战的历史，我们便清楚地看到上述评价对朱可夫而言是当之无愧的。他不仅在莫斯科会战中表现出色，而且多次临危受命奔赴最艰苦和最关键的战场，去协调、指挥重大战役。在历次战役中，他都表现出一个胸有成竹的战略家最为宝贵的冷静的头脑、准确的判断力和创造性的作战指挥艺术，特别是继承和发扬了苏联著名的战略家图哈切夫斯基元帅等创造的大纵深战役理论和灵活动用坦克等先进技术兵器，组织快速集群协同作战的高超理论，朱可夫元帅从来不墨守成规，他叱咤风云、纵横捭阖，在战争中导演出一幕又一幕惊心动魄、可歌可泣的伟大战略史诗，令世界各国军史学家敬佩和倾倒。

古往今来，凡功盖主者，都难逃厄运。朱可夫在战后，由于战功显赫，盛名夺人，触犯了斯大林的淫威，因此，历经坎坷。攻战柏林后，他曾担任首任驻德苏军总司令和德国苏占区最高行政长官。不久，便奉调回国，遭到斯大林的贬谪，开始派到敖德萨军区，接着又有人告密诬陷，进一步被迫害

到乌拉尔军分区担任更低的职务，由顶峰坠入深谷。实际上是被软禁起来，不准他携带家眷，孑身一人，受克格勃的严密监视，失去了人身自由。一直到 1953 年 3 月斯大林死后他才恢复自由，铲除克格勃头子、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贝利亚以后，他才彻底解放，出任国防部长。可惜好景不长。

作为一个军事家，朱可夫具有驾驭战争的高超本领和大将风度。可是在复杂多变的政治风浪中，他就显得力不从心。1957 年 6 月，朱可夫元帅真心实意地支持摇摇欲坠的赫鲁晓夫，击败了马林科夫集团，使赫鲁晓夫保住了乌纱帽和第一书记的宝座。当时，赫鲁晓夫对朱可夫倍加赞扬，并授予他第四枚苏联英雄奖章。使他成为获此殊荣的惟一统帅，到处是一片赞扬声。

朱可夫元帅万万没有想到，在这一片贺彩声中早已开始孕育着杀机，浓浓的乌云正在他头顶上密集。厄运正在逼近。时隔三月，到 1957 年 10 月，赫鲁晓夫这位心毒手狠的政客，便以莫须有的罪名免去了朱可夫党内外一切职务，铲除了他心头上的一个“隐患”。

朱可夫第二次遭到暗算后，一直到他被迫解甲归田，他利用有生之年，勤奋笔耕，撰写出长达 60 万字的翔实回忆录，澄清了一切不实之词，客观公正地评价了走过的战斗历史，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1964 年赫鲁晓夫下台，朱可夫再次复出，到 1966 年才正式恢复名誉。这位南征北战、席不暇暖的统帅于 1974 年 6 月

第一章 苦难中成长

1 鞋匠之子

1896年12月2日，在莫斯科西南300公里的卡卢加省斯特列尔科夫村的一间破旧茅草屋里诞生了一个男婴，他就是后来成长为叱咤风云、驰名世界的战争之神朱可夫元帅。对朱可夫的父亲，这个五十开外的皮鞋匠康斯坦丁·安德列维奇·朱可夫来讲，老年得子自然是件大喜事，但朱可夫一家生活在贫困之中，添人进口也给他带来忧虑。

朱可夫的父亲康斯坦丁是个苦命人。据说，他生下三个月时被亲生母亲遗弃，丢在孤儿院门口，身上夹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我儿子名叫康斯坦丁，请好心人收养！”

就这样，康斯坦丁在孤儿院长到两岁，被一位名叫安努什卡·朱可娃的寡妇领养。从此他有了家，也随着养母姓了朱可夫。朱可娃有间破旧的房子，墙壁和屋顶长满绿苔和青草。他们母子俩相依为命，过着清贫的生活。

朱可夫的父亲是个不幸的人，他刚满八岁的时候，他的养母就去世了。为了维持生计，年幼的康斯坦丁被迫到乌戈德制鞋厂一个鞋匠那里当学徒。当时在俄罗斯，想学手艺谈何容易。康斯坦丁说是当学徒，实际上主要是干家务活，替老板抱孩子、喂牛、打扫卫生。三年“满师”后，他四处找活干，几经周折，终于在莫斯科的维义斯制鞋厂找到了工作，在那里他才真正学到了鞋匠的手艺。

朱可夫的母亲叫乌斯季尼娅·阿尔捷米耶芙娜，出生在邻村一个很穷的人家。朱可夫在回忆录中是这样描述母亲的：

“母亲身体很强壮，她能不费气力地扛起五普特重的一袋粮食走远一段路。据说，她身强力壮，是因为她父亲——我外祖父阿尔乔姆的体力好。我外祖父能钻到马肚子下面一头把马顶起来，还能攥住马尾巴，一把把马拉得蹲坐地上。”

朱可夫的父母都是二婚，同时又都没有留下孩子。他们结婚那年，朱可夫的父亲康斯坦丁已经50岁，乌斯季尼娅也35岁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是个女孩，名叫玛莎，比朱可夫大两岁。朱可夫的名字叫叶戈尔，他5岁时，又有了一个弟弟，叫阿列克谢。因他家生活贫困，他小弟1岁就夭折。那时卡卢加省的农民生活是很苦的，地少而薄，连糊口都无法做到。

由于家里太穷，朱可夫的父亲皮匠活挣钱又少，他母亲不得不外出帮人运送货物。每年春、夏和早秋季节，她在地里干活；晚秋，她就到县城——马洛亚罗斯拉韦次，替人把食品杂货运送到乌戈德厂的商人那里。运一趟，可得一个卢布到一个卢布零二十个戈比。这是多么微薄的工资啊！扣除马料、店钱、饭钱、修鞋钱等等，已经剩不下几个钱了。

但是，有什么办法呢？那个时候，贫农们就是这样的命啊。所以，他母亲毫无怨言地干。为了不挨饿，他们村的很多妇女都是这样做的。她们把很小的孩子丢给年迈的奶奶、爷爷照管，自己不顾道路泥泞，也不管天寒地冻，外出帮人从马洛亚罗斯拉韦次、谢尔普霍夫等地运货。那里的男人们则去莫斯科、彼得堡等大城市做零活。但他们也挣不了多

少钱，很少有人口袋里装着许多钱回村来。

就在朱可夫的小弟病死后不久，家里又遭遇另一场灾难：他家房子因年久失修，屋顶坍塌下来，差点砸死人。朱可夫还清楚地记得，当时她母亲伤心地哭着对他和姐姐说：“孩子们，没有法子呀，搬吧，所有的破烂东西都往草棚里搬。”父亲砌好了一眼小灶，他想尽办法要在草棚子里安家。

他们的邻居、父亲的好友纳扎雷奇得知他家发生的不幸事件后，马上赶来，关切地说：“这怎么能行，快过冬了，你究竟打算怎么办？”

“还想不出办法来……”

母亲插嘴道：“有什么可想的，把母牛牵去卖了，再用这笔钱买木料……”

大伙都嚷开了：“乌斯季尼娅说得对呀！”

父亲说：“对是对呀，但一头母牛是不够的。除它以外，我们家也就只有一匹老马了。”

但是，谁也没有接这个话茬。大伙都知道，这样一来，他们家往后的日子可就更加困难了。

在邻居们好心的帮助下，不到 11 月，朱可夫一家就把房子盖好了。只是屋顶是用干草覆盖的。性格爽朗的母亲为安慰大家，她说：“没有什么，就这样住吧。等我们有了钱，再盖好的。”

这所房子从外表看，就比别人家的要差些。门是用旧木板钉的，窗户安的是破玻璃。但是，他们全家都很高兴，因为冬天他们总算有了一个暖和的藏身之地了。

2 少年早成

夏季的一天，朱可夫的父亲对儿子说：

“呃，叶戈尔，你快 7 岁了，该干点活了。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已经顶一个大人干活了。明天我们去割草，你带上耙子，和玛莎一起摊草、晒草和垛草。”

小叶戈尔很喜欢割草，大人也常常带他去。但是，这一次可就不同了。不像从前那样只是为了玩。他很自豪，现在他已经参加劳动了，已经成了一个对家庭有用的人了。

他干活很卖劲，听到大人们的夸奖就更高兴了。大概是用力过猛，两个手掌很快都起了血泡。他怕说出来丢脸，就一直坚持干下去。最后，血泡破了，他不能再耙了。

父亲对他说：“没关系，会好的。”就这样，过了几天以后真的好啦，他又参加了割草的行列，而且干得不坏。

割麦季节到了。妈妈对叶戈尔说：

“孩子，你要学学割麦子。我在城里给你买了一把新镰刀。明天早晨我们就去割黑麦子。”

割麦子开头进展得不坏，但很快叶戈尔又倒霉了。他年少心盛为了想炫耀一下自己，他抢着往前赶，结果镰刀割破了左手的小拇指，血流不止。妈妈吓坏了，他也急得不知所措。

这件事过去多少年了，但左手小拇指至今还留下一块伤疤，使他常

常想起当年的鲁莽和急于求成的后果。然而也就是通过一次次失败、磨炼了他坚强的性格。

很快，一个紧张的夏季过去了。他已经学会做一些农活，身体也锻炼得结实了。

1903年的秋季来临了，父亲决定送叶戈尔上学，对他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时刻。

8岁时，朱可夫进了一所免收学费的教会小学。他在班里衣着最差，但学习成绩却最优秀。他的老师名叫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雷米佐夫，教书很有经验，从不无缘无故惩罚人，也从不提高嗓门训斥学生。这位教师非常喜欢朱可夫，曾启发他多读书，开阔自己的视野，多听、多想、多问，“处处留心皆学问”，朱可夫和同学们都很尊重他。朱可夫在成人之后，常常以十分感激的心情怀念这位老师，感谢他引导自己热爱读书和给予他迈向人生之路的宝贵启迪。

朱可夫除了上课听老师讲课，获取一些知识外，还特别希望多知道一些国内外大事和时事知识。在他的村子里有一个小茶馆，村民们，特别是年轻人都爱到茶馆喝茶。借此机会，听听新闻，打打扑克，高兴了还可以喝上两盅。父亲也常带朱可夫去那里喝茶。这是朱可夫最高兴的时候。他在大人们当中听他们谈论关于莫斯科和彼得堡的各种趣闻，听乡村“政治家”们谈论各种政治主张和“小道消息”，使他大大开阔了眼界。

1905年春天，村子里越来越经常地出现一些陌生人，他们号召人们起来同地主、同沙皇的专制制度作斗争。从他们和在城里打工的乡亲们口中，小朱可夫和村民们得知莫斯科发生了政治大罢工、街垒战斗和十二月武装起义；得知工人起义遭到了沙皇的残酷镇压。那时，小朱可夫第一次听到了列宁的名字，知道他是工人农民利益的代表者，是布尔什维克党的领袖。当时，朱可夫虽然只有9岁，但这对他幼小心灵的影响是巨大的。朱可夫后来说：“我们村的形势没有发展到农民起义那种地步，但引起的震动是很大的。”

朱可夫的父亲康斯坦丁对他的成长起着重要作用。康斯坦丁是个有见识而又敢于斗争的人。村里人都很尊敬他，都爱听他的意见。通常，村里大小集会上，最后的结论都是由他来做。小朱可夫很爱他的父亲，父亲也很喜欢他。但是，父亲对他管教十分严厉。康斯坦丁又是个敢做敢为的人，爱打抱不平。在父亲再次去莫斯科的前夕他母亲怕出事，劝他不要多管闲事，不然，会被宪兵流放到连放牛都没人肯去的地方。但康斯坦丁却说，“我们是工人，大家到哪里，我也到哪里。”

康斯坦丁的斗争性对朱可夫影响很大，使他从小就养成了天不怕地不怕，敢于坚持主见，进行顽强斗争的性格。

1906年，朱可夫的父亲回乡来了。他说，以后再也不去莫斯科了，警察当局禁止他住在城里，只准他回本乡。作为孩子，他和姐姐不想更多过问大人的事，只知道父亲不再离开他们了，而心情格外高兴。

就在这一年，小朱可夫在三年制的教会小学毕业了。他学习好，每年成绩都是优秀，最后得到一张奖状。全家对他的学习成绩都很满意，他自己也很高兴。为祝贺他小学毕业，母亲送给他一件新衬衫，父亲为他亲手制作了一双皮靴。

父亲说：“现在你是有文化的人了，可以带你到莫斯科去学手艺了。”小小年纪的叶戈尔·朱可夫，就这样匆匆结束了尚未结束的童年，远离亲人去迎接新生活的挑战。

3 学徒生涯

1908年夏，年仅12岁的小朱可夫告别父母，离开家乡去莫斯科，到他舅舅米哈依尔·皮利欣开的毛皮作坊里当一名学徒工。

小叶戈尔第一次出远门，他那时外出行李很简单。母亲给他带了两件衬衣、两副包脚布和一条毛巾。还给了他5个鸡蛋和几块饼，让他在路上吃。

以前叶戈尔从来没有坐过火车，也从来没有见过铁路，所以，这次旅行给他留下了极深的印象。火车驰过巴拉巴诺夫车站以后，远处突然出现一排灯火通明的高楼。

叶戈尔在昏暗的车厢里听着隆隆的车轮声，心里却想起几天前父亲带他到舅舅——未来的老板皮利欣家的情景。

走前，他父亲曾提醒他说：“叶戈尔卡，你要忘掉他是你的舅舅。他是你未来的老板。阔老板是不喜欢穷亲戚的。千万千万记住这一点。”他不信，可事实教育了他。当母亲问起，他兄弟如何对待他们父子俩时，父亲没好气地说：“你那兄弟就像阔老板接待我们穷哥们一个样。”

“连茶也不倒一杯？”母亲急忙插嘴问。

父亲接着说：“别说倒茶了，我们走了老远的路，连坐也不让坐一会儿。他坐着，让我们像傻瓜一样地站着……”当时父亲的眼里充满悲愤。这使刚要跨入生活门坎的小朱可夫初次体会到贫富的差异和人世间的冷暖。

黎明时，火车抵达莫斯科。小朱可夫简直是大开了眼界。他看到高大的房屋，华丽的商店，肥壮的大马。他像在云雾中一样，头昏目眩，眼花缭乱。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么高的大楼和这么平整的街道，马车夫驾着漂亮的鄂尔洛夫马拉的胶轮车一路飞跑。他也从来没有见过街上有这么多的人。这一切都超出他的想象……

朱可夫在作坊办公室里见到了打扮入时的老板娘，她上下仔细打量一番眼前这个少年，于是表情严肃地讲了这里的规矩：

“刚到作坊的最小的徒弟，无论是谁，他的职责就是打扫房间、为大小主人擦鞋；点灯、生炉子……”末了她说：“好吧，别的事情库兹马和女工头玛特廖莎会对你讲的。现在你可以去吃饭了。”

徒工头库兹马叫他到厨房吃午饭。那天，他饿极了，吃得很香。可是，却意外地碰上一件倒霉的事。这里有个规矩：开始吃饭时，只能从公共菜盆里舀菜汤喝，不能捞肉吃；要等到女工头敲两下菜盆以后，才可以夹一小块肉吃。可是，小朱可夫不知情，一下就捞了两块肉，并得意地大口吞吃了。当他正在去捞第三块肉时，脑门上突然挨了一勺子，头上立刻鼓起了一个小包。

小朱可夫真不走运，来到莫斯科第一天就接受了这样令人难堪的见面礼。

那时老师傅们活的也不轻松。有人借机会取笑他，可是老师傅们却

很同情他，并和颜悦色地劝他，让他不要害臊，不要心急，刚来都有这个过程，这里规矩大，慢慢习惯就好了。小朱可夫十分感谢这些好心人对他及时的劝导。作坊的师傅们早晨 7 时整开始劳动，晚上 7 时收工，中间只有一小时休息吃午饭。所以，一个劳动日就是 11 个小时。如果活多，师傅们就要干到晚上 10~11 时。那一个劳动日就是 15 个小时了。加班时间他们可以领到一些加班费。

徒工们更苦，经常是早晨 6 点钟起床，他们很快地洗完脸，就去收拾工作场地，准备好师傅们工作所需要的一切。晚上等打扫完毕，为第二天做好准备后，要到 11 点钟才能睡觉。他们就睡在作坊里的地板上；天很冷的时候，才让睡在后门过道里的高板床上。

不仅如此，作为徒工，小朱可夫他们常常为了一点点小过错就挨老板的毒打。老板打人时手特别重。他们要挨师傅的打，要挨女工头的打，还要挨老板娘的打。当老板不高兴的时候，你最好不要让他看见，他会毫无道理地痛打你一顿，打得你整整一天耳朵嗡嗡叫。

最令人无法忍受的是，有时老板竟让两个犯了过错的徒弟，用皮鞭互相抽打，他在一旁还高声喊叫：“给我狠狠地打，使劲地抽！”

在当时的社会里，老板打徒弟是司空见惯的事，甚至徒弟被打死也不负法律责任。这种对年轻徒工们的非人道待遇，在少年朱可夫的幼小心灵里，打上了沉重的烙印。

朱可夫由于受家庭环境和父亲的影响，从小就养成了见义勇为和不畏强暴的性格。

学徒期间，他所见到的一桩桩一件件不平事，使他怒火中烧。一次他亲眼看到外名叫“魔鬼”的二老板瓦西里·丹尼洛夫在施暴。此人因为一点点小事，就以一种暴虐狂的残忍毒打一个 14 岁的小徒弟。那个童工跪在地上一再求饶，二老板怎么也不肯撒手。朱可夫在一旁实在忍不住了，抓起一根“杠子”（捆包时用的橡木压杠），使尽全身力气照二老板的秃头上打去。一下子把他打倒在地，昏过去了。朱可夫很害怕，以为把他打死了，就从店里逃走。后来他被抓回来，老板不分青红皂白地毒打他一顿。

一年过去了，由于小朱可夫聪慧过人，在徒工中他进步最快，不仅学会了毛皮匠这一行当的初步手艺，还学会制作毛皮的一些其他技能。另一方面，在学徒期间，他一刻也没有忘记学习。无论作坊中的高强度劳动，还是难以忍受的低劣生活条件，都未能影响他的学习热情。他读了许多书，如长篇小说《护士》《福尔摩斯探案》以及其他一些惊险小说。随着知识和阅历的增长，这些书已不能满足他对知识的渴求了。为了学习，他主动与他年龄相仿的老板儿子亚历山大交往，他们关系处的不错。亚历山大主动借给他书看，还经常帮助他学习俄语、数学、地理，并一同阅读一些科学读物。当然那时条件非常艰苦，都是夜间老板不在家、星期日，忙里偷闲学习的。他自己时常夜间到厕所里借助微弱的灯光如饥似渴地看书阅读。

朱可夫有强烈的求知欲望，对什么都有兴趣，常到垃圾堆里找旧报纸和旧杂志拿来阅读。有时外出送货，老板给他的几戈比车马费，他从来舍不得轻易花掉，而是徒步走去，节省下来买书看。经过一年多的刻苦自学，他提高很快。老板也开始喜欢他了。经亚历山大的帮助，老板

居然同意他业余时间到市里中等文化夜校去学习的要求。于是朱可夫成了莫斯科勃留索夫胡同的一所四年制学校的夜校生。就这样，学徒期间朱可夫不仅掌握了全部制革技能，还以优异成绩拿到了中等文化夜校的毕业文凭。

4 一片深情

1912年，朱可夫经老板应允幸运地得到10天假期回乡探亲。

从农村出来时，小朱可夫只有12岁，他差不多还是个孩子，而现在已经是个青年人了。他已经16岁了，已经是个干了四年活的学徒工了。他很兴奋，因为他很快就要见到日夜想念的亲人啦。他乘的是马洛亚罗斯拉韦次郊区火车。从莫斯科到奥博连斯科耶小站，他一直站在一个打开着的车窗旁。四年前他去莫斯科的时候是个夜间，无法看到沿途的风景。这一次，他以极大的兴趣饱览了各车站的设施和莫斯科近郊美丽迷人的景色和茂密的树林。

朱可夫的母亲亲自到奥博连斯科耶小站接他来了。她在这四年中间苍老多了。似乎有什么东西堵住了他的嗓子，他使劲忍住，才没有哭出声来。

母亲哭了很久，用她那双粗糙的、长满老茧的手紧紧地搂着他，反反复复说着这么几句话：

“叶戈尔卡，亲爱的儿子！我以为我死以前看不到你了。”

“妈妈，怎么啦，你看，我这不是长大了，现在你该高兴才是。”他不断地安慰着母亲。

“感谢上帝呀！”母亲这才收住眼泪会心地笑了。

他们回到家里时，天已经黑下来。父亲和姐姐在门前土台上接他们。

姐姐已经长成大姑娘了。父亲老多了，背驼得更厉害了。已是七十开外的年纪。他按自己的习惯吻了儿子一下，若有所思地说道：“好啊，我终于活到了这一天，看到你长大成人了。”

为了使老人和姐姐更高兴，朱可夫赶快打开篮子，给每人送了一份礼物。另外还给了妈妈三个卢布、两公斤糖、半公斤茶叶和一公斤糖果。

母亲高兴地说：“儿子，谢谢你！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喝过像样的糖茶了。”

朱可夫还特意给了父亲一个卢布，供他上茶馆零花。

妈妈说：“给他20个戈比就够了。”

父亲说：“我等儿子等了四年。别提穷的话了，免得使我们在见面时就扫兴。”

朱可夫把四年来积攒下来的五个卢布血汗钱，都用来孝敬自己的双亲啦。当他看到父母那幸福满足的笑脸，作为孝子的他，此刻也心花怒放了。

1912年底，17岁的朱可夫结束了学徒生涯，成了青年师傅。同时他还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市立中学的全部课程考试。

从乡里出来的时候，他还是一个孩子，而现在他已是一个有思想、有见识的青年人了。更重要的是，他在经济上也独立了。这时，他每月可以挣到10个卢布，同当时的其他工人相比，这可算是一笔相当可观的

收入。

老板这时经常派他去外面联系业务、办理托运。这给朱可夫提供了接触外界、开阔视野的条件。

那时的俄国，手工业工人大多不问政治，他们只关心自己的利益，他们的理想只是攒够钱，开一个自己的店，自己做老板。在这种环境里，很难了解到外面的信息。不过，作坊里的老师傅桑多尔·伊万诺维奇例外。他关心政治，经常可以搞到一些报纸来看。从他那里，朱可夫接触了《明星报》和《真理报》等进步报刊，接受了进步思想的启蒙。

在成为青年师傅之后，为了能有更多的时间用于学习，朱可夫搬到了作坊外的私人住宅去住。尽管这需要花去朱可夫不少收入，租金是每月 3 个卢布，但他一点儿也不把这放在心上，因为他坚信，没有什么能比不受干扰地读书更重要的事。

朱可夫的房东马雷舍瓦娅是个寡妇，她有个漂亮的女儿叫玛利亚。同在屋檐下，两个年轻人日久生情，很快双双坠入了爱河。不久，他们甚至开始计划结婚了。

就在朱可夫沉浸在初恋的喜悦之中，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战争摧毁了年轻人的爱情之梦。由于前线伤亡很大，沙俄政府宣布提前征召 1895 年后出生的青年。于是，朱可夫匆匆告别心爱的姑娘，准备回村子里帮助父母收麦子，并向他们道别。

第二章 接受命运挑战

1 光荣的枪骑兵

朱可夫从来不向命运低头，一直勇敢地接受命运的严峻挑战。1914年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他于1915年8月7日离开学徒的作坊，在他的家乡卡卢加省马洛亚罗斯拉韦茨县应征入伍，从此开始了他人生的另一段旅程。

他被选送到骑兵部队。他为能够当上一名骑兵，感到十分高兴。他一向很喜爱这一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兵种。他的朋友们都被分配当步兵，所以很多人十分羡慕他。

一个星期以后，所有应征青年都到兵站报到。编队以后，他就与同乡们分手了。周围都是些陌生的面孔，也都是和他一样还没有长胡子的孩子们。

晚上，他们上了货车，开往卡卢加城。起初朱可夫一直感到很苦闷和孤单。他的少年时代已经结束了。他问自己：“我吃得了当兵的苦吗？如果要去打仗，我行吗？”后来暗暗鼓励自己，他想，我是经受过生活磨炼的，一定能够光荣地完成士兵的职责。

每个车厢装了40个人。货车车厢没有客运设施，一路上他们只能站着或者坐在肮脏的地板上。有的人在唱歌；有的人在打牌；有的在同邻座的人谈心时哭了；也有人咬紧牙关，目不转睛地凝视着一个地方，坐在那里想象未来的士兵生活。

到达卡卢加城已是夜间。在一个货车站台下了车。传来了“集合！”“看齐！”的口令，然后他们列队向城市相反的方向前进。有个人问上等兵：我们开到哪儿。看来这个上等兵是个好人，他和蔼地对大家说：

“孩子们，永远不要向长官提出这类问题。当兵的应当默不作声地执行命令和口令。至于开到哪儿——这是长官才可以了解的事。”

好像为了证实他的话，纵队先头传来了队长的洪亮的声音：

“队列中不准说话！”

朱可夫的新朋友科利亚·西夫佐夫用胳膊肘碰了他一下，小声说：

“这就是士兵生活的开始？！”

第一天的士兵生活，就叫人难受。大家都很想早点躺下睡觉，可是，排长似乎猜透了他们的心思，偏偏命令他们集合，宣布明天要带领他们参加全体晚点名，所以，今天必须学会唱国歌《上帝啊，保佑沙皇！》。他们一直学到深夜。第二天早晨6点钟就又起床出早操了。

每天生活很单调，就像两滴水珠一样的完全相似。第一个星期天到了。大家都想休息一下，洗个澡；可是，又被叫去打扫操场和军营，一直扫到吃午饭。“午睡”后，又是擦枪、补衣服、写家信。班长警告他们，不得在信里对任何事情表示不满，因为这样的信件检查官一概要扣发的。

习惯士兵的生活是不容易的。但是，对经过艰苦生活磨炼的朱可夫来说，什么也难不倒他。经过两个星期左右，他和大多数人都已经对军队的各项规章制度感到习惯了。

这时的朱可夫虽然在政治上还比较幼稚，但他还是认识到这只是一

场富人的战争。因此，他对入伍参战热情不高。出于青年人的爱国热忱，他还是决心要忠诚地为俄罗斯而战。

凭着朱可夫当时的文化条件，他本来有资格直接进陆军准尉学校，但是朱可夫却不想这么做。他曾见过两个同村的年轻人成为准尉后，因为年轻资历浅，在部队里仍贫困潦倒。他觉得自己应走另一条路，先当兵，再去士官学校接受更严格的军事训练。从此，在填写文化程度时，他只说曾在教会学校读过小学。这样，朱可夫便成了骑兵部队的一名新兵。

1915年9月，朱可夫他们被派往乌克兰境内的后备骑兵第5团。该团驻扎在哈尔科夫省巴拉克列亚城内。他们的列车经过萨文第车站，抵达巴拉克列亚车站。这里正在准备为前线骑兵第10师运送补充兵员。到月台上来迎接他们的，是穿着新制服、仪表端正的骑兵军士和司务长们。这些人有的穿骠骑兵制服，有的穿枪骑兵制服，还有的穿龙骑兵制服，十分神气。

骑兵当时分为骠骑兵、枪骑兵、龙骑兵三种。朱可夫被分到枪骑兵连。到了这里，朱可夫领到了军服，还得到了一匹深灰色的烈性牝马，名叫“恰谢娜娅”。

人们都知道骑兵驰骋在疆场，威风凛凛，但没有多少人知道骑兵的艰苦。他们除了学习步兵科目外，还要学习马术，学会使用马刀等冷兵器，每天还要刷三次马。与步兵相比，骑兵每天要早起一小时，晚睡一小时。最要命的算是乘马训练和特技骑术等。每个士兵两条大腿都磨出了血，刚结了疤，又磨破了。每次训练后，马鞍上都血迹斑斑。朱可夫十分坚强。“恰谢娜娅”最初看不起这个矮壮的年轻人，重重地摔了他几次，但越摔这个年轻人训练时间越长：“恰谢娜娅”终于被驯服了。仅用两个星期，朱可夫就在马鞍上牢牢坐稳了。

在这里，朱可夫遇到了一个心地善良的排长——上士杜拉科夫。虽然他的名字俄语意思是“傻瓜”，但这位杜拉科夫并不像，而且还是很有能力的人。他外表上很严肃，心地却很温和、善良。他对下级要求很严格，有时会因为一个动作做得不规范而大加指责，但他从不冤枉一个士兵，处理问题总是十分谨慎，尽可能地做到公道，而且，他很关心每个士兵的前途。

可是，另一位指挥官，下士博罗达夫科，却和他完全相反：性情暴躁，大喊大叫，喜欢打人。老兵们说，他曾经打掉过好几个士兵的牙齿。

他教练骑乘时，表现得特别残暴。这一点，在排长短期休假期间，他们体会最深。博罗达夫科代理排长期间，在教练这些新兵时，总是肆意妄行，动辄拳打脚踢。对朱可夫这样被他认为有文化的人，尤其苛刻。朱可夫被逼得气愤到了极点。

一天，朱可夫和几个士兵商议好，悄悄躲在一个黑暗的角落里。当博罗达夫走过时，突然用马披蒙住他的头，把他狠狠地教训了一顿。

朱可夫以为这回犯了大错，难逃军事法庭的处罚。

好在吉人自有天相，就在这时，他们原来的排长杜拉科夫上士回来了。杜拉科夫和博罗达夫不一样，他虽然要求下级很严格，但他尊重士兵。杜拉科夫打了一个圆场，把这件事搪塞过去，不久还请求上级将博罗达夫调到了别的连队。

到 1916 年春天，朱可夫和他所在部队已经接受了很好的骑兵训练。训练结束时，按照惯例，要从训练成绩优秀的士兵中选拔一些人进教导队，准备培养今后当军士。要从他们中间选 30 名训练成绩好的士兵进行培养。出类拔萃的朱可夫当然被选中了。但朱可夫很矛盾，他想上前线。这时，杜拉科夫竭力说服朱可夫上教导队。他说：“不要急着到前线去，我在前线待过，感觉很困惑。我们许多人都糊里糊涂地死去，这到底为什么？”杜拉科夫流露出对沙皇政府的厌倦。他语重心长地对朱可夫说，前线你早晚会去的，但事先一定要更多地学习军事，这对你将来的成长会有好处。朱可夫被说服了。杜拉科夫的这种带兵方法对朱可夫有一定的影响。在后来带兵中，朱可夫始终认为，军官必须替士兵着想，把士兵当成自己的亲人，这样士兵才会把命运放心地交给你。

朱可夫进了教导队。他的运气真是不好。这一次，他碰上了一个比博罗达夫更糟糕的上司，因为这个人右手食指短半截，士兵们背地里都叫他“四指半”。

“四指半”经常毒打士兵，他虽然没有碰过朱可夫一个指头，但却用另外方式对他施加各种惩罚。

在教导队里，可以说没有第二个人像朱可夫那样，多次“穿着全副战斗装备顶着马刀”罚站，从马厩里背着那么多袋的沙子送往野营帐篷，此外，还经常安排他在假日里值班。不过，令朱可夫得意的是，在操练课方面，那“四指半”却怎么也挑不出他的毛病。

“四指半”后来也相信上述方法整不倒朱可夫，便决定改变策略：由于朱可夫在军事训练方面一直走在别人前面，他就想干脆不让他参加训练。

有一天，他把朱可夫叫到帐篷里去。对他说：

“我看出来了，你是一个有个性、有文化的青年，学习军事不吃力。你是莫斯科人，是工人，为什么还要你每天去参加操练课、跟着去流汗呢？你以后就当我的非编抄写员，负责填写值勤登记表，统计缺课人数和执行其他的任务。”

朱可夫回答说：“我到教导队来，不是为了要当一名负责承办各种事项的职员，而是为了要认真地学习军事和当一名军士。”

他发怒了，并威胁说：

“你等着瞧吧，我叫你永远也当不上军士！……”

6 月份了，他们的学习就要结束，快要开始考试了。按照当时的规定，教导队里成绩最好的一名，毕业时应授予下士军衔，而其余的人，只作为准军士，即军士衔的候补人员从教导队毕业。同学们都不怀疑，朱可夫会成为第一名，毕业时一定会获得下士军衔，并且以后会找到当班长的空缺。

但是，完全出乎大家意料之外，毕业前的两个星期突然宣布，由于朱可夫不守纪律和冒犯直接长官，决定把他开除出教导队。大家都清楚，“四指半”已决定算总账了。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有人向教导队大队长告发了对朱可夫的不公正处理。队长做了调查，在周边好心人的帮助下，撤销了对他的开除命令。可是由于这一事件，他没能得到第一名，而是和大家一样得了准军士衔。

1916年8月，朱可夫从教导队毕业，被分回骑兵第10师担任准军士。该师此时驻扎在哈尔科夫附近。

开往哈尔科夫的火车走得很慢。半路上，朱可夫乘坐的火车开到一个岔道上，以便让另一列装载步兵师的火车先行。这时，从前线开回的医护列车也停在这里为开往前线的列车让路。从伤员那里朱可夫了解到俄国士兵的武器和装备都很差，高级指挥官名声很坏。这些消息让朱可夫听了心里很难过。

朱可夫所在部队，番号是龙骑兵捕诺夫哥罗德骑兵第10团，被派到文尼察西南的卡美涅茨—波多耳斯克，在那里接受一百多马匹及全部装备。正在卸车的时候，他们遭到一架德国侦察机的袭击，一个士兵和几匹马被当场炸死。这是朱可夫入伍后所经受的第一次战斗洗礼。

第10师开到德涅斯特河岸，在这里成为俄西南战线预备队的一部分。

他们到达部队后，就知道了罗马尼亚已向德国宣战，并将站在俄国方面对德国人作战。还听到传说，他们师很快就要开赴前线，但是，究竟开到哪个地段，谁也不知道。

9月初，这个师集中到贝斯特里茨山林地区，因为地形条件不适合骑兵冲击，他们被作为步兵投入了进攻。部队受到很大损失，进攻行动也就草草结束了。

在这次行动中，朱可夫由于作战勇敢并俘虏了一名德军军官，赢得了他军事生涯的第一项荣誉——一枚圣乔治勋章。

1916年10月，朱可夫和几名同伴在进行战地侦察时，误入雷区。两名同伴受了重伤。而他也被气浪从马上掀了下来，脑子受到震伤。这次受伤，为他又赢得第二枚圣乔治勋章。

朱可夫被送往哈尔科夫疗养。出院后，他仍然感到不舒服，特别是听觉不好，医务委员会没有让他返回前线，而是把他调到了驻扎在拉格尔村的骑兵新兵连。

这时候，俄国军队的反战情绪已越来越浓，俄国国内的革命形势也日渐高涨。一场翻天覆地的社会大变革即将在俄国这个“帝国主义链条上最薄弱的一环”爆发。

2 融入革命洪流

1917年2月中旬，彼得堡部分工人开始罢工。几天后，罢工浪潮席卷全城和邻近的城市。革命已一触即发。2月26日，布尔什维克决定举行总起义，成立临时政府。也就在这同时，2月27日凌晨，驻扎在拉格尔村朱可夫他们的骑兵连突然紧急集合，集合地点就在骑兵连长、骑兵大尉、男爵冯·德·戈尔茨宿舍的附近。当时他们什么也不知道。朱可夫忙问他们的排长基辅斯基中尉：

“中尉先生，我们要开到哪里去？”

他反问：“你是怎么想的？”

他说：“士兵们应当知道开往哪里，尤其是，还给我们发了子弹。”

“那又有什么。子弹会有用的。”

骑兵大尉、男爵冯·戈尔茨把全连变成三路纵队后，发出了“快步

走！”的口令。骑兵连沿公路向巴拉克列亚城后备骑兵第5团司令部前进。到达团教练场后，他们看到基辅龙骑兵和英格曼兰德骠骑兵都已排成横队等候在那里了。他们连也变成了连横队。其他部队也快步赶到了。谁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很快就一切都明白了。操场那边有人举着红旗游行示威。我们连长猛抽一鞭，纵马向团部疾驰而去。其他连长也跟着他去了。这时，从团部走出一群军人和工人。

一位高个子军人，大声对士兵们讲起话来。他说，俄国的工人阶级、士兵和农民不再承认沙皇尼古拉二世了，不承认资本家和地主。俄国人民不愿意继续进行流血的帝国主义战争，人民需要和平、土地和自由。这位军人在结束自己的简短演说时，高呼：“打倒沙皇！打倒战争！各国人民和平万岁！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万岁！乌拉！”

谁也没有向士兵发口令。但是，他们从心底里明白他们应当怎样做。四处都响起了“乌拉”的欢呼声。士兵们和游行的工人们站到了一起。

经过短暂的激战，起义士兵和工人很快取得了胜利，并于27日晚举行彼得格勒工人士兵苏维埃代表大会。

“二月革命”的胜利推翻了统治俄国三百多年的罗曼诺夫王朝，俄国历史由此进入新纪元。

在这场社会大变革中，青年朱可夫没有置身事外，而是积极地把自己融入了革命的洪流之中。

2月28日，士兵委员会的负责人雅科夫列夫向朱可夫的连里派来了一位新连长。新连长一上任便命令全连集合，选举出席团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代表和连士兵委员会。朱可夫被选为连士兵委员会主席，并出席团苏维埃代表大会。

二月革命后的俄国形势，错综复杂。由于大多数布尔什维克的领袖还被关押在监狱里或仍在流放中，致使孟什维克把持着苏维埃的领导权。他们同资产阶级代表达成协议，成立了以李沃夫为首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新成立的临时政府决定继续进行战争。因此，3月初，朱可夫所在团的苏维埃大会上，布尔什维克同孟什维克进行了激烈的斗争。

士兵们不愿意再继续流血，因而对临时政府非常反感。在选举苏维埃成员时，大家都选布尔什维克。

5月，骑兵连士兵委员会决定解散这支连队，士兵委员会给士兵们发了退伍证明，让他们返回各自的家乡。朱可夫在遣散以后，发现一些投奔到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方面去的军官四处搜寻他，不得不在巴拉克列亚城内和拉格尔村里躲了几个星期。

1917年11月7日，“十月革命”爆发。

11月30日，朱可夫安全地回到莫斯科。之后，他回到家乡住了一段时间。正当他准备参加赤卫队时不幸得了斑疹伤寒，不得不继续休养。之后，他又得了回归热。直到6个月后，他的身体彻底康复，才实现了他参加红军的愿望。

3 参加红军

1918年8月，朱可夫加入了红军，被编入莫斯科骑兵第1师第4团。

他们的团长是后来的苏军元帅塞米扬·康斯坦丁诺维奇·铁木辛哥，师长则是后来的布琼尼元帅。

此后，在整个内战期间，朱可夫大部分时间都在布琼尼的骑兵部队里。这是一支有着传奇色彩的骑兵部队，并且深得斯大林的喜爱。作为它的一员，朱可夫在战时和战后的活动中都不可分地和它联系在一起，这给他的经历增添了不少光彩。

就在朱可夫养病期间，革命形势又有了新的发展。

由于巩固新生政权的需要，苏维埃政府开始着手建立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的艰苦工作。1918年1月召开了全俄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一致赞成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大会通过了列宁起草的《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的宣言》，其中写道：

为了保证劳动群众掌握全部政权和根除剥削者的政权复辟的可能，特命令实行劳动者武装，建立社会主义工农红军。

会议之后，马上在彼得堡开始以百名赤卫队员和彼得堡卫戍区各后备团的士兵，组建红军的第一个兵团。这就是工农红军第1军。就在这时，从彼得堡向西部战线派出了以赤卫队员组成的第一批社会主义军队，约一千人。

列宁在欢送大会上发表了演说。他说：“我向你们第一批社会主义军队的志愿人员英雄们表示祝贺，你们一定会建立起强大的革命军。”

接受志愿人员加入红军的制度是这样的：每个志愿人员必须持有士兵委员会、党组织或支持苏维埃政权的其他社会组织的介绍信。如果是整批加入，则要求实行集体保证。工农红军军人享受全面的供给制，此外还发给津贴费。开始每月50卢布，从1918年春季，红军已有将近20万人，后来志愿人员的来源就慢慢减少了。

革命后的俄国形势十分严峻。出于对新生苏维埃政权的恐惧和仇恨，地主资产阶级和协约国帝国主义联合起来，打着“保护俄国”的幌子向苏维埃政权发动了猖狂的进攻。

1918年5月9日，英军在北部重要港口摩尔曼斯克登陆，接着美军、法军也相继在此登陆。4月5日，日军在东部的海参威登陆，英、美也随之派兵在此登陆，不久占领了远东地区。

在帝国主义支持下，苏俄国内的各种反革命势力纷纷发动叛乱，灾祸殃及西伯利亚、伏尔加河流域和俄国中央地区。到1918年下半年，在苏俄领土上共有帝国主义国家军队和白匪军近100万人。

为了粉碎国内外敌人的进攻，苏维埃政府采取果断措施。在军事方面，1918年5月，将自愿兵役制改为义务兵役制。对红军进行整编，加速选拔和培养工农指挥员，吸收旧军事专家参加军事工作，建立政治委员制。对不脱产的工人实行义务军训，扩大军事后备力量。这些新制度的实行，扩大了军队的影响。到1918年8月，即朱可夫参加红军时，红军已达50万人。新生的红军正在迅速壮大。

为加强对部队的统一指挥，1918年9月2日，成立了以托洛茨基为主席的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设置了总司令部，下设各个战线及其司令部。11月，组成了以列宁为主席的国防委员会。

到1919年初，红军已发展到一百多万人。

第三章 内战的洗礼

1 严峻的考验

1918年11月，德国战败投降，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协约国得以调动大批兵力加强对苏俄的武装干涉。从1919年春到1920年末，协约国集团支持俄国国内反动势力，连续发动了三次大规模武装进攻。

1919年，苏维埃政权的许多敌人向俄国开始了新的进攻。战线多达6条，其总长度为8000公里。敌人企图把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扼杀在铁的包围圈内。当时，国内战争达到了最为激烈的程度。

帝国主义各国政府的目标是推翻苏维埃政权，它们达成了瓜分俄国的协议，准备夺取俄国的乌克兰、白俄罗斯、波罗的海沿岸地区、高加索、北方的一部分及其他极为重要的地域。

1919年春，仅仅高尔察克的军队就有30万人，这支军队装备优良，主要由外贝加尔、西伯利亚的富裕农民和反革命哥萨克以及奥伦堡和乌拉尔的哥萨克白匪组成。此外，在高尔察克军队的后面，还集中了由美国、英国、日本的军队组成的15万干涉军。

帝国主义各国政府加紧装备邓尼金的军队。邓尼金本人被协约国捧为“最高副统帅”。这一行动表明协约国是怎样看中邓尼金军队的军事作用和他本人的作用。

红军到1919年春季也有很大的发展，人数达到了180万，其中40万装备不错的部队直接在前线作战。这些部队在战斗中得到了锻炼，获得了武装斗争经验。红军战士都懂得，他们是为什么样的理想而与干涉军和白匪军作战的，他们也清楚地知道，敌人是为什么而战，敌人追求的是什么目的。

1919年3月4日，盘踞在西伯利亚的高尔察克叛军近40万人，在2000公里的东方战线上向苏维埃政权发动了第一次大规模武装进攻。

与此同时，北高加索的邓尼金、波罗的海的万登尼奇以及英法美外国干涉军与之配合，从各战线发起联合进攻。

在东线，红军只有10万兵力，而且分布在广阔的战线上。在敌人强大的进攻下，红军作战失利，被迫向伏尔加河退却。

4月初，高尔察克的部队逼近喀山、辛比尔斯克和萨马拉。

形势万分危急！

这时候，苏俄党和政府决定集中力量首先消灭最主要的敌人高尔察克。

红军总指挥部决定将东线的红军分为战略集团，即北部军队集群和南部军队集群。其中南部军队集群为主力，指挥员是著名的伏龙芝，下辖第1、第4和第5集团军。

伏龙芝上任伊始就提出，红军不能被动地一退再退，应当集中力量尽快夺回战略主动权，挫败敌人的锐气。

根据当时的战场形势，伏龙芝果断地决定：以一部分兵力拖住正面的高尔察克主力，同时以主力全力打击高尔察克伸得过长的左翼。

在伏龙芝的指挥下，红军逐渐扭转了被动局面，走向了胜利之路。

2 第一次交锋

朱可夫所在的莫斯科骑兵第 1 师，隶属于伏龙芝部队的南部军队集群。年轻的朱可夫也因而有幸在这位杰出的军事家的麾下冲锋陷阵。

1919 年春，朱可夫所在骑兵团接到命令，要求该团立刻向东线推进。

四年帝国主义战争破坏了俄国这个工业落后的农业国。由于缺乏劳动力和原料，许多工厂还在沙皇时代就关了门。绝大多数的铁矿、煤炭、石油、棉花，大约 3/4 的生铁、钢、糖及大部分谷物，都正好出产在被干涉军和白匪占领的地区。只是由于党和人民做了最大的努力，才得以组织好红军的供应。在组织供应时，曾用最大努力始终机动使用这有限的物资技术资源，将它们运往决定着国家命运的地方。因为那时最为需要的东西，如金属、燃料、衣服、谷物，都极为缺乏。

从莫斯科开来的骑兵第 4 团的红军战士，一到叶尔绍夫车站，从车厢下来就拥向附近的集市。由于供应不足，战士们在莫斯科饿得够呛，他们买了大圆面包，狼吞虎咽地吃起来。这样，不少人得了病。这是可以理解的，要知道，那时，在莫斯科每人每天只能领到 1/4 俄磅质量低劣的面包，加上点马肉汤或鱼汤。

他们亲身体验到莫斯科、彼得堡和其他城市劳动人民挨饿的情况，以及红军供应恶劣的情况，因此，他们对富农、反革命哥萨克和干涉军充满了阶级仇恨。这种情况更激发了红军战士对敌人的仇恨，使他们坚定地投入决定性的搏斗中。

东线在伏龙芝到达后，情况发生了变化，伏龙芝当时负责东线南部军队集群的指挥。伏龙芝正确地指出，在这种困难条件下，应当尽快从白匪手中夺取战略主动权，摧毁敌军的士气，在我方部队中确立对白匪的必胜信心。

伏龙芝具有统帅的卓越远见，他明白，即使在敌人获胜的情况下，如能给白匪造成某些挫折，并加以适当利用，这些挫折就可能成为高尔察克崩溃的开始。

伏龙芝认为，应当从正面拖住高尔察克的军队，同时用土耳其斯坦的集团军和第 1 集团军全部以及第 4 集团军的一部对高尔察克伸得过长的左翼实施迅速、坚决的突击，然后，进一步把这一反突击变成为我东线全线强大的反攻，以解放乌拉尔和西伯利亚。

伏龙芝估计到，高尔察克的左翼是弱点，高尔察克不可能迅速将主力调至左翼，因为其主力正在东线中部的喀山、辛比尔斯克和萨马拉方向作战，企图前出至伏尔加。

伏龙芝的建议受到列宁的称赞。俄共（布）中央和革命军事委员会批准了这一计划。

伏龙芝在祖国命运危在旦夕的时刻，不畏艰难，不怕承担责任。他在紧迫的期限里，对归他指挥的东线南部军队集群进行了妥善的变更部署、补充和准备。在当时，铁路线遭到全面破坏，似乎处于全部瘫痪的情况下，要做到这点是很不容易的。

在东线胜利反攻的时候，乌拉尔斯克的情况却严重起来。哥萨克白匪正在围攻乌拉尔斯克城，并切断了它与南部军队集群的联系。被围部队进行了顽强的抵抗，未放弃乌拉尔斯克，但他们的处境非常危险。列

宁密切注意着东线的每一情况，于6月16日打电报给伏龙芝：

“ 请向乌拉尔的同志们转致我对保卫被围的乌拉尔斯克50天的英雄们的崇文敬礼！请他们不要泄气，再坚持几个星期。保卫乌拉尔斯克的英雄事业一定胜利。 ”

伏龙芝立即下命令把夏伯阳的第25师调往被围的乌拉尔斯克地域。于是，由传奇英雄夏伯阳率领的这个光荣的师即出发去支援乌拉尔人。

朱可夫所在莫斯科骑兵第1师归伏龙芝指挥。他们向希波沃车站地域开进时，得知夏伯阳师已进抵乌拉尔斯克。这使战士们情绪高昂，大家深信，乌拉尔的哥萨克白匪将被打败。

朱可夫所在团在通往希波沃车站的附近路上与敌人第一次交锋。敌人进行顽抗，阵地经过反复争夺。白匪在数量上比他们多。朱可夫直到后来还深深记得离希波沃车站不远的这次激烈的战斗。

大约800名哥萨克骑兵向他们冲来。当敌人已距离他们很近的时候，隐蔽在路堤后面的骑兵连携带一门大炮突然冲了出去。炮手们——这些英勇的小伙子，在疾驰中架好了炮并对白匪翼侧进行轰击。哥萨克白匪惊慌失措。炮手们准确的射击继续给敌人以大量杀伤。最后，白匪支持不住了，向后逃窜。对哥萨克的这一仗很成功，鼓舞了骑兵战士的士气。

就在这个时候，朱可夫他们听到了鼓舞人心的好消息：夏伯阳师一举打垮了白匪，进入了乌拉尔斯克城并与该城守军会合了。也就是在这次保卫乌拉尔斯克城的战斗中，朱可夫荣幸地见到了他所尊敬的方面军司令员伏龙芝将军。当时他是整个战役的总指挥。

伏龙芝和古比雪夫那天一起到夏伯阳的骑兵25师去，途经朱可夫所在团，主动与战士们攀谈起来。他关心战士们的情绪、给养、武器，亲切询问战士们的要求，了解战士家亲人是否来信，村里乡亲们怎么样。

伏龙芝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态度赢得了战士们的心。伏龙芝最后面对大家庄严地说：“ 嗯，现在我们的情况不错，已打垮了乌拉尔的哥萨克白匪，很快我们就能打垮其余的反革命……到那个时候，我们将重建我们的祖国！ ”

他的话使战士们很受鼓舞，朱可夫直到晚年还常常回忆起这第一次的会见。

3 难忘的日子

朱可夫早有加入布尔什维克党的愿望，1919年3月以前，他参加了党同情者小组的活动。在这期间他得到许多老党员的帮助，直到后来还使他感念不忘的是当时的团党组书记特罗菲莫夫和政委沃尔科夫，他们曾帮助他深入理解党纲党章，培养他入党。

骑兵连里党的同情者小组共五人。尽管人数不多，特罗菲莫夫和沃尔科夫一个星期到他们这里来不少于两次，和他们谈国内、国际形势、党在 frontline 斗争的措施等。这些谈话时间很长而且很有趣，特别是当谈到布尔什维克与沙皇专制制度的斗争和在十月革命前后在彼得堡、莫斯科和其他工业城市里激烈斗争的情景，都令他们十分兴奋。

1919年3月1日，是朱可夫终生难忘的日子。这一天，他光荣地加入了布尔什维克。这是他政治生命的开始，也正因为有了这个开始，他

才得以在苏联红军中一步步地成长，最终成就了他辉煌的军事伟业。朱可夫后来饱含深情地在自己的回忆录里这样写道：

从那以来，许多事情我都记不清了，但我被吸收入党的这个日子，却终生难忘。

是的，自那以后，朱可夫更加努力使自己的思想、愿望和行动服从于党的利益，处处以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作为一个布尔什维克，他以更大的热情和责任感投身到同祖国敌人进行搏斗的事业中去，并且要使自己成为无条件服从人民利益的榜样。

不久，朱可夫所在师调离希波沃车站地域，去消灭尼古拉耶夫斯克城附近的白匪。1919年8月，他们骑兵第4团被调到弗拉基米罗夫卡车站。当时他们师没有卷入直接的军事行动，而是进行战斗训练。

在这里他结识了和他同姓的师政委格奥尔吉·瓦西利耶维奇·朱可夫。事情是这样的。一天清晨，朱可夫经过露天练马场时，看见一个人在那儿“调教”马。走近一看，是师政委。虽然他对骑术和调教术都很在行，但仍想看一看，师政委是怎么调教马的。

师政委没有注意朱可夫，他正满身大汗地训练马左跑步。但不管他怎么使劲，马总是乱跑，不迈左脚，而是先踢出右脚。朱可夫不禁大声喊道：

“把左面缰绳拉紧！”

师政委一句话没有说，把马放慢步，向朱可夫走来。他跳下马来，向他说道：

“好吧，你试试！”

朱可夫二话没说，蹬着马镫子上了马。他骑着转了几圈，熟习一下马的性子。然后，他扯紧缰绳，让马左跑步。跑了一圈，跑得很好，他又跑了一圈，还是很好。又换成右跑步，也不错；再换成左跑步，马的步子一点不乱。

“小腿要夹紧”，他带着训导的口吻说。

师政委笑了笑，他说：

“你骑马有几年工夫啦？”

“四年，怎么啦？”

“没什么，骑得不坏。”

于是他们就攀谈起来。政委问朱可夫，在哪儿当的兵，哪儿打过仗，什么时候调到这个师来的，什么时候入党。他又谈到他自己，他当骑兵10年了，从1917年就是党员。从旧军队他拉过来一个骑兵团的大部分，加入了红军。一切都很清楚，他是一个真正的政委。这次巧遇使他俩成为好朋友，师政委对小朱可夫的成长帮助很大。

4 晋升排连长

在高尔察克进攻失利之后，1919年夏天，协约国把赌注压在了南方的邓尼金身上，向苏维埃政权发起了第二次武装进攻。

6月，邓尼金兵分三路，由南向北向苏俄腹地进犯。

6月底，邓尼金的军队占领了哈尔科夫、察里津（1925年后改名为

斯大林格勒)等战略要地后,其先锋部队一直向莫斯科挺进。

为扭转战局,加强南方战线,斯大林将伏罗希洛夫和布琼尼派往南方领导战斗。朱可夫所在部队也随同调往察里津附近投入战斗。

9月,红军同邓尼金的军队在察里津附近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在扎普拉夫诺耶和阿赫士巴之间进行的一场白刃战中,朱可夫的左腿和左肋被手榴弹的弹片击伤,送进了医院。

朱可夫伤愈出院后,部队给他一个月假期以恢复身体,利用这个机会,他回家乡看望了父母。看到家乡的革命形势令人鼓舞,朱可夫坐不住了,假期刚满,他就向军事委员会请求把他派到前线去。鉴于他的身体还比较弱,军事委员会把他派到特韦尔的一个后备营,之后被送往一个骑兵训练班接受军官培训。

这个时候,邓尼金的部队在红军的打击下已被彻底摧垮。协约国又转而支持波兰和盘踞在克里米亚的弗兰格尔发动了第三次武装进攻。

1920年7月,朱可夫所在训练班被全部调往莫斯科,编入莫斯科第2学员旅,准备开赴前线同弗兰格尔作战。

8月间,朱可夫所在的学员混成团部署在北高加索的克拉斯诺达尔,准备同弗兰格尔的一支登陆部队作战。

由于红军指挥员在战斗中伤亡较大,急需补充,上级批示从学员旅中选一批优秀学员提前毕业,朱可夫也是其中之一。

9月上旬,毕业典礼在第9集团军司令部所在地阿尔维尔城举行。自此,朱可夫成了一名红军的正式军官。

弗兰格尔本身的力量并不强,当战斗进行到10月间,苏俄同波兰签订了临时和约,波兰退出战争,使弗兰格尔的力量更加削弱,离末日来临已为时不远了。

朱可夫没有参加最后消灭弗兰格尔的战斗,他被派往独立骑兵第14旅,参加肃清残匪的战斗。朱可夫被分配去骑兵第1团,担任了一名排长。

在到任的当天,朱可夫向士兵们发表讲话:“同志们,我被任命为你们的排长。究竟我这个排长是好是赖,你们这些战士是好是赖,咱们将来看。现在,我首先要检查一下你们的马匹和装备,和你们每个人认识一下。”

之后,朱可夫和每个战士进行了接触,沟通了感情。尽管如此,一些老兵对他这个学生官多少还是有点不信任。他能领着我们打胜仗吗?一些人心里想。

然而,大家的疑虑很快就消除了。

几天后,在肃清滨海地区残匪的战斗中,朱可夫身先士卒,打了一个漂亮的胜仗,匪徒们被全部歼灭,而朱可夫的排在战斗中却没有受到任何损失。这一下,朱可夫真正在战士们中树立了威信,再也没有人怀疑他的能力了。

很快,朱可夫又得到了提升,成为骑兵第1团第2连连长。当时的团长是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德罗诺夫,他是个非常勇敢、聪明和善良的人。全团人员都爱戴自己的团长并在他的指挥下英勇作战。1920年12月底,独立骑兵第14旅被调往沃罗涅日省,镇压当地富农的暴动和肃清在这一带活动的科列尼科夫匪帮。

匪徒很快就被击溃，其残部逃到坦波夫省，与安东诺夫的富农——社会革命党人匪徒汇合在一起。

5 第一枚红星勋章

1920年12月，苏维埃政权为了肃清安东诺夫匪帮，成立了坦波夫省清匪司令部。到1921年3月1日，司令部下辖的兵力达3.25万名步兵，7948名骑兵，463挺机枪和63门火炮。5月1日，这支部队又增加了5000名步兵和2000名骑兵。但是，坦波夫的军事指挥部由于缺乏组织能力和不够果断，未能肃清安东诺夫匪徒。

疯狂的安东诺夫亲自率领部队袭击了红军的守备部队。这事发生在1921年4月初，为数5000人的一支安东诺夫匪军消灭了红军在拉斯卡佐沃的守备部队。当时他们有一个整营被俘。

不久，苏维埃军事委员会委派图哈切夫斯基担任这一庞大部队的司令官，指挥与安东诺夫匪军作战的军队。

关于图哈切夫斯基，朱可夫他们曾听到过许多赞扬他的话，特别是赞扬他的战役战略才能。战士们都非常高兴，有这样一位有才干的统帅来领导他们。

朱可夫第一次见到图哈切夫斯基是他到他们独立骑兵第14旅来的时候，在坦波夫希纳的热尔达夫卡车站上。当他与旅长谈话时，朱可夫在场。从他的谈话中可以看出他具有指挥大规模战役的丰富知识和经验。

在讨论了他们旅当前的行动后，图哈切夫斯基又和战士、指挥员谈话。他对于谁在哪儿打过仗，部队和居民的情绪如何，他们在当地居民中做过哪些有益的工作等，都很关心。

图哈切夫斯基在离开部队前，他对大家说：

“列宁认为，必须尽快肃清富农的叛乱和他们的叛匪武装。你们肩负重大的任务。应当尽一切可能，尽量快、尽量好地完成任务”

当时朱可夫哪能想到，几年以后他会在国防人民委员部里讨论苏军战术理论原则时又见到图哈切夫斯基！……

自从任命图哈切夫斯基为部队总指挥后，与匪徒的斗争就有了周密的计划。1921年3月，最后歼灭安东诺夫匪帮的战斗打响了。朱可夫连队参加了在维亚佐瓦亚·波奇塔村的战斗。这一仗打得异常艰苦，朱可夫对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3月5日清晨，侦察兵在距村子10公里外的地方发现了大约3000名敌骑兵。骑兵第14旅立刻出动，朱可夫所在第1团被部署在旅纵队的左侧，向前开进。走了不到5公里，朱可夫连就同二百多名安东诺夫骑兵相遇。短暂的交火之后，双方展开了激烈的白刃战。

在战斗中，一名匪徒从未可夫后侧射倒了他的战马。马摔倒时，把朱可夫压在下面。那名匪徒恶狠狠地冲上前，举刀待砍。就在这危急时刻，连指导员诺切夫卡及时赶到，一刀劈死了这个匪徒，把朱可夫从刀口下救了出来。

战斗正在进行中，朱可夫他们发现又一伙匪军骑兵正在向他们侧后迂回。面对敌优我劣的不利形势，第1团决定撤回村子里，将敌人诱至对其不利的地形再行歼灭。朱可夫连担任了掩护全团撤退的任务。

面对敌人的猖狂进攻，朱可夫打得沉着冷静。他且战且退，很好地完成了掩护全团撤退的任务。最后，自己也撤回村子里。

匪徒也逼了过来。在战斗中，朱可夫为了从匪徒手中夺回一挺机枪，纵马冲进一伙敌军中间。激战中，朱可夫的马又被子弹射中，朱可夫只好下马徒步战斗。

敌军纷纷涌上前来，准备活捉朱可夫。这时，又是指导员诺切夫卡领着几名战士冲过来，把朱可夫救了出去。

匪徒们最终被消灭了，朱可夫的连接队也损失惨重。由于在这次战斗中的突出表现，朱可夫获得了他在红军中第一个重要荣誉——一枚红星勋章。

1922年8月31日，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第183号命令这样写道：

1921年3月5日，在坦波夫省维亚佐瓦亚·波奇塔村附近的战斗中，独立骑兵旅骑兵第1团第2连连长不顾敌人1500~2000名骑兵的冲击，率领全连进行了7小时的战斗，阻止了敌人的进攻。最后，他转入反冲击，经6次白刃格斗，击溃了匪徒。为此，授予他红星勋章。

1921年夏末，安东诺夫匪帮被最后歼灭。至此，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取得了国内战争的最后胜利。朱可夫也在这场残酷的国内战争中经受了洗礼，成长为一名出色的红军指挥员。

第四章 军中新星

1 零点起步

国内战争结束后，苏联红军进入了大规模建设的新阶段。为了重振已处于瘫痪状态的国内经济，苏共中央决定减少军费开支，裁减军队员额。这样，到 1924 年，整个武装力量由国内战争时的 550 万人骤减至 56 万人。

在大规模裁军的过程中，朱可夫被最后留了下来。

朱可夫自参加红军之日起，从一个普通士兵晋升为排连长，他始终信守一条准则，那就是以身作则与士兵同甘共苦，处处严格要求自己，从零点起步，向更高的目标攀登。1922 年 6 月至 1923 年 3 月，朱可夫先被调往骑兵第 38 团当连长，后来又被提升为萨马拉骑兵第 7 师第 40 团副团长。在此期间，他坚守自己的人生准则，克服种种困难，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他所献身的军队建设事业中去。

当时在红军大多数部队中，还不具备军人正常生活所必需的设备良好的兵营、首长住房、食堂、俱乐部和其他设施。他们分散在村子里，住的是农民的小屋，做饭是行军灶，马匹拴在院子里。那时他们都认为，这样的生活条件是正常的，因为国家正经受着巨大的困难。

部队的领导干部大多是年轻力壮、精力充沛、意志坚强的人。再者，他们大多数是单身汉，除了工作以外，没有什么牵挂。他们兴高采烈地工作，每昼夜工作 15~16 小时，但要把各种各样的事情都安排妥当，仍感到时间不够。

1923 年春天，朱可夫接到师司令部的电话通知，要他去见师长。原因不明，应当承认，当时他多少有点紧张，是不是出了什么错？

师长卡希林热情地接待了他，请他喝茶，长时间地询问他们团战斗和战术训练的情况。后来，他又突然问朱可夫道：

“你看，我们对骑兵的训练是否符合未来战争的需要？对未来战争你是怎么看的？”

这个问题在朱可夫看来很复杂。他脸红了，一下子回答不上来。很明显，师长看出了他有些慌张，耐心地等他镇静下来。

朱可夫回答说：“为了按现代要求来训练部队，我们指挥员还很缺乏必要的知识和技能。我们现在是按着在旧军队所学的来教部属的。为了能很好地训练部队，必须用现代军事知识武装领导干部。”

“这是对的”，师长同意地说，“我们尽力做到我们的指挥员能进军事政治院校和训练班。但这是一个比较长的过程，而我们的学校又很少。所以指挥员首先得自学。”

他在房内走了几步，突然向朱可夫宣布，已决定任命他为布祖卢克骑兵第 39 团团长的。

“我对你虽不十分了解，但和我谈过话的许多同志推荐你担任这个职务。如果没有反对意见，请你去司令部看批件。任命的命令已签署了。”

朱可夫同师长分手后，心情十分激动。新的职务十分光荣，责任也十分重大。他心里想，指挥一个团始终被认为是掌握军事学术的最重要环节。

团是基本战斗部队，团一级的战斗需要组织陆军各兵种的协同动作，有时还不仅限于陆军的各兵种。团长必须熟悉下属各分队，以及在战斗情况下通常配属给团的加强兵器。团长必须善于在战斗中选择主要方向，并把基本兵力集中于主要方向。这一点当敌人在兵力兵器上占有优势时特别重要。

一个团长，如果能熟练地掌握对团的指挥方法并能保障团经常保持战斗准备，那么……朱可夫十分珍惜这一机会，他暗下决心，只要自己努力在这个岗位上不断锤炼自己，将来一定能成为一个优秀的指挥员。

朱可夫所接手的这支部队，是一支纪律松懈、训练较差的落后团队。朱可夫上任后，大刀阔斧地进行了营区建设，加强了全团的战斗训练和纪律教育。很快，就使这支落后的团队成为师里的尖子团。

朱可夫深知自己在实际工作方面的能力要比理论上强，为了提高自身的理论水平，他抓紧一切时间给自己“充电”。团的工作繁杂而琐碎，有时一干就是十几个小时。朱可夫只好向睡眠和休息要时间。对他来说，牺牲一点休息时间是值得的，只有获得知识才能休息得安心。

2 百炼成钢

仲夏，国内战争的英雄加伊担任了朱可夫他们师的师长。

he 现在是怀着愉快的心情来回忆和加伊师长一同工作时的情况。他们第一次见面是在野营帐篷里，当时加伊召集各团团长和政治委员开会。进门报告以后，加伊让大家围着他的工作桌坐下来。朱可夫发现他是一个漂亮的、军人姿态端正的人。他的眼光里流露出友好的神情，他平和、安静的声音说明他具有沉着的性格且充满自信。朱可夫过去听到过许多关于加伊的英雄事迹，这次他十分注意地观察他们的师长，真想深入到他的灵魂深处，看清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指挥员。

谈话继续了很长时间。同师长的第一次会见给大家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当告别时，师长对朱可夫说，几天以后他想看看他们团的乘马队列教练和战术教练。他们团受到重视，朱可夫感到十分荣幸，不过他承认团里还有许多缺点。

“让我们共同来克服这些缺点”，加伊微笑着说，接着补充了一句，“你很要强，这很好”。

三天以后，根据师司令部的指示，他们全团带出进行检阅。师长骑着一匹全身乌黑而腿是白色的马登上了小山岗，注意地观看团的演习。他那匹马性情暴烈，但是骑手用他有力的手和紧夹马肚的小腿使它乖乖地听从指挥。

朱可夫进行演习指挥时，起初用口令，后来用马刀（所谓“无声演习”），再后来用号音。变换队形、行进、转弯、变换方向、立定、看齐等动作，部队做得比朱可夫本人估计的要准确得多。最后，全团展开成散兵线向敌人冲锋进行包围（这是哥萨克人沿用的一种冲击动作）。朱可夫在战斗队形的中央，率领全团向师长所在的高地冲去。到达高地后，全团向中央靠拢看齐，他走近师长，准备报告演习结束。还没有等他开始报告，师长高高举起双手并喊道：

“我投降，投降，投降！”然后他走近朱可夫，热情地说道，“谢

谢，非常感谢！”

他走到队伍的中央，站在马镫子上向战士们说道：

“我是一个老骑兵，很熟悉骑兵的战斗训练。今天你们的行动说明，你们认真地、竭尽全力地尽到了红军战士对祖国的职责。作为红军战士，正应该这样。具有优良的战斗训练，正确认识对人民的职责，这是我们英雄红军不可战胜的保证。谢谢你们，今天你们使我非常高兴。”

师长转向朱可夫，和他握手，微笑地对他说：

“让同志们去休息吧，我和你去看看野营的设备。”

加伊师长对这次演习做了充分肯定，使大家很受鼓舞。朱可夫从师长对待普通红军战士那种平易近人的态度中学到了许多东西，他想加伊不仅是一位首长，而且是一位可亲的老同志，是一位最优秀的共产党员。

9月末，上级要求朱可夫所在萨马拉骑兵第7师开赴奥尔沙地域参加军区的演习。这次演习也像野营训练一样，是国内战争结束后的第一次。

师长指定朱可夫指挥的团担任师主力的前卫。这就是说该团不仅必须在短时间内完成长距离行军，而且必须执行行军警戒的任务，经常做好准备，以便能迅速展开与“敌人”“战斗”，并应为师主力投入“战斗”创造最有利的条件。

拂晓时，派往前方的侦察员向朱可夫报告，在莫斯科—奥尔沙铁路线那面，有“敌人”军队向奥尔沙车站方向运动。在奥尔沙接近路上，掩护铁路枢纽部接近路的部队已投入“战斗”。

像在演习中常见的那样，带白袖章的调理员从四面八方驰向朱可夫团。调理员是帮助领导排练演习的指挥员。

“关于‘敌人’你了解多少情况？”

“你的决心是什么？”他们提出各种问题。

朱可夫回答说，他马上到前队去，亲自进行实地勘察，在那里定下决心。两腿一夹马刺，几分钟后，他就跑到前队。前队由积极主动的康斯坦丁·秋宾连长指挥。

秋宾向他报告，“敌人”近两个团的步兵已展开成临战队形，在铁路线一侧向前面高地方向运动。在高地一带我步兵已投入战斗。“敌人”步兵很显然还不知道我骑兵部队已进入这一地区，因为他们既没有碰到“敌人”的警戒，也没有碰到“敌人”的侦察。

前队指挥员还没有报告完，发现一群骑兵向他们跑来。其中一人骑着一匹全身乌黑而腿是白色的马，他们远远地就认出是师长加伊。朱可夫简短地重复了一下刚才了解到的情况后，向师长报告说：“现在是向‘敌人’发起突然冲击的最有利时机，我决定全团立即展开成战斗队形向敌人翼侧冲击，特别是地形对我们的冲击非常有利。”

师长用望远镜观察了一下，然后说道：

“罕见的好机会，大胆行动吧！在攻击以前，用全部炮兵机枪火力进行射击。师的主力20~30分钟即可到达。他们将向‘敌人’集团的背后进行突击，以便彻底摧毁‘敌人’”。

一个小时以后，整个“战场”烟雾弥漫，第7师的几个骑兵团展开成战斗队形，高喊“乌拉”向“敌人”冲去。整个景象真是动人壮观，战士的脸通红，眼睛紧紧盯着前方，像在真的战斗中一样。“战斗停止”的信号中断了“战斗”的进一步发展。到此整个演习结束。

在 1923 年 9 月举行的这次军事演习中，朱可夫的团及时捕捉战机、战斗作风勇猛顽强，不仅师长加伊十分满意，还得到了演习总指挥图哈切夫斯基的高度赞扬。

此后不久的一天，国内战争时期的传奇英雄布柳赫尔来到朱可夫团。他视察了宿舍、食堂和文娱设施后问道：

“你们的战备情况怎么样？要知道你们离国境线不远。”

朱可夫回答说，全团人员都清楚了解自己的职责，随时准备履行对祖国的义务。

“那很不错嘛。现在请你向全团发出‘警报’信号。”

说实话，这是他所没有料到的，但他毫不慌张地向团值班员命令道：

“发出‘战斗警报’信号”。

一小时以后，全团在驻地集合完毕。布柳赫尔非常仔细地检查了骑兵的驮载、武器、装备及其一般战斗准备。他特别仔细地检查了机枪连，对一个机枪班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因为他们没有按规定往机枪内注水，而且毫无水的储备。

布柳赫尔问道：

“你们知道这种疏忽在战争中会导致什么后果吗？”

战士们无言对答，脸胀得绯红。

“要从这个错误中吸取教训，同志们。”

布柳赫尔在检查过战斗准备以后，提出一个补充战术情况：假设敌人正接近一个非常重要的战术地区，企图很快地夺取它。“敌人”距该地区 12 公里，而我团距“敌人”约 25 公里，这就是说，有利的战术地区位于我团和“敌人”的中间。

时间紧迫，已不允许向下级指挥员说明情况、解释战斗任务，因为延误时间“敌人”就可能先于我方到达该地区。朱可夫决定：第 1 连带 4 挺重机枪和一门火炮作为前队随他快步前进，战斗任务在途中布置。团的主力在副团长指挥下距前队 3 公里行进，准备投入遭遇战。

在前进中不断变换步法，有时用跑步。最后前队得以先“敌”占领该有利战术地区，组织火力迎击敌人。

战斗结束后，布柳赫尔向全团讲话：

“谢谢你们，指战员同志们，你们忠诚地履行了军人职责。你们团今天显示出一切都是应当受到称赞的。我号召你们忠诚地继承并发扬光荣的萨马拉骑兵师的战斗传统，这个师曾同白卫军和干涉军进行过英勇战斗。希望你们随时准备完成我们伟大祖国的战斗命令。”

全团报以“乌拉”的欢呼声。很显然，布柳赫尔热情的话语使战士们很受感动。朱可夫毫不隐瞒他对眼前这位天才统帅——传奇英雄的热爱和崇敬。他梦想有一天会成为像他那样令人仰慕的英雄人物。

3 高校深造

1924 年，联共（布）决定对红军进行改组，以提高战斗力，并把军事科学的新发展吸收进去。这期间，红军总参谋部成为真正的首脑机关。

1925 年 1 月，才华出众的伏龙芝担任了陆海军人民委员及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成为军事改革的关键人物。

伏龙芝大胆提拔一些在国内战争中表现出众的青年军官以代替一些

保守的高级军官。为了提高指挥员的水平，伏龙芝十分重视院校教育，认为和平时期院校是造就指挥员的摇篮。

1924年7月，朱可夫所在师的师长加伊召见了朱可夫。加伊对朱可夫在业余时间刻苦自学给予了表扬，同时指出：“这还不够，军事理论在发展，我们的指挥员需要比较系统地学习一些军事问题。”加伊决定推荐朱可夫去列宁格勒（即彼得堡）高等骑兵学校学习。

朱可夫第一次来到了革命的发源地列宁格勒。在那里，他怀着浓厚的兴趣走遍了十月革命时作过战的地方。这时候，他根本不会想到，17年后他会在这里指挥列宁格勒方面军抗击法西斯的侵略。

在高等骑兵学校里，朱可夫为了成为一名杰出的军事指挥员，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在这个学习班里，朱可夫同罗科索夫斯基、巴格拉米扬等后来都成为了苏军元帅。

罗科索夫斯基元帅曾回忆“我们在列宁格勒高等骑兵学校里是同学。当时，没有一个人能像朱可夫那样，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军事科学的研究上。只要看一看他的房间就清楚，地图铺满地板，上面勾画得密密麻麻。从那时起，朱可夫就把事业、职责置于一切之上。”朱可夫后来之所以能够成为叱咤风云的元帅，正是因为他在学习军事学术中走过了一条漫长的路。

朱可夫入学不久，高等骑兵学校改名为骑兵指挥员训练班，学期由两年改为一年，这使得课程变得更为繁重。朱可夫他们拼命地抓紧时间自学。后来在回忆这段历史时，朱可夫说：“现在想起当时学习军事知识的那种坚忍不拔、狂热执着的劲头，自己都感到吃惊。”

在训习班里，朱可夫他们主要学习军事理论和政治课。他们常常通过沙盘作业和地图上作业学习理论。另外，他们还学习了骑术，特别是掌握了骑马长途行军和泅渡骑兵的高难动作。课余时间的文体活动，则练习使用马刀和剑术。

一年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在结业的时候，朱可夫打算检验一下他学习的成果。为此，他和另外几名同学向训练班领导提出不乘火车而骑马返回他们在明斯克的驻地。

朱可夫的计划被批准了。经过长达7昼夜，长途跋涉近千公里，朱可夫顺利地回到了明斯克，受到团里战友的热烈欢迎。朱可夫为此也受到嘉奖。

4 军中新星

回到部队以后，朱可夫发现部队的编制有了很大变化。师下辖的团由过去的6个改为4个，朱可夫的第39团此时已被合并到第40团，新编第39团由过去的第41团和第42团合并组成。朱可夫被指派为新编第39团团长。

一年的学习，使朱可夫进步很大。尽管改编后的团一级工作比过去更复杂了，但朱可夫觉得不论是军事工作还是政治工作，处理起来都得心应手，应付自如。在朱可夫的领导下，新编第39团的工作又走在了全师的前面。

这时候，作为军事改革的一项重要措施，苏军开始采取单一首长制。由于朱可夫所取得的突出成绩，引起了上级领导对他的重视。1926年冬，骑兵第3军军长铁木辛哥和政委克罗赫马尔在军部召见了朱可夫。

“朱可夫同志，我们叫你来是想让你在担任团长的同时兼任团的政委，成为团的单一首长。我希望你能胜任这一新的重要角色。”铁木辛哥向朱可夫通告了军里的决定。

担任团的单一首长后，朱可夫的工作担子更重了。在他的努力工作下，团里的各项工作显得井井有条。不久，整个军区都知道了朱可夫的这个团。

1927年春，布琼尼来到朱可夫的团视察，对朱可夫的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此后，不断有重要人物来到这里。朱可夫这颗新星正在日渐引起人们对他的注意。

1928年4月，国内战争中的英雄塞尔基奇担任了骑兵第7师师长。朱可夫对这位新师长的能力深为折服。通过参加由塞尔基奇组织的几次演习，朱可夫感到自己战术素养有了很大提高。他把塞尔基奇称为“一个称职的教员，一个杰出的教师。”

英雄惜英雄。塞尔基奇对朱可夫这位下级，也充满了好感，在一份关于朱可夫能力的报告中写道：

……是一个精力充沛、果断的指挥员。由于朱可夫同志在教育和作战训练方面的工作，该团在各方面都达到了要求的水平……作为一个团长和单一首长，他应该被提前晋升。

1929年年末，朱可夫又被派往莫斯科，进高干深造班学习。

这个时候，苏联的无产阶级军事科学已经开始形成。在莫斯科，朱可夫对此做了系统的学习，并阅读了大量的军事理论著作，了解了现代战争中人与技术兵器的关系、未来战争的性质、各军兵种协同作战以及战略后方与前线关系等战略问题。这期间，红军副参谋长特里安达菲洛夫的著作《现代军队的作战特点》一书，引起了朱可夫的浓厚兴趣。

在《现代军队的作战特点》一书中，特里安达菲洛夫根据当时军队的状况和武器装备发展的现状，对未来战争提出了大胆的设想，特别是对坦克在未来战争中的作用给予了高度肯定。此外，特里安达菲洛夫在书中还第一次探讨了战役学问题，对师、军、集团军和方面军进攻和防御的能力，战场开进、战役持续时间和纵深，进攻正面的宽度以及防御战役的实施等进行了研究。朱可夫深入地研究了这些理论，掌握了一系列重要的战役战术题目。

1930年春，朱可夫从高于深造班毕业返回部队，并被提升为骑兵第2旅旅长。

朱可夫开始把他在课堂上学来的理论广泛地运用于实践，在实践中验证这些新理论，并不断地融入自己的创造。

正当朱可夫准备在部队大干一番事业的时候，1930年年底，鉴于他在骑兵部队的出色表现，他被调往莫斯科，担任红军骑兵监察部助理，协助布琼尼工作。

骑兵监察部在红军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它除负责骑兵的日常工作检查外，还组织首长—司令部演习、野外演习以及交流军事训练的先进经验及各种集训和作业。考虑到朱可夫在骑兵战斗训练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他被指令分管这一工作。

在骑兵监察部，朱可夫参加制定了红军第二代条令。其与第一代条令的显著区别是，新条令强调诸军兵种协同作战的理论，规定使用坦克、防空和防化学武器。

在制定第二代条令的过程中，朱可夫因工作需要，同当时任第一副国防人民委员的图哈切夫斯基有了多次接触。对图哈切夫斯基的军事指挥才能和军事理论水平，朱可夫早就慕名已久。通过和图哈切夫斯基本人的接触，他更被图哈切夫斯基对军事问题、特别是战略战役问题的敏锐观察力和深刻见解所折服。他把图哈切夫斯基称为“伟大军事思想的宝库”，是“军事杰出人物中的一颗灿烂的明星。”

新的工作岗位使朱可夫得以从更高的层次上去认识战役战术问题。这对他后来的发展起了关键的作用。

朱可夫在监察部的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绩，这使他又一次得到了提升。1933年3月，监察部向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举荐了朱可夫，让他担任骑兵第4师师长。这一任命充分体现了红军领导层对朱可夫的信任与赏识。

骑兵第4师是一支有着光荣传统的部队。现任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是它的首任师长，该师是著名的骑兵第1军的主力。第二任师长是现任骑兵监察部部长布琼尼。在内战期间，布琼尼曾率领该师立下了赫赫战功。但是，眼下这个师却面临着荣誉危机。这一来是因为布琼尼走后的几任师长领导不力，二来也有客观原因。1931年，骑兵第4师属列宁格勒军区。1932年，该师被匆忙调往白俄罗斯军区。由于换防仓促，各方面工作没有跟上，对该师的日常训练及管理造成很大影响。伏罗希洛夫一向视该师的荣誉如自己的荣誉，为此他同布琼尼交换了意见，决定为该师物色一个能干的师长，重新树立起它的光辉形象。

凭着过去对朱可夫的了解，加上近两年一同工作中的亲身感受，布琼尼认为朱可夫是担任第4师师长最合适的人选。

朱可夫任职仪式是布琼尼亲自主持的。在仪式结束时，布琼尼激动地对朱可夫说：“第4师过去是最优秀的骑兵师，今后它也应当是最优秀的骑兵师！”

朱可夫在担任骑兵第4师师长后，一方面下大力气解决部队的营房设施建设问题，另一方面严格纪律，重点抓了部队的训练工作。朱可夫那铁腕式的管理风格也就在这时开始形成。

在第4师，朱可夫首先集中主要力量对各级指挥干部进行教学法训练，对中高级指挥人员重点进行战术训练。

根据多年来的经验，朱可夫认为只有自身战术素质过硬的指挥员才能训练出能征善战的部队。朱可夫本人也非常重视战术训练，他把它视之为全部军事训练的最重要部分。事实上，他自己在长期的军队生活中，不论是作为一名战士，还是最后成为国防部长，都始终在不倦地学习战术。

朱可夫特别重视在实战条件下进行部队的训练。为此，他经常把全

师拉到野外，训练在复杂条件下作战的科目。

就在朱可夫大刀阔斧地按自己的方式重塑第 4 师的形象时，发生了一件事，让朱可夫很不愉快。

在朱可夫就任师长半年后，军区司令员乌博维奇发现第 4 师的面貌还没有根本改变，于是便给了朱可夫一个处分。

这是朱可夫一生中的第一个处分。朱可夫对此感到很难接受，一来要想使一支部队脱胎换骨，半年时间是根本不够的，二来第 4 师事实上已经开始在向好的方向发展，因此他向国防人民委员会上书申诉，并表示不愿在乌博维奇手下继续工作。

乌博维奇获知这一情况后，重新审查了对朱可夫的处理情况，并亲自去朱可夫的部队检查了各项工作。最后，他找到朱可夫，告诉他：“我发现，对你的处分是不公正的，希望你继续在这儿干下去。”

“可以认为处分撤销了吗？”朱可夫不依不饶。

“毫无疑问，处分是错误的”。

这个不愉快的插曲就这样结束了。朱可夫和乌博维奇也不打不相识，由此成为了朋友。

经过朱可夫一年的艰苦工作，人们惊喜地发现，过去那支威武之师又回来了。

1935 年，在白俄罗斯军区组织的年度大检阅中，第 4 师在作战训练和政治训练等各科目上都取得了出色的成绩。为此，该师获得了政府的最高奖励——列宁勋章。同时，朱可夫个人也获得了这一殊荣。

从这时起，朱可夫赢得了更多人对他的注意。他的名字开始频频出现在苏联的大小报刊上。1936 年，他在政治上也迈进了一大步，被指定为参加起草新宪法草案的军事委员会成员。

就这样，在短短的几年中，朱可夫这颗军中新星，以耀眼夺目的光彩在冉冉升起，更美好的前程正在向他招手。

5 军事理论之争

1929 年，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通过一项决议，决定在 1929—1930 年组成常备试验的机械化部队。据此，1929 年，苏军首先在白俄罗斯军区组建了第一个机械化团。第二年，该团被扩编为机械化旅。1932 年，苏军组建了世界上第一批机械化军，每个军装备有 500 多辆坦克和 200 多辆汽车。到 1936 年，苏军已建成了 4 个机械化军，6 个机械化旅，6 个机械化团。此外，在骑兵师还编有 15 个机械团。

机械化军编制的出现，标志着军事理论上的一大突破。这就意味着坦克将作为一支独立的打击力量出现在现代战场上。这与当时大多数国家普遍奉行的坦克支援步兵的观点截然相反。可以说，在运用坦克作战的理论和实践方面，苏联当时远远走在了前面。

在苏军建起世界上第一批机械化军的同时，以图哈切夫斯基为代表的苏联的军事理论界提出了向纵深进攻作战的理论。这被认为是 30 年代苏联军事学术最主要的一项成就。

大纵深进攻战役理论的主要内容是：首先对敌整个战术纵深实施突击，以突破敌人正面；然后使用机械化部队投入突破口，并在航空兵的

帮助下向敌整个战役纵深实施进攻，直至完全消灭敌军集团。该理论的特点就是强调大量使用坦克、航空兵、炮兵、空降兵，实施深远战线和广泛空间的立体战争。这一理论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

但是，军事理论界所取得的这一成就，在当时并未在苏军领导层内部取得一致，很多人还依然留恋着给他们带来荣誉的骑兵，认为坦克只有被分散配属给步兵或其他部队才能发挥作用。由于这些人很多是国内战争中的著名将领，因此对斯大林影响很大。结果，机械化军这一在后来的战争中被证明是充分正确的编制形式在当时还只是属于试验性质，用以验证装甲部队独立运用的优劣。

在这场争论中，朱可夫是一位坚定的“坦克派”。他不仅在各种场合大声疾呼大量使用坦克，而且通过他领导的机械化第4团进行有关大规模使用坦克的试验。

“坦克怀疑论”者的一个主要顾虑是无法解决快速的坦克部队同速度较慢的步兵之间在战术上的协调问题。朱可夫通过试验，提出使用摩托化步兵，结果较好地解决了利用坦克快速突破所取得的成果。

1936年，西班牙内战爆发。根据西班牙政府的请求，苏联决定援助西班牙政府。

1936年秋，经伏罗希洛夫举荐，朱可夫作为苏联的主要军事观察员之一被派往西班牙。

与朱可夫同行的，都是苏军的杰出人物，其中后来成为元帅的就有三位：朱可夫、马利诺夫斯基和沃罗诺夫。实际上，他们都是被作为西班牙政府的军事顾问派去的。

朱可夫他们在西班牙还有一项重要任务，就是通过西班牙这场小型战争来检验苏制坦克的性能及坦克作战使用的问题。为此，苏军向西班牙派去了一批小规模坦克部队。这支部队的成员都不是普通的战士，他们大多是坦克部队的中下级指挥员，在这里试验装备的性能并取得实战经验。

苏联这些坦克部队在西班牙参加了多次战斗，却战绩不一。有些战斗打得很出色，有些则很糟糕。特别是在非特·德·爱布罗的战斗中，40辆苏联坦克通过泥泞地带投入了战斗，结果只有12辆最后返回阵地。

西班牙内战提供了试验场，新式武器得到试用，一些有争论的现代战术观点，也可以在这里加以研究。

但是，作为一场小型战争，西班牙的经验并不典型。可是苏军内部对大量使用坦克持怀疑态度的人却以此大做文章。同为军事观察团成员、时任苏军坦克部队领导人的巴甫洛夫，在他写给斯大林的报告中断然否定现代战争中坦克能发挥独立的作战作用。

结果，尽管朱可夫等人据理力争，但斯大林最终还是被“坦克怀疑论”者说服了，解散了大部分坦克部队，使坦克仍然退居步兵辅助武器的地位，导致了苏军编制体制上的重大退步。对此，朱可夫痛心疾首。

6 将才崭露

当朱可夫他们还在西班牙验证坦克的作战作用理论时，远隔千里之外的苏联却发生了一起令人心痛的惨剧。

30年代中期，苏联党的政治路线却滑到了“左倾”的轨道。1937年2月，斯大林在联共（布）中央全会上提出一个论点，即随着苏联社会主义的胜利发展，阶级斗争将日益激烈和尖锐。这次会议以后，苏联国内早已开展的“肃反”运动更加扩大化，并最终伸进了军队内部。

从1937年5月至1938年11月期间，苏军最早的5名元帅中的图哈切夫斯基、叶戈罗夫和布柳赫尔先后被冠以“反苏军事中心”罪名被杀害。同一时期遇害的还有：15名集团军司令中的13名，85名军长中的57名，195名师长中的110名，406名旅长中的220名。根据苏联《在国外》周刊1988年第22期透露：“斯大林在1937—1938年的肃反运动中，处死了近3.5万名红军指挥员。”

这场大灾难不仅仅席卷了苏联国内，而且还蔓延到了西班牙。在西班牙内战初期担任西班牙政府首席军事顾问的别尔津将军被押回国内处决。在朱可夫身边，还有许多军官甚至有许多年轻军官都被召回国内交付审判。

是什么原因导致如此众多红军指挥员遇害的呢？

1961年10月，赫鲁晓夫在苏共22大闭幕词中透露了一些情况。赫鲁晓夫说：

“有一次在国外报纸上出现了一条奇异的新闻，说什么希特勒在准备进攻我国时，通过自己的谍报机关假意遗落了一份假文件，说雅基尔、图哈切夫斯基等同志是德国总参谋部间谍。这“机密”文件落到了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贝斯手中，看来他是出自良好的愿望把文件转交给了斯大林。因此，雅基尔、图哈切夫斯基等同志便被逮捕，然后就被杀害了……”

赫鲁晓夫在报告中还讲到，所谓轰动一时的反苏军事中心，完全是德国情报机关一手策划的，并且利用了苏联党的“左倾”错误和斯大林对一部分军方领导人的不满和怀疑情绪。实际上，这些被指控为叛国和反党活动罪而遭到镇压的数万名军官，全部是无辜的。

大清洗带来的后果是灾难性的，它不仅导致苏军丧失了众多的优秀指挥员，而且导致了苏联军事理论的严重倒退。这一点，在后来关键性的几年中逐步表现了出来。芬兰战役的失利和苏德战争初期的惨败就是明证。

埃里克森对清洗后的红军统帅机关评论说：“除了沙波什尼可夫，最高统帅部的人不是平平庸庸就是缺乏经验。”也正是由于这种平庸和缺乏经验占了主导地位，朱可夫和沙波什尼可夫关于组建大规模机械化部队的建议未被采纳，而且连现有的机械化部队也化整为零改组掉了。

值得庆幸的是，在这次大清洗中有几位有才能的将领得以保留，比如：沙波什尼可夫、华西列夫斯基、朱可夫、罗科索夫斯基等，这些将领的起用，使红军在大战初期遭受挫折时能够重新振作起来，并取得最后的胜利。

在这场大清洗中，朱可夫并未受到太大冲击。以朱可夫耿直的性格，难免会得罪不少人，其中不乏个别小人会借此机会进行报复。事实上，也确实有一些人四处搜寻不利于朱可夫的材料，但是朱可夫最终还是逃过了这场灾难。

朱可夫所以能成为大清洗的幸存者，他的军事经验和工作能力固然是一个原因，但更重要的原因还得益于他的骑兵身份。因为，斯大林对

骑兵出身的领导人特别信任，因此在大清洗中骑兵领导人受到株连只有很少的几个人，仅存的两名元帅伏罗希洛夫和布琼尼也都是骑兵出身。他们所领导的部队在内战时期曾经是斯大林的西南战线的重要力量。因此，对这支部队里出来的人，斯大林总是显得格外宽厚一些。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朱可夫最终没有遇害或被解职，反而得到了提升，取代被捕的塞尔基奇，担任了骑兵军长。

1937年秋，朱可夫从西班牙回国任骑兵第3军军长，7个月后，又调任骑兵第6军军长。

在任军长期间，由于政治环境的恶化，朱可夫相对地沉默了。他不再大声疾呼有关机械化部队建设的建议和设想，但是，朱可夫关注坦克部队建设的思想丝毫没改变。他仍然坚定地认为，在未来战争中，坦克和机械化兵团将发挥前所未有的作用。

朱可夫是一个具有坚定理想的人，他不仅对理想极具热情，而且，他十分注意骑兵与坦克部队的协同问题及战斗和战役中对坦克防御的组织问题，并结合部队演习加以检验和完善。他深有感触地说：“在进行师—军指挥员导演、首长—司令部演习、实兵演习时，他总是亲自制定战役战术计划，从中使他受益匪浅。

到军长岗位之后，朱可夫感到自己对战略问题研究不够，因此，他开始下功夫阅读大量战史材料，经典军事学术著作，借以研究战略和战役问题。与此同时，朱可夫也深刻体会到大清洗带来的后果，故他十分重视对年轻干部的培养。

朱可夫任骑兵旅长时，正是日本在千里之外对中国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为了声援中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同时也为了在远东牵制日本，1937年8月21日，苏联同中国国民党政府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日军攻陷南京后，苏联更加强了对中国的援助。

1937年底，第一批苏联飞行员来到中国。此后，不断有军事教官、军事技术人员来到中国。1938年夏，经斯大林批准，朱可夫随苏联一个军事使团来华，了解日本军队的战略战术，同时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

1938年冬，鉴于日军对苏联远东地区的压力，加上苏军领导力量的薄弱，朱可夫被召回国，被委以白俄罗斯特别军区副司令员的重任。

朱可夫这位天才的军事家，在军内的地位不断上升，他以刻苦学习的精神适应新的岗位，军事才干也随着地位的升迁而不断增长，使他肩负起一个又一个重任。

第五章 哈勒欣河之战

1 奔赴远东

1939年5月末，朱可夫在明斯克地域组织了一场首长—司令部演习。演习结束后，6月1日，朱可夫在骑兵第3军司令部进行讲评。下午，正当朱可夫的发言时，军区军事委员苏赛科夫气喘吁吁地闯了进来，打断朱可夫的发言，低声告诉他，莫斯科紧急通知，令他立即动身，明天向国防人民委员报到。朱可夫暗自思忖，“一定是军情紧急”，立刻结束总结，马上前往车站，搭乘一列通过此地的货车前往莫斯科。

6月2日清晨，朱可夫赶到伏罗希洛夫的接待室。秘书告诉他，伏罗希洛夫谢绝一切活动，一直在等他，秘书还说：“你进去吧，我马上去命令给你准备远行的行装。”

“什么远行？”朱可夫不解地问。

“进去吧，人民委员会告诉你一切的。”

正说着，伏罗希洛夫已迎出门来，握住朱可夫的手连声问好。进门后，伏罗希洛夫神情严肃地说：“日军突然侵犯我友邻蒙古的边界。根据1936年3月12日的苏蒙条约，苏联政府有责任保卫蒙古不受任何外敌侵犯。”

他拉着朱可夫走近地图，“这是日军入侵地区5月30日的情况图，”他指着地图说：“在这一带，日军长时间地对蒙古边防哨所进行小规模挑衅性袭击，而在这一带，日军的海拉尔警卫部队侵入蒙古人民共和国领土并袭击防卫哈勒欣河以东的蒙古边防部队。”

“我认为，”伏罗希洛夫接着说：“这里孕育着严重的军事冒险。无论如何，事情并没有到此结束。你是否可以立即飞到那里去，如果需要的话，把部队的指挥权接过来？”

朱可夫坚定地回答：“我马上可以起飞。”

“非常好，”伏罗希洛夫满意地说，“你的坐机下午4点可准备好，在中央机场。你到斯莫罗季诺夫那儿去，在那里你可以拿到必要的材料，同时商量一下今后同总参谋部的联系问题。派给你几个专业军官，在飞机上等你。再见，祝你成功！”

离开伏罗希洛夫后，朱可夫即驱车赶到总参谋部，见到代副总参谋长斯莫罗季诺夫。他同朱可夫详细商量了今后的联系问题。最后，他对朱可夫说：“我请你到达目的地后，立即弄清当地的情况，然后，坦率地告诉我们你的意见。”

下午4点，朱可夫及随行人员离开莫斯科，飞往远东。

2 接任军长

朱可夫乘车去市中心的中央机场，从那里乘机直飞赤塔，从那里又到军区去了解最新情况。得知日军活动猖獗，天天侵入蒙古领空，从空中扫射在公路上行驶的各种车辆。

6月5日晨，朱可夫乘车来到驻蒙步兵第57独立军司令部。从情况汇报中，他感觉到军部领导并不了解战场真实情况，便问军长费克连科：“你是否认为可以从距战场120公里以外的地方指挥部队？”军长回答

说：“我们在这里是远了一点。可是，在发生冲突的地域，我们尚未做好准备，前方电话电报线路连一公里也没架设，也没有现成的指挥所和着陆场。”他接着问：“面对这种情况你们准备怎么办？”“……我们准备派人去搞木料，然后构筑指挥所”。

从交谈中朱可夫发现军的领导人中，除了政委尼基舍夫外，其他人都没到过发生冲突的地域，于是他立刻建议军长到前边去，在那里现场研究情况。但军长借口莫斯科可能随时来电话找他，他让政委陪朱可夫同去。

通过对发生冲突地域的观察，和与苏军及蒙军指挥员的谈话，使朱可夫对已发生的战事的性质和规模有了进一步了解。同时他发现苏军和蒙军行动中的缺点，主要是对日军缺乏周密侦察。

通过全面了解情况，朱可夫敏感而果断地得出结论：“这不是边境冲突，日军并没放弃其侵略我远东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企图。必须估计到，不久会发生大规模行动，而一旦日军发起大规模进攻，我驻蒙第57独立军无力阻止敌军，特别是如果敌人同时从其他方向发动进攻的话，我军就更无能为力了。”

针对这种情况，朱可夫向莫斯科紧急报告：必须加强我方航空兵，另外，至少要派3个步兵师和1个坦克旅来蒙古，同时要大大加强炮兵力量。

报告通过电报发出后，第二天便收到了回答。伏罗希洛夫与斯大林商量后，完全同意朱可夫对情况的判断和下一步的行动计划。同一天，伏罗希洛夫发布命令，解除费克连科第57特别军军长职务，命朱可夫接任军长。

3 大败日本关东军

朱可夫的这些要求很快得到批准，总参谋部立刻增派了空军力量，其中有21名荣获苏联英雄称号的飞行员，并送来了现代化的伊—16和“鸥”型飞机。

从6月中旬起，蒙古上空展开了一场空前残酷的战斗。双方展开大机群作战，飞机多达二百多架。日军统帅部动用了最好的飞行员，企图夺取制空权，但未能得逞。苏联飞行员严密封锁领空，草原上不时腾起一个个黑色浓烟的烟柱，日军飞机一架接一架被击毁。22日到26日的空战中，日军共损失64架飞机。

日本关东军飞机的活动目的很明显，想挫伤苏联空军力量并夺取制空权，以保障其部队将要进行的大规模进攻战役。

日军指挥部打算，于7月上半月完成进攻战役，以便在秋季到来之前结束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全部军事行动。日军指挥部对自己的胜利十分有把握，他们甚至把一些外国新闻记者和武官邀请到作战地区，观看他们的胜利进军。

7月2日，日陆军乘夜暗偷渡了哈勒欣河，并向蒙军骑兵第6师驻地发起进攻。由于日本在数量上占有优势，在7月3日拂晓前占领了巴英查岗山及其邻近地区。

形势发生了严重变化。鉴于这种紧急情况，朱可夫命令苏方所有预

备队立即出动，向巴英查岗山方向挺进并向敌人进攻。当时，日军在巴英查岗山集中了 1 万余人，而苏军只有 1000 多人。日军拥有近 100 门火炮和 60 门反坦克炮，而苏军只有 50 门火炮，其中还包括从哈勒欣河东岸进行支援的火炮。

但苏方投入战斗的有坦克第 11 旅的近 150 辆坦克，有摩托化装甲第 7 旅的 154 辆装甲车，还有装备 45 毫米加农炮的蒙军装甲第 8 营。

朱可夫决定利用装甲坦克兵团这一王牌，从行进间歼灭刚刚渡河的日军，不给敌人以喘息之机。7 月 3 日 9 时 15 分，朱可夫命令坦克第 11 旅，在航空兵掩护下加速前进，不迟于 10 时 45 分向敌人发起进攻。

上午 10 时 45 分，150 辆坦克一起向日军发起冲击。在敌阵地上摆着 160 门火炮，在匆匆构筑起来的掩体里藏着日本兵，他们用 5 米长的竹杆举着地雷。苏军坦克兵用火力和履带摧毁日军炮兵，使日军仓皇失措，到处乱跑乱窜。

7 月 4 日，战斗继续激烈进行到 5 日凌晨，敌人最后被粉碎，日军仓皇向渡口退去。但他们自己的工兵，由于害怕苏方坦克的突破，已把渡口炸毁。日军军官全副武装跳入水中，结果大部分都被溺死。

战场上，日军几千具尸体，大量被击毙的马匹，狼藉不堪，一堆堆被击毁的火炮，机枪和车辆铺满了巴英查岗山。在几天的空战中，日军损失飞机 45 架。其中包括 20 架俯冲飞机。

巴英查岗山一仗，是红军积极防御作战的典范战例。红军粉碎了日军的重兵集团并守住了哈勒欣河东岸的防御阵地，从而大大鼓舞了红军和蒙军的斗志。巴英查岗山的作战经验表明，一支善于同空军和机动炮兵协同作战的坦克摩托机械化部队是实施快速作战行动的决定性因素。

8 月 12 日，日军一个加强步兵团，在 22 架轰炸机的支援下卷土重来向蒙军阵地发起强攻，占领了战线南端的大沙高地，并沿全线积极建立防御。

苏蒙军指挥部抓紧进行总攻准备工作，预计 8 月 20 日前发起总攻，以最后粉碎入侵的日军。

朱可夫认为，能否达到战役战术的突然性，是决定这次战役胜败的决定因素。必须以突然的行动歼灭敌军，使其无法反击。这时朱可夫特别注意到，日军没有良好的坦克兵团和摩托机械化部队，无法迅速从次要方向调来部队抗击红军的突击集群。

兵不厌诈，为了达到战役的突然性，必须隐蔽行动，造成敌人错觉。为此，红军专门拟制了欺骗敌人的计划，如发布假情报，使敌人弄不清真实意图。这些措施给敌人造成一种印象，似乎红军没有任何进攻性质的准备，进行的仅仅是防御性工作。

为了有效地迷惑敌人，苏蒙军的一切运动、集中、变更部署都在夜间进行。部队夜间调动也以各种嘈杂音响如飞机飞行、火炮、机枪等射击作掩护。各部队严格按照调动计划制定的时间表制造各种嘈杂声音。

为做好保密工作，朱可夫决定在集团军群司令部内，总攻计划由司令员、军事委员、政治部主任、参谋长和作战部长亲自拟制。各兵种司令员和首长、后勤部长只根据司令员批准的计划分别制定有关计划。战役计划、命令、战斗号令及其他作战文书的打印只由一名打字员负责。

这一系列伪装措施收到了预期效果。当 8 月 20 日苏蒙军队发起合围

并歼灭日军的总攻时，日关东军许多将官和校官还在后方休假呢。

清晨 5 时 45 分，开始炮火准备，红军炮兵突然向敌人开火。紧接着 150 架轰炸机在 100 架歼击机的掩护下猛烈轰炸日军阵地。炮火准备和空中轰炸航空火力准备持续了三个小时。然后，部队沿 70 公里正面发动全面进攻，红军坦克在两翼冲破了日军的防御阵地，机械化部队和蒙古骑兵跟在坦克后面，迅猛冲向敌阵。

21 日和 22 日进行了激烈战斗，敌人在大沙地域进行顽抗，朱可夫当即下决心从预备队中抽出摩托化装甲第 9 旅投入战斗，并加强部分炮兵。到 8 月 26 日，完成了对日军第 6 集团军的合围，26 日以后，开始分割歼灭被围的敌军集团。

日军极为顽固个个都是亡命徒，常常战至最后一人。日军当局告诉士兵，“他们当了俘虏也得被枪毙，而且在枪毙前还得折磨个半死。”这类恐吓宣传对士兵的拼死反抗是起了作用的，当然他们也有胆小鬼。记得 8 月的一天，天刚亮，一名被蚊子咬得不像样子的日本兵被押进了观察所。朱可夫问这个日本兵，他是怎么搞成这个样子的？日本兵回答说，他和另一个士兵昨天黄昏受命躲在芦苇里，暗中监视苏军的行动，但没有给他们防蚊用具。

连长命令他们在芦苇中不许乱动，以免被发现，夜间成群结队的蚊子扑来，他们咬紧牙关忍受着蚊子的叮咬，一动不动地待到第二天早上。这个日本兵说：“可是俄国人一喊话，端起了枪，我就举手投降了，因为我再也忍受不住这种折磨了”。

通过审讯，朱可夫了解到这个日本士兵被俘的那个地区的日军情况，为了让他开口，朱可夫特下令给他半杯伏特加酒。可这个日本兵看了看这杯酒，却对朱可夫司令说：“请您先喝一口，我害怕中毒。我父亲只有我一个儿子，父亲开一个百货店，我是他惟一的继承人。”真是岂有此理，令人啼笑皆非。

1939 年 8 月 30 日，侵入蒙古的日军第 6 集团军被全部歼灭。这一事实，迫使日军当局重新考虑对苏联武装力量威力和战斗力的估计，特别是对苏联军人政治上坚定性的估价。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在 11 月 7 日的命令中写道：“哈勒欣河战斗的参加者——战士和指挥人员获得了真正的荣誉。参加哈勒欣河作战的军队，表现出英勇和自我牺牲的精神，卓越地执行了战斗命令，应受到嘉奖。”

蒙古人民尊重和热爱的领袖乔巴山于八月份来到哈马尔—达巴山上的他们的指挥所时，向苏军和朱可夫司令员表示感谢，并称赞朱可夫是蒙古人民的忠实朋友。

第六章 出任总参谋长

1 初次会见斯大林

1939年秋季，朱可夫在苏蒙边界哈勒欣河大败日本关东军后，立刻接到莫斯科的命令，到人民委员部报到，重新分配工作。他到达莫斯科时，正值政府颁布授予红军高级指挥人员将级军衔的命令。朱可夫被授予大将军衔。

几天以后，斯大林亲自接见了朱可夫，这是朱可夫第一次见到斯大林，心情非常激动。接见时，房间中除了斯大林，还有加里宁、莫洛托夫和其他政治局委员。斯大林和朱可夫打招呼以后抽起烟斗，并向朱可夫问道：“你认为日军怎么样？”朱回答说：“与我们在哈勒欣河作战的日军士兵训练不错，特别是近战。他们守纪律，执行命令坚决，作战顽强，特别是防御战。下级指挥人员受过很好的训练，作战异常顽强。他们一般不会投降，剖腹自杀时毫不迟疑。但中高级军官训练差，缺乏主动性，习惯于墨守成规。至于日军的技术装备，我认为是落后的。日军的坦克相当于我们的MC—1式坦克，非常落后，武器很差，最大行程小。应当说，在战役初期，日军的空军比我们强，在我们还没得到改装的‘鸥’型和伊—16以前，他们的飞机比我们优越，但当以斯穆什克维奇为首的荣获苏联英雄称号的飞行员来到以后，制空权就牢牢地掌握在我们手中了。应当指出，与我们作战的是日本的精锐部队，是所谓的皇军”。

斯大林很感兴趣地听着朱可夫的介绍，然后他又问道：“我们的部队打得怎么样？”

朱可夫详细地汇报了苏军的士气，说：“我们的正规部队打得很好。彼得罗夫指挥的摩托化步兵第36师和来自外贝加尔由加拉宁指挥的步兵第57师都打得很出色。但是，由乌拉尔调来的步兵第82师开始打得不好，这个师的指战员训练时间很短，在开赴蒙古以前不久才扩编的。补充了不少刚入伍的新兵。我们的坦克部队打得很出色，特别是由苏联英雄科夫列夫旅长率领的第11旅表现突出，如果我们没有这2个坦克旅和3个摩托化装甲旅，肯定不会如此迅速地合围并歼灭日军第6集团军。我认为，我们必须大大扩充装甲坦克部队和机械化部队。我们的炮兵在各个方面都比日军强，特别是射击方面，稳操胜券的部队在整体上比日军强得多。蒙古部队也打得很好，特别是他们的装甲营在巴英查岗山打得很好，应当承认，蒙古的骑兵易于遭受飞机袭击和炮火的杀伤，他们受到的损失很大。”

斯大林沉思片刻后又问：“库利克、巴甫洛夫和沃罗诺夫是怎么帮助你的？”

“沃罗诺夫在计划炮兵火力和输送弹药方面给了我们很大帮助。至于库利克，我看不出他做了什么有益的工作。巴甫洛夫向我们的坦克手介绍了他在西班牙获得的经验，对我们很有帮助。”

朱可夫目不转睛地望着斯大林，看到他很有兴趣地倾听他的讲述，于是继续说：“对于我们所有部队、兵团指挥员、部队指挥员和我本人，哈勒欣河的战斗都是一个学习战斗经验的好机会。我认为，日本方面也

会通过这次战役，对红军的作战能力得出一个比较正确的结论。”

这时，加里宁插话问朱可夫：“你认为，日本政府入侵蒙古，它追求的主要目标是什么？”

朱可夫不假思索，胸有成竹地回答道：“近期目标是夺取哈勒欣河以西的蒙古人民共和国领土，然后沿哈勒欣河建立筑垒地区，以掩护其筹划修建的第二条战略铁路。这条铁路将从中东铁路的西面伸向我外贝加尔边界”

这时，朱可夫想到了德国与英法集团之间的战略态势问题，就向斯大林问道：“斯大林同志，我不知该如何理解西方战争的极端消极性？下一步战事将会如何发展？”

斯大林笑着说：“以达拉第为首的法国政府和以张伯伦为首的英国政府不愿认真对希特勒作战。他们仍在怂恿希特勒同苏联作战。1939年他们拒绝同我们建立反希特勒同盟，他们不想束缚住希特勒侵略苏联的手脚。但这对他们没有什么好处，他们自己要为这种近视的政策付出代价。”

这次谈话，斯大林的外表，低沉的声音，对问题深刻的分析，渊博的军事知识以及听汇报时聚精会神的神情，都给朱可夫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2 出任总长

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里接见了朱可夫，并聚精会神地听取了他的报告。尔后，斯大林对他说：

“现在你已经有作战经验了。你到基辅军区去，用自己的经验训练部队吧。”

就这样，朱可夫便于第二天走马上任，当上了基辅大军区司令。到职后，待的时间不长，约有几个月时间，主要抓了一次大型战役战略演习。该演习的总导演是国防人民委员铁木辛哥和总参谋长梅列茨科夫。

演练的总题目的：以苏联遭到法西斯德国突然袭击为背景，组织“红”、“蓝”两军的防御和进攻的战役战略演习。苏方为“红军”，德国为“蓝军”。西部特别军区司令巴甫洛夫上将扮演“红军”，基辅军区司令朱可夫扮演“蓝军”（即“德军”）。双方各自准备，进行大规模的战役战略演习，设想以此作为战略情况基础。如在苏联遭到德国突然进攻时西部边界可能发生的情况。

斯大林十分重视这次演习，要求各军区和各集团军司令员，各军区和各集团军事委员和参谋长，各军事院校校长，教授和军事科学博士，各兵种监察部部长，各总部和总参谋部领导干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自始至终参加了这次大规模演习。

斯大林召见这次演习的总导演铁木辛哥，详细询问了演习的准备情况。问铁木辛哥，“谁扮演‘蓝方’？谁扮演‘红方’？”

这次演习预计达到的战略目的，是检查战争初期军队的掩护和行动计划中的主要措施是否可行，是否合适，有无抵御德国发动突然袭击的能力。总参谋部提供的作战背景材料，充分反映了法西斯德国军队最近在欧洲的行动。

根据斯大林的建议，此次演习的总讲评将在克里姆林宫里进行。演习结束后，国防人民委员部和总参谋部的领导人、各军区司令员及参谋长均被邀请到克里姆林宫。除斯大林外，出席讲评的还有政治局其他成员。

总参谋长梅列茨科夫大将报告了演习的经过。当他谈到双方力量对比的数字和“蓝”方在演习开始阶段的优势，特别是坦克和空军的优势时，斯大林（听到“红方”的失利感到气愤）打断他的话说：

“不要忘记，在战争中重要的不仅是数量上的优势，还有指挥员和军队的作战艺术。”

斯大林接着又追问道：

“‘红方’部队行动失利的原因在哪儿呢？”

担任演习中“红方”司令的巴甫洛夫想用一句俏皮话支吾过去，他说“胜败乃兵家常事，演习中失误这是常有的事。”斯大林显然很不爱听这句俏皮话。于是，严肃地批评了巴甫洛夫说：

“军区司令员应掌握军事学术，应善于在任何情况下得出正确的结论。而你在这次演习中没有做到这点，表现很差。”

回忆起来，这次演习充满着戏剧性情节。据朱可夫后来回忆，当时“红”、“蓝”军在“战场”上所发生的一切情况，在很多方面，与1941年6月22日苏联遭到法西斯德国进攻后所发生的情况相仿。几乎出现了惊人的一致。

在演习讲评的第二天，斯大林召见朱可夫。一见面，斯大林就开门见山地对朱可夫说：

“政治局决定解除梅列茨科夫总参谋长的职务，任命你接替他。”

这个决定完全出乎朱可夫意料之外，他不知道如何回答。沉默了一会儿，他对斯大林说：

“斯大林同志，我从没有在司令部工作过。我一直在部队里。总参谋长我干不了。”

“政治局决定任命你，”斯大林说，他把重音放在“决定”两个字上。斩钉截铁、口气坚定。

当朱可夫明白了任何反对都无济于事时，他表示感谢对他的信任，然后说：

“好吧，如果发现我不是一个称职的总参谋长时，我将请求再回部队。”

“好吧，我们谈妥了，明天中央颁布命令，”斯大林说。

一刻钟以后，朱可夫到国防人民委员铁木辛哥那里。他微笑地对朱可夫说：

“我听说了，你拒绝担任总参谋长的职务。刚才斯大林同志给我打电话了。现在你回军区去，尽快到莫斯科来。基尔波诺斯上将受命接替你，当军区司令，但你不必等他，暂时让军区参谋长普尔卡耶夫代理司令职务。”

朱可夫立刻启程奔赴莫斯科。在伟大卫国战争前夕，于2月1日，到达莫斯科的第二天就接替了梅列茨科夫大将的工作，当上了苏军总参谋长。

战前五年时间里，斯大林下令更换了四个总参谋长。这样频繁地更

换总长，使新任总长不可能完全掌握国防情况，也不可能深入地全面考虑未来战争的一切方面。

3 良言苦谏

朱可夫上任后深感形势岌岌可危，战争迫在眉睫，于是便认真抓了战前军队动员计划和战役战略展开计划。其实，在他上任以前，在沙波什尼科夫元帅、梅列茨科夫大将和瓦杜丁中将领导下已经制定了作战计划和动员计划，只不过由于斯大林的错误估计形势，选错了德国军队的进攻方向，使苏军在战争初期造成重大损失。

斯大林错误地认为，法西斯德军在对苏战争中首先是力图占领乌克兰和顿涅茨河流域，以夺取苏联最重要的经济地区，掠夺乌克兰的粮食、顿涅茨克的煤，然后是高加索的石油。斯大林在 1941 年春天审查作战计划时说：“没有这些最重要的资源，德国法西斯就不可能进行长期的大规模的战争，德军的主要突击方向必定在这里。”

斯大林享有崇高的威望。任何人都没有想到去怀疑斯大林的意见和他对形势的分析。但是斯大林在判断敌人的主要突击方向上确实犯了错误。

1941 年 2 月批准了军队动员计划（组织问题和物质问题）的最后一个方案，称这“—41 号计划”，这个计划下发各军区，并指示在 1941 年 5 月 1 日以前完成原动员计划的修改。西部国境的筑垒地域是从 1940 年初开始构筑的。构筑筑垒地域的方案，是斯大林根据伏罗希洛夫和沙波什尼科夫的报告批准的。可是工程 1941 年 6 月还没有完成。

战争开始前建成的钢筋混凝土工事约有 2 500 个，其中 1000 个装备有要塞炮，其余的 1500 个只装备有机枪。

关于新的筑垒地域，国防人民委员和总参曾多次指示各军区加速构筑。每年有将近 14 万人在新国境线上构筑工事。

朱可夫援引总参谋部 1941 年 4 月 14 日就这个问题专门下达一个训令摘录，着重指出，一直到战争爆发也没有真正建筑起来。

“红军总参谋部虽三令五申，但永备工事安装武器和做好战斗准备的进度，仍迟缓得令人不能容忍”。

根据斯大林的错误指示，当时认为最危险的战略方向是西南方向的乌克兰，而不是西部方向的白俄罗斯。而 1941 年 6 月希特勒统帅部恰恰将主突方向选在西部方向，在白俄罗斯方向集中使用了最强大的陆军空军集团。正是白俄罗斯方向距离苏联首都莫斯科最近。

这一错误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朱可夫作为总参谋长不得不在战争的前几天里，把早先集中在乌克兰和后来调往那里的第 19 集团军全部和第 16 集团军的许多部队和兵团，转移到西部方向，加入西部方面军的编成内从行进间进入交战。毫无疑问，这个情况对于西部方向的防御作战进程是有影响的。这便贻误和失去了战机，给敌人提供了有利条件。

斯大林在战前，轻信了情报部门向他提供的假情报，并对真情报做了错误的分析。作为总参谋长的朱可夫和作为国防人民委员的铁木辛哥并不了解那些情报。直到 1953 年 3 月斯大林病逝后，从历史档案中才查明那些宝贵的情报，也弄清了斯大林在战争迫在眉睫情况下，仍听不进

朱可夫正确分析和评估的奥秘。

明明知道德国法西斯军队在苏波边界、苏德边界大量集结军队，形势每况愈下，朱可夫决定调动部队，针锋相对，下令进入一级战斗准备，斯大林仍犹豫不决，生怕触犯了德国，影响两国关系，给人以口实，受人以柄。

直到 1941 年 6 月 20 日晚上，德军发起进攻的前一天深夜，基辅军区参谋长普尔卡耶夫中将向朱可夫紧急报告，从一德军投诚司务长口中得知，德军已进入出发阵地，德军将在 6 月 22 日凌晨全面发动进攻。

获悉如此重大情报后，朱可夫立刻向斯大林报告。他依然忧虑。他问：

“这个投诚者不会是德国将军为了挑起冲突而派来的吧？”

铁木辛哥果断地回答：“绝对不是。我认为投诚者说的是实话。”

朱可夫主张立即命令边境军区进入一级战斗准备。斯大林不同意。他认为“现在下令为时尚早，也许问题可以和平解决。”还一再叮嘱“边境部队不要受任何挑衅影响，以免问题复杂化。”经过朱可夫的争取，下了一个命令，但将斯大林的命令也写进去。凌晨才将命令下去，使边境部队无所适从。过了三个半小时，德国法西斯军队就背信弃义，不宣而战。

德军发起总攻时，斯大林正在克里姆林宫里睡觉。朱可夫向他报告。开始，秘书不接电话，说怕影响斯大林休息。经过朱可夫一再坚持，才叫醒斯大林。他听朱可夫十万火急的报告后，在电话里沉默好长时间不表态。最后，让他们和政治局委员立刻到克里姆林宫来开会，说需要讨论一下。

人员到齐后，斯大林还坚持说：

“应该立刻给德国使馆打一个电话。”

不久后，德国大使主动找上门来，向外交部长莫洛托夫递交了一份“宣战书”。

斯大林顿时脸色苍白，木然地坐在那里，手里握着装满烟草的烟斗。沉思，一阵长时间的令人难以忍受的沉寂。

朱可夫站起身来，建议立刻下令迎战、还击……

战争初期，由于准备不足，前线一片混乱。为了集中智慧有效地统率这场战争，成立了统帅部。后来又成立了国防委员会和最高统帅部，斯大林担任最高统帅。

为了摸清前线情况，斯大林于 6 月 22 日下午 1 点打电话通知朱可夫：“我们各个方面军司令员缺乏足够的作战指挥经验，看来有点发慌。政治局决定派你到西南方面军担任统帅部代表。还准备派沙波什尼科夫和库利克去西方面军。他二人已到我这里接受指示。你必须马上飞往基辅，会同赫鲁晓夫到设在捷尔诺波尔的方面军司令部去。”

朱可夫问斯大林：“在目前这样复杂的情况下，由谁来领导总参谋部呢？”

斯大林答道：“让瓦杜丁留下吧。”

然后稍微带点怒气地补充说：“请你抓紧时间。不必担心我们，这里好歹可以对付。”

情况不明，斯大林心里发慌，急于查明前线两军态势，和千方百计

地打乱德国法西斯军队的闪击战进攻的布局。

在整个伟大卫国战争期间，朱可夫曾以统帅部代表的名义深入前线组织、协调各方面军的作战行动，就地指挥战略性战役，先后共有 15 次之多，而且不管深入到哪里，都备受下边方面军领导和全体指战员的热烈欢迎。而敌人的情报机关一直在密切跟踪他的行动，他们都把他看作“克星”，一提“朱可夫”的名字都胆战心惊，恐惧万分。

朱可夫是杰出的总参谋长，临危不惧，头脑冷静，思维敏捷，洞察深刻，判断情况准确，是统帅最得力的助手。哪里告急，斯大林就把他派往哪里；几度临危受命，几度扭转败局，他上受最高统帅的信任，下受全体指战员的爱戴。他在人民心目中，是胜利的象征。

朱可夫火速飞抵乌克兰基辅后，经过深入调研，进一步了解到，7月19日，希特勒发布了下一阶段作战的指令，规定从博克元帅手中调出中央集团军群的装甲部队，派往两翼，其中古德里安装甲兵团掉头向南，去帮助勒布的北方集团军群攻打列宁格勒。

7月29日，朱可夫打电话给斯大林请求接见，有紧急情况向他报告。随后，朱可夫带着一张战略形势图、一张德军部署图以及苏军状况和苏联物资技术储备的材料，来到了斯大林的办公室。

“来吧，报告你的想法吧。”斯大林说。

朱可夫拿着地图，列举了各个方面军损失的数字，报告了编组预备部队的进程，指明了德军的位置及其部署，分析了德军可能采取的战略行动。斯大林眉头紧锁，微微俯身仔细地看地图。

“你从哪里知道德军将如何行动？”善于察颜观色的苏军总政治部主任麦赫利斯在一旁挖苦地问。

“我不知道德军将要行动的计划，”朱可夫回答说，“我们的建议是基于对敌军，首先是对敌人在战略性战役中起主导作用的装甲坦克和机械化部队的状况的分析提出来的。”

朱可夫继续报告说，莫斯科战略方向上的德军，由于损失太大，最近不可能实施进攻战役；列宁格勒方向上的德军，在没有得到补充兵力之前，不可能夺取列宁格勒；乌克兰的德军正在与苏军对峙。朱可夫认为，苏方最薄弱和最危险的地段是中央方面军，德军可能利用这个弱点，向西南方面军的侧翼和后方实施突击。

“你的建议是什么？”斯大林带着一种十分奇特的神情问道。

“首先加强中央方面军，至少给它增加得到炮兵加强的3个集团军。同时委派一位经验丰富、能干的方面军司令员，具体说我建议由瓦杜丁担任。”朱可夫继续说道，“西南方面军必须全部撤过第聂伯河，把兵力集中起来，以免被敌包围。”

“基辅怎么办，”斯大林蓦地站了起来。

朱可夫停顿了一下，他知道，放弃基辅对斯大林，对所有苏联人意味着什么。但他暗暗告诫自己，不能感情用事，作为一名军人在祖国和人民面前有责任提出自己认为当前惟一可能采取的建议。

“基辅不得不放弃，”朱可夫紧盯着斯大林的脸色说道，“在西部方向需要马上组织反突击夺回叶利尼亚的突出部，这个桥头堡可能被敌人用来进攻莫斯科。”

“哪里还有什么反突击？真是胡说八道，把基辅交给敌人，亏你想

得出来。”斯大林冲着他一向依赖的总参谋长怒吼起来。

朱可夫脸色一阵红一阵白，他实在忍耐不住了，回敬道：“如果你认为我这个总参谋长只会胡说八道，那么还要他干什么。我请求解除我的总参谋长职务并把我派到前线去。我在那里可能对祖国更有好处一些。”

“请你冷静些，如果这样提出问题，那么我们缺了你能行，”斯大林烦躁地说，“你回去吧，我们马上研究一下再叫你。”

半小时后，朱可夫迈着沉重的步子重新回到斯大林面前。

斯大林板着脸宣布，决定解除朱可夫的总参谋长职务，由沙波什尼科夫接任。斯大林问朱可夫：“你愿意去哪里？”

“我可以做任何工作，可以指挥一个师，一个集团军，一个方面军。”

“你刚才说到要在叶利尼亚附近组织反突击，那就请你负责这件事吧。现任命你为预备队方面军司令。”

“我一个小时后就赶去报到。”说完，朱可夫敬了个军礼，转身就要走。斯大林拉住了他的手，口气温和、脸带微笑地说，“请注意，你仍然是最高统帅部的成员，来来，我们再一起喝会儿茶，还可以谈谈别的内容。”

朱可夫勉强坐了下来，一小时后，他动身前往设在格查次克的预备队方面军司令部。

事实证明朱可夫是完全正确的。基辅会战历时一个半月，最后以苏军惨败而告终。9月19日，基辅失陷。约有65万名苏军官兵被德军俘虏，大量物资装备为德军缴获。一再坚持死守基辅的赫鲁晓夫，在基辅失陷前半小时，同布琼尼、铁木辛哥乘飞机仓皇离开基辅，险些当了德军的俘虏。

当初斯大林非但没有听取朱可夫的逆耳忠谏，还不公正地撤了他的职。朱可夫带着满肚子委屈赶到叶利尼亚前线后，立刻全身心地投入工作。每天工作20个小时左右，以拼命的工作忘却自己受到的不公正对待。他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不仅察看地形、熟悉部队，而且亲自审问德军俘虏，了解德军的部署和官兵的士气情况，做到知己知彼。尔后，他精心制定了周密的作战计划。

8月中旬，朱可夫向叶利尼亚地区的德军发起进攻。战斗十分激烈。双方在所有地段同时展开激战。德军用密集的大炮和迫击炮火力图阻止苏军的进攻。朱可夫胸有成竹，沉着应战，下令动用方面军所有的飞机、坦克、大炮和新研制的“喀秋莎”火箭炮予以还击。在朱可夫卓越的指挥下，苏军于9月6日攻占了叶利尼亚。这次战役，苏军共歼敌近5个师，消灭德军约5万人。这是苏德战争开始以来苏军取得的第一次重大胜利；苏军的士气大为提高，胜利的信心更加牢固。斯大林听了这一消息，立即打电话给朱可夫，感慨地说，“你们是好样的！”并命朱可夫返回莫斯科。

9月8日，朱可夫回到莫斯科。斯大林紧握住他的手亲切地说：“你一仗打得不错。你那时是对的（指朱7月29日的报告）。现在想上哪？”

“回前线去，”朱可夫干脆地说。

“回哪个前线？”

“您认为需要去的那个前线。”

斯大林脸上露出少有的舒心的笑容。他说：“去列宁格勒吧！列宁格勒处境十分困难。德国人如果夺取了列宁格勒，并且同芬兰人会合，就能从东北面迂回莫斯科，那时的形势就更加严重得多。”

朱可夫表示坚决服从，但他要求允许他带两三位将军去，替换过度疲劳的司令员们。斯大林说：“你愿意带谁就带谁去吧！”随后，斯大林又就各方面军领导改组及敌人下一步的行动征求了朱可夫的意见。

哪里危急，朱可夫就会在哪里出现。

1941年9月9日，朱可夫带领他亲自挑选的三位将军，乘专机飞往列宁格勒。

第七章 保卫列宁格勒

1 飞往“困城”

1941年9月10日晨，天气阴沉、凉爽。朱可夫来到首都中央机场，准备飞往被围的列宁格勒。停在跑道上的飞机旁站着3个人，高个的是霍津中将和科科佩朱少将，稍矮一些的是费久宁斯基少将。根据朱可夫的请求经斯大林批准这三位将军与朱可夫同行，充当朱可夫的助手。

机长报告说，全体机组人员已做好飞行准备。大家不约而同地看了看天空，心中暗自预测着航线上的天气。天空乌云密布，云层很低。

机长微笑着对朱可夫说：“请您放心，我们能钻过去！在敌军上空飞行，这样的天气最合适。”

飞机立即起飞。前面是列宁格勒，朱可夫的心早已飞到那里。当时他没有预料到，所去的城市，将是一个同敌人和饥饿进行900天无比英勇斗争的城市。

朱可夫的座机向列宁格勒飞去。从莫斯科到拉多加湖一路上阴雨绵绵。云层低是一个逃避敌机的“良好”气象条件。这样的天气不便于敌人歼击机起飞，可以安心地无须掩护地飞行。但在飞抵拉多加湖附近时，天气转好了，因而不得不用一个歼击机中队掩护飞行。在湖的上空，朱可夫的座机遭到德军两架“麦塞什密特”式飞机的追击，因而采用超低空飞行。不久，该机在市内要塞机场安全着陆。当时没有时间去打听，为什么派出的掩护中队没有把敌机赶走。他们急着赶往列宁格勒方面军军司令部所在地——斯莫尔尼宫。

在斯莫尔尼宫进口处，门卫挡住朱可夫他们，索取通行证，朱可夫等说出了自己的姓名，但也无用，公事公办嘛。说什么也不让进。

“将军同志，您只好等一下。”卫兵说后去找卫队长。等了约一刻钟，司令部卫队长才允许他们进入斯莫尔尼宫。

在门口，司令员办公室的一位工作人员接待了他们。

“伏罗希洛夫同志在哪里？”朱可夫问。

“大将同志，他正在举行方面军军事委员会会议。”

“都有谁参加？”

“几位集团军司令和兵种勤务主任、波罗的海舰队司令，以及国家重点保护单位的负责人。”

朱可夫等三位将军走进二楼司令员办公室。在一间大屋里，十来个人坐在一张铺有红呢绒台布的桌旁。同伏罗希洛夫、A.A.日丹诺夫相互问候后，经允许他们列席会议。过了一会儿，朱可夫将斯大林的短信交给伏罗希洛夫。元帅默默地读完了信，轻轻点点头，将信递给A.A.日丹诺夫，继续开会。

当时方面军军事委员会提出的问题核心是放弃该城市应注意什么：一旦扼守不住列宁格勒，应采取哪些措施。大家简短而冷静地发表了意见。提出的措施，包括破坏一些重要的军事、工业及其他目标。这些计划是难以置信的。而当时呢？当时局势危急，敌强我弱，有人认为根本守不住列宁格勒，但是，朱可夫挺身而出据理力争，最后一致同意朱可夫的意见，决心保卫列宁格勒，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

在做出这一决定的时刻，大概每一个参加会议的人都特别强烈地感到，要胜利完成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和国防委员会赋予的任务，责任十分重大。

朱可夫感到高兴，因为他同方面军、波罗的海舰队的许多指挥员、党政工作人员过去都共过事，了解应该派谁去干什么。特别令人兴奋的是，联共（布）党中央委员书记安德烈·亚历山德罗维奇·日丹诺夫主持列宁格勒党的工作，并担任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他是一位深受列宁格勒人、方面军和舰队敬重的卓越组织家，一个可敬而热诚的人。

9月10日晨，在没有公布正式命令以前，遵照最高统帅的亲笔信，朱可夫走马上任，当上了列宁格勒方面军司令。

9月10日晚上开始直到清晨，朱可夫同A.A.日丹诺夫、伏罗希洛夫、海军上将伊萨科夫、方面军参谋长和方面军各兵种司令商讨了局势和保卫列宁格勒的补充措施。

朱可夫到达后，根据实际情况，立刻调整部署和武器装备，当他查明，在方面军各个地段上都感到反坦克炮严重缺乏时，他立刻决定用能穿透坦克装甲的高射炮兵代替反坦克炮。为此需要立即从城市防空部队中抽调部分高射炮，并将其配置到最危险的地段。

方面军军事委员会一致认为，必须在各个易受攻击的方向上立即组织纵深梯次配置的、健全的防御，在通向城市的要道上密集布雷，敷设部分带电网的障碍物，并特别注意普尔科沃高地。

但是，需要火速予以加强的，首先是普尔科沃高地——乌里茨克地区的防御。为此，从卡累利阿地峡（芬军在这里受阻）抽调第23集团军的部分兵力给第42集团军。除方面军火器外，决定将波罗的海舰队所有的舰炮火力集中支援这里。

同时以波罗的海舰队水兵、列宁格勒各院校人员组建5至6个独立步兵旅，限6至8天内完成。

朱可夫历来雷厉风行，处事果断，要求上述措施，从9月11日清晨开始执行。

军事委员会的成员，除A.A.日丹诺夫、A.A.库兹涅佐夫和朱可夫外，还有列宁格勒州委书记什特科夫、州执行委员会主席索洛维约夫、市执行委员会主席波普科夫。这个强有力的领导班子工作很齐心协力，有创造性，干劲十足，从不计较时间和不顾疲劳，相互取长补短，决不相互掣肘。

法西斯匪徒丧尽天良。他们丧心病狂地对重要目标——工厂、大专院校、车站、医院、中小学校、商业中心进行炮击和轰炸。法西斯匪徒不顾一切地进攻。敌人逼近到了列宁格勒城市附近。9月11日拂晓，敌人重新开始进攻，并且不断加强着自己的突击集团，终于在日终前占领了杜杰尔戈弗。

次日，迫于敌人的兵力优势，苏军不得不放弃红谢洛。防守普希金城和斯卢茨克的部队也处境危急。

形势要求采取有效而坚决的行动。哪怕有最小的可能性，也要日夜连续反击敌人、疲惫敌人，消耗其有生力量和技术兵器，破坏其进攻措施。必须在部队中建立严格的秩序和纪律，大大改进军队指挥。9月11日，朱可夫将他挑选的两位战将安排在重要岗位上。M.C.霍津将军被任

命为方面军参谋长，9月14日方面军事委员会任命费久宁斯基将军为第42集团军司令。

稳定列宁格勒局势的措施，要在非常复杂的情况下实施。敌人不断施加压力。特别是在普尔科沃方向的第42集团军防御地带。不应当忽略其他方向——施吕瑟尔堡和奥拉宁包姆，尽管敌人在那里实施次要突击也不应当忽视，因为这样会使情况更加复杂。

在防御战中空军司令诺维科夫上将，指挥舰队和方面军的航空兵有效地支援地面部队击退德军猛烈的攻击，做出了重大贡献。

希特勒三令五申反复催促“北方”集团军群。司令冯·莱布陆军元帅尽快夺取列宁格勒，好把第4坦克集群的机动兵团解脱出来，调给莫斯科方向的“中央”集团军群。

方面军军事委员会清楚地认识到，列宁格勒的防御形势非常危急。为了消除严重威胁，决心将方面军的最后一个预备队——步兵第10师投入战斗。这是最后一个了！决心本身含有巨大的冒险性，但当时，朱可夫深知舍此别无他法。

9月14日晨，在短促而猛烈的炮火准备之后，步兵第10师与友邻兵团协同，在航空兵支援下，对敌人实施迅猛的突击。紧张战斗的结果，使防线恢复了原来的态势，敌人遭到重大损失，放弃了索斯诺夫卡和芬兰科伊诺沃。

朱可夫将军分析研究了当时的情况，力求首先查明敌人的可能动向，摸清其统帅部的意图，判明包围列宁格勒的敌军的强点和弱点。必须确定用多大兵力、兵器和何种作战方法抗击突向列宁格勒的敌人，粉碎其企图。

在考虑保卫列宁格勒的计划时，朱可夫首先注意到敌人在进攻中已处于被动，部队在宽大正面格勒上分成3个集团。主要兵力——坦克和步兵从南面指向列宁城。诚然，冯·莱布深信，正是在这时他可以从战线中央一举突入列宁格勒。然而，由于郊区建筑物密集并有大片森林，敌人只能沿道路进攻。苏联红军可以利用这一情况，用炮兵和迫击炮火力严密封锁所有道路；以航空兵的轰炸破坏道路；用工程障碍物加强防御，以此阻止敌人前进。朱可夫集中精力抓住了两个极重要的问题；坚定军民的必胜信念，以及建立预备队，以增大方面军防御纵深。以第8集团军的兵力对德军实施的突然突击应立见成效。

他清楚地认识到，应特别重视处于最危险方向的第42集团军。规定在这里组织的防御要能粉碎敌人以正面突击夺取列宁格勒的一切企图。他认为舰队和海岸炮兵的行动具有很大作用，战线愈靠近海，他们的行动就愈加重要。

后来的事态发展表明，这一计划是行之有效的。

从9月14日起，朱可夫通过电报同沙波什尼科夫交谈当时列宁格勒的概况和商讨组织防御所采取的措施。

沙波什尼科夫询问朱可夫采取了什么措施。

朱可夫：“今日日终前，我们在敌人前进道路上组织了炮兵（其中包括海军炮、高射炮及其他种类炮兵）的火力配系。我们正在集中迫击炮，我想，拂晓时我们能够在主要方向上准备密集的拦阻火力，以便同日终前已部署在上述地区的步兵协同行动。我们将动用方面军波罗的海

舰队的全部航空兵。此外，还部署上百辆坦克。

我们把内务人民委员部边防部队的一个师直接展开在列宁格勒南郊的米亚索科姆比纳特—雷巴茨科耶—莫尔स्क港一线。先给该师加强 100 门火炮，我们计算过，能够紧接着集中的就是 100 多门火炮。关于列宁城的情况目前我能报告的就这些。”

“我准备同库利克协同实施突击，但也只能在我们肃清敌红谢洛集团之后实施。”

“……我在列宁格勒方面军控制的飞机共有 268 架，其中完好的只有 163 架，轰炸机、强击机很差。现有佩—2 飞机 6 架，伊尔—2 飞机 2 架，炮侦—2 飞机 2 架，飞机 11 架。这个数量不能保障完成任务。恳请最高统帅部至少调给一个团的佩—2 飞机和 1 个团的伊尔—2 飞机。”

沙波什尼科夫肯定了朱可夫所采取的措施：“我认为你首先组织炮兵弹幕射击的决定是非常正确的。列宁格勒方面军有那么多炮兵，建立这样的弹幕射击是完全可能的。”

沙波什尼科夫并提出自己的建议：“我认为，红色近卫军封锁着北去的道路，虽然敌人已从西面迂回过去了……现在注意的中心仍然是封闭红谢洛突破口，尔后再与库利克配合行动……我想，在方面军后方和各院校还能找到一些人员和武器。最高统帅部要求你经常用有线或无线电向我们报告前线的情况。你有关加强轰炸机的请求，我将立即报告斯大林同志。完了。”

2 火线易“帅”

朱可夫到列宁格勒后不久，沙波什尼科夫就通报了最高统帅部试图以库利克元帅指挥的第 54 集团军从东面突击，解除对列宁格勒的封锁。库利克和朱可夫都守在自己电台旁。听最高统帅部的命令。

朱可夫向库利克元帅通报了情况，想调动他的第 54 集团军解除列宁格勒的封锁。

可惜，库利克集团军不打算几天内实施进攻。朱可夫让他派航空兵参加对列宁格勒接近地上重要地域的突击。库利克按兵不动，不支持朱可夫。后来，朱可夫又要求库利克立即组织炮火准备，并向姆加总方向转入进攻。结果库利克表示：

“明天我不能转入进攻，因为还没有调来炮兵，还无法组织协同。”

库利克元帅摆老资格，为此不听调动，居功自傲，从中作梗，使朱可夫再也掩饰不住自己的愤怒，他严厉地批评库利克说：“你只关心 54 集团军的安全，对列宁格勒出现的情况，看来是不怎么关心的。你应该明白，不等到你去组织协同动作，我就得从工厂直接抽调人员去迎击敌人。我清楚，我不能寄希望于你的积极行动。我自己能完成任务。应当指出，你的集团军不愿同方面军的协同，使我感到吃惊。我看，如果苏沃洛夫处于你的地位，决不会这么做。原谅我直言，但我已顾不得外交辞令了。祝你一切顺利！”

尽管采取了措施，列宁格勒的形势还是继续恶化。敌人变得更加猖狂了。冯·莱布元帅如此卖命，看来他妄想不惜任何代价实现希特勒的命令——在德军开始进攻莫斯科之前，结束列宁格勒战役。

朱可夫抵达后，及时而果断地采取了措施，排除一切干扰，迅速建

立起强大的第二梯队，构成了防御的战术纵深。这便大大提高了防御的稳定性和牢不可破性，顶住了敌人的猛攻。

朱可夫在向最高统帅部报告自己的决心时，毫不隐瞒地如实反映了库利克的情况。斯大林同意朱可夫采取的措施。9月16日晚，最高统帅给库利克打了电报，提出“……不要拖延进攻准备，要实施坚决的进攻，以便同朱可夫建立联系。”

斯大林提醒说：“朱可夫在9月15日同你交谈中述说了方面军的情况，你们的战役再也不能拖延了。”

然而这一次，第54集团军的进攻还是拖延了几天。

9月17日列宁格勒城下的战斗已达到高度紧张状态。这天，敌人的6个师在“北方”集团军群大批航空兵支援下，企图从南面突入列宁格勒。城市保卫者顽强捍卫着每一寸土地，不断地反击敌人。方面军和波罗的海舰队的炮兵对敌进攻部队进行了猛烈炮击，航空兵适时地给予防御部队以有力的支援。

方面军军事委员会认为当前局势极为危险，于9月17日向第42、55集团军军事委员会发出了极其严厉的命令。命令说：

“利戈沃—期斯基诺—普尔科沃高地—莫斯科拉维扬卡地域—舒沙雷和科尔皮诺地区，对于保卫列宁格勒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因此在任何情况下也不能放弃。”

我们英雄的军队是值得称赞的。他们准确地理解并极其认真地执行了这一命令。希特勒军队在这里却未能摧毁人数虽少但作战英勇的苏军。

在争夺普尔科沃和普希金城的激烈战斗中，敌人对列宁格勒进行了一次最猛烈的炮兵和航空兵突击，企图以此在心理上摧毁列宁格勒人和城市保卫者的意志。仅在9月19日这一天城市遭到18个小时的炮击（从1时5分至19时），同时德国航空兵对城市进行6次空袭。敌人276架轰炸机突入列宁格勒。

德国法西斯统帅部为了压制或消灭苏联强大的海军炮兵于9月21日至23日对军舰和喀琅施塔得连续实施密集空袭。同时有几百架轰炸机参加这些空袭。但是，苏联高射炮兵的强大火力和歼击机的坚决行动粉碎了敌人的阴谋，舰队没有遭到严重损失。

9月23日至26日，敌人不只一次地试图向普尔科沃高地、彼得戈夫和奥拉宁包姆进攻。但敌人的每次攻击都被炮兵、迫击炮和机枪的火力，以及航空兵的突击击退了。同时，我们以步兵部队和兵团对敌实施了有力的反突击。

为了配合濒海战役集群的作战，向敌军后方派遣了一支海军登陆队。水兵们的行动不仅勇猛，而且极为果敢。不知敌人怎么发现了登陆队从海上的接近，便对海上的登陆队进行射击。敌人的火力并未使水兵们惊慌失措，他们仍然上了岸，德军逃跑了。在这以前，他们已经很好地领教过这些“水鬼”（他们这样称呼苏军海军陆战队）是些什么人。

水兵们为初步胜利所吸引，追击逃跑的敌人，但拂晓时，他们同海上的联系被切断了。他们大部分英勇牺牲。英雄的登陆队队长安德烈·特罗菲莫维奇·沃罗日罗夫上校也壮烈牺牲。

由伊万诺夫指挥的内务人民委员部边防部队第20师的边防军人和水

兵组成的登陆队，曾不止一次被派往敌人后方。他们到处都创造出英勇顽强的奇迹。在 9 月作战中，由波罗的海舰队水兵编成的步兵旅也打得很出色。

9 月 29 日，最高统帅部将第 54 集团军拨归列宁格勒方面军指挥。库利克元帅被免职。朱可夫立即指派方面军参谋长霍津将军担任第 54 集团军司令。

3 打破“元首”的美梦

在敌人方面，希特勒曾同样地催促自己的军队前进。德军“北方集团军群”司令官冯·莱布急切要求能尽快粉碎列宁格勒保卫者的抵抗，以便同芬军卡累利阿集团会合。由于列宁格勒保卫者进行顽抗，使他们的如意算盘遭到彻底失败。

希特勒气极败坏。他懂得，时间不利于德国而有利于苏联，苏联可以利用它克服巨大的困难，成功地动员人民力量，组建新的武装部队和制造强大的武器。夏秋季战局已结束，在战略目的方面没有取得明显成果。冬季临近了，希特勒军队根本没有过冬准备。

法西斯德军虽早已逼近列宁格勒城下，但由于苏军固守，寸步不让，结果，德军虽发动多次猛攻，依然是久攻不下。列宁格勒固若金汤，一直到 1943 年 1 月，也没有能攻占这座城市。

朱可夫在总结这次防御战的胜利原因时，精辟地阐述道：

“1941 年秋，列宁格勒会战防守阶段的特点和基本结论是什么呢？德国法西斯军队进攻失败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列宁格勒防御战最重要的军事政治意义就在于，粉碎了希特勒统帅部庞大的阴谋计划。列宁格勒方面军和波罗的海舰队以自己英勇顽强的精神和积极的行动削弱、疲惫和牢牢牵制住德国法西斯重兵集团于列宁格勒方向，使希特勒统帅部不能把第 4 坦克集群的快速兵团适时调往莫斯科方向。第 4 坦克集团来不及在“台风”战役开始前修复损坏的装备，就投入了莫斯科方向的交战。这一情况有利于胜利地保卫莫斯科和歼灭我们祖国首都接近地上的敌军。”

“1941 年 9 月，列宁格勒会战是在极其复杂而多变的情况下进行的。敌人使用了大量坦克、机械化部队和航空兵，这就要求苏联统帅部对形势的变化迅速而果断地做出反映，不断改进作战的样式和方法。”

“在 9 月会战中，列宁格勒附近的战斗特别紧张而激烈，敌人的力量已严重削弱，而苏军的抵抗力量却不断增强。敌人进攻速度的降低就是证明。如果说 7 月份敌人前进的速度是每昼夜 5 公里，那么到了 9 月份每昼夜只前进 1 至 2 公里，而且也只能是在个别方向上。”

“朱可夫以方面军首长身份采取了一系列果断而正确的措施，到 9 月底，在列宁格勒南、北接近地和东南接近地已建立巩固的、纵深梯次配置的、牢不可破的防御。”

“更重要的是苏军有高昂的士气，坚定的胜利信念，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对法西斯侵略者的仇恨。列宁格勒保卫者所表现出来的那种集体英雄主义和勇敢精神，劳动和战斗中的忘我精神，是前所未有的范例。这种精神力量是法西斯德国军队所不具备的。因此，无论是大量的牺牲，

还是长期过度紧张的战斗，都没有摧毁列宁格勒保卫者的士气和英雄气概。列宁格勒人、方面军和舰队的军人们宁可在同敌人的斗争中死去，也决不把城市交给敌人。

“列宁格勒工厂的劳动者冒着敌人的狂轰滥炸，忍受着饥饿和严寒英勇地完成了所受领的任务。例如，1941年7月至年底，他们制造了713辆坦克，480辆装甲车，58辆装甲列车，3000余门团属加农炮和反坦克炮，约1万门迫击炮，300多万发炮弹和迫击炮弹，8万余发火箭炮弹和炸弹。弹药的产量，1941年下半年比上半年增长9倍。不仅保证了列宁格勒防御战的需要，而且还支援了莫斯科军区的迫切需要。

“应当指出，仅1941年第四季度，在莫斯科防御战最紧张的时候，列宁格勒人就给保卫祖国首都的英雄们用飞机送去了一千多门团属加农炮和迫击炮。

“朱可夫在回忆他临危受命担任西北方面军司令、组织列宁格勒保卫战这段历史经历时说：“我感到无上光荣的是，在最危难的时刻，委任我指挥保卫列宁城的所有军队。在被封锁的条件下，组织同兵力兵器占极大优势之敌的斗争，这对于我后来作为方面军司令和副最高统帅的整个工作，都是非常有益的。1941年9月是我永生难忘的。”

第八章 莫斯科城下的较量

1 紧急召唤

希特勒军队实施“闪击战”，以迅雷不及掩耳的神速逼近莫斯科。苏军招架不住强大攻势，在节节败退。

大敌压境，兵临莫斯科城下。为此，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里，睡不成眠，食不甘味，忧心忡忡，在这紧要关头，斯大林最后决定，请在列宁格勒前线的朱可夫立刻返回莫斯科，共商御敌大计。

1941年10月5日，最高统帅部火速转告列宁格勒方面军司令部：

“斯大林同志要和朱可夫元帅直接通话。”

两分钟后，斯大林和朱可夫通话。斯大林：“你好！”

朱可夫：“您好！”

斯大林：“朱可夫同志，你能不能立即乘飞机来莫斯科？鉴于尤赫诺夫地区的预备队方面军左翼情况复杂，最高统帅部想和你商谈一下。让谁代替你呢！让霍津代替你吧。”

朱可夫：“请允许我10月6日早晨起飞。”

斯大林：“好。明天我们在莫斯科等你。”

但是，由于第54集团军地段上出现了某些重要的情况，10月6日，朱可夫未能起飞，他及时报告了最高统帅，并得到批准。

傍晚，斯大林又向列宁格勒打电话问：“你们那里情况怎样？敌人有什么新的动向？”

朱可夫报告说：“德军的攻击减弱了。据俘虏的供词，德军在9月的战斗中遭受严重损失后，在列宁格勒附近转入防御。现在敌人用炮兵和飞机对城市进行射击和轰炸。我航空兵侦察查明，敌人摩托化纵队和坦克纵队正在从列宁格勒地区向南大规模运动。看来，可能调往莫斯科方向。”

报告情况后，朱可夫问最高统帅，关于飞行莫斯科的指示是否仍然有效。

斯大林回答说：“有效，留下霍津或费久宁斯基将军代替你，你自己明天迅速乘飞机来莫斯科。”

告别列宁格勒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后，朱可夫飞往莫斯科。因为必须紧急把M.C.霍津将军派往第54集团军去，列宁格勒方面军的临时指挥就转交给了费久宁斯基将军。这两位将军是朱可夫指名调去的，他是非常信任他们的。

到了莫斯科，卫队长迎接朱可夫并通告说，最高统帅病了，在他住所里工作。于是，又乘车立即赶到那里去。

斯大林感冒了，面色不好，态度冷淡，点头表示回答朱可夫的问候，然后走到地图跟前指着维亚济马地区对朱可夫说：

“你看，这里的情况很严重。我无法从西方方面军和预备队方面军得到有关真实情况的详细报告。由于不了解敌人进攻的地点和部署以及我军的状况，情况不明我们不能做任何决定。现在请你立刻到西方方面军司令部去一趟，详细弄清那里的情况，并随时给我来电话，我将等着。”

告别前，斯大林突然问：“你认为德国人最近期间会再次进攻列宁

格勒吗？”

“我想不会。敌人损失惨重，又把坦克和摩托化部队从列宁格勒地区调到了中央方向某地。敌人无力以列宁格勒地区现有的部队实施一次新的进攻战役。”朱可夫胸有成竹地回答。

“你认为希特勒将把从列宁格勒地区调出的坦克和摩托化部队用在哪里？”斯大林接着又问：

“显然，是调到莫斯科方向来了。自然是在补充人员和维修兵器之后。”

谈话时，斯大林站在桌旁。桌上放着标有西方方面军、预备队方面军和布良斯克方面军情况的地图。他看着西方方面军的地图对朱可夫说：“看来，他们已经在这个方向上行动了。”

告别了最高统帅，朱可夫又到总参谋长沙波什尼科夫那里去，向他详细报告了列宁格勒地区 12 月 6 日的情况。

总长对朱可夫说：“最高统帅刚打电话来，命令给你准备好西部方向的地图。地图马上就准备好。西方方面军首长就在 8 月份叶利尼亚战役时预备队方面军司令部驻过的那个地方。”

沙波什尼科夫向朱可夫将军详细介绍了莫斯科方向的情况。他向朱可夫转达了最高统帅部的命令：

“预备队方面军司令员：

西方方面军司令员：

根据最高统帅部的命令，兹派朱可夫大将到预备队方面军作战地区为最高统帅部代表。

最高统帅部希望你们向朱可夫同志介绍情况。今后，朱可夫同志有关各方面军部队使用和指挥问题的一切决定，必须执行。

受最高统帅部的委托

总参谋长沙波什尼科夫

1941 年 10 月 6 日 19 时 30 分

编号 2684 ”

朱可夫在等待地图时，沙波什尼科夫用浓茶和三明治招待了他。总长对朱可夫坦率地流露说：“我实在太疲倦了。”朱可夫也有同感，他也很疲倦。马不停蹄地直接乘车去西方方面军司令部去了。

2 奔赴前线

朱可夫抵达西方方面军司令部时已是深夜。值班员报告说，所有的领导人都在司令部开会。司令屋里点着蜡烛，有点昏暗。桌子旁边坐着科涅夫、索科洛夫斯基、布尔加宁、马兰金。每一个人都是极疲劳的样子。朱可夫进屋后立刻出示最高统帅部的委任状，并说：“我受最高统帅的委托来了解情况，而且要直接从这里用电话向他汇报。”

方面军作战部队马兰金中将介绍了一些最新情况，使现有的材料更加充实和明确了。

“西部方向发生了什么情况呢？”这是朱可夫当前最关心的问题。

到德国法西斯军队在莫斯科附近开始进攻的时候，担任防御的有三

个方面军：西方方面军（司令是科涅夫上将），预备队方面军（司令是C.M.布琼尼元帅），布良斯克方面军（司令是叶廖缅科中将）。截至9月底，三个方面军的作战部队总共约有125万人，990辆坦克，7600门火炮和迫击炮，677架飞机。其中以西方方面军的兵力兵器为最多。敌人调整了莫斯科方向上的兵力部署后，其兵力超过了苏联三个方面军的总和，军队超过0.4倍，坦克超过0.7倍，各种火炮和迫击炮超过0.8倍，飞机超过1倍。

3 “台风”作战计划

“台风”战役计划，是希特勒德军妄图攻占莫斯科的计划。希特勒在柏林帝国大厦发号施令，命令他心目中的“战神”古德里安率领坦克集群和第2集团军于9月30日实施猛攻，要求他们长驱直入，一举攻占莫斯科。

于是，德军便向茹科夫卡至绍斯特卡地段的布良斯克方面军和预备队方面军实施猛烈突击。

10月2日，敌人向苏军西方方面军和预备队方面军实施了突击。接着，敌人又从杜霍夫希纳以北和罗斯拉夫利以东地区实施了特别有力的突击。敌人突破了苏军防线。敌人的突击集团急速地向前推进，从南北两面包围西方方面军和预备队方面军在维亚济马的所有部队。形势十分严峻。

布良斯克以南的情况也极其严重，布良斯克方面军的第3和第13集团军面临被合围的危险。古德里安的部队十分猖狂，未遇到严重抵抗而向奥廖尔突进，这里苏军没有力量来击退敌人的进攻。

希特勒听到古德里安顺利进军的喜讯后，得意忘形，在偌大的地球仪前，目不转睛地盯着莫斯科，两眼闪烁着兴奋的火花，对身边的帝国元帅戈林说：“猛烈的‘台风’，扫清了通向莫斯科一切障碍，斯大林完蛋了！我们准备到克里姆林宫设宴，庆祝圣诞节！……哈哈，哈哈……”

希特勒认为，莫斯科在政治上和战略上都具有重大意义，能否占领莫斯科关系到战争的成败。他原想在战争的最初几周内即于行进间一举夺占苏联首都，这计划失败后，便又筹划了代号为“台风”的大规模进攻战役。计划预定以三个坦克集团分别从杜霍夫希纳、罗斯拉夫利、绍斯特卡地域向东方和东北方向实施强大突击，割裂苏军防御，在维亚济马、布良斯克两地域围歼西方方面军、预备队方面军和布良斯克方面军，以后以强大的快速集群从南北两面包围莫斯科，同时步兵兵团实施正面进攻，攻占苏联首都。为达到此目的，德军主要力量集中于斯摩棱斯克以东“中央”集团军群（司令官为博克元帅）的地带内。“中央”集团军群下辖第9、4、2野战集团军，坦克第3、4、2集群（1941年10月起坦克第2集群改称坦克第2集团军），共74.5个师，其中14个坦克师和8个摩托化师，即约占苏德战场步兵师的38%，坦克师和摩托化师的64%。陆军由第2航空队担任支援。“中央”集团军群总计约有官兵180万人，坦克1700辆，火炮和迫击炮1.4万余门，飞机1390架。

4 会战莫斯科

为了粉碎希特勒的企图，斯大林派朱可夫组织指挥了莫斯科会战，它是苏联卫国战争中苏军为保卫莫斯科和粉碎向莫斯科进攻的法西斯德军“中央”集团军群各突击集团而进行的一系列防御战役（1941年9月30日至12月5日）和进攻战役（1941年12月5日至1942年4月20日）。参加莫斯科会战的有五个方面军：西方方面军、预备队方面军、布良斯克方面军、加里宁方面军以及西南方面军的右翼部队。

当时苏军处境异常困难。许多企业不得不向东部地区疏散，因而苏联的军事经济还不能够完全满足作战部队对武器和技术兵器的需要；各条战线都在进行艰苦的防御战，军队更遭到严重削弱；此外，由于日本和土耳其两国政府奉行亲希特勒方针，苏军指挥部不得不在苏日、苏土边境驻扎重兵。最高统帅部大本营在莫斯科会战中的企图是：“依托有利地区建立纵深梯次配置的防御，阻止敌人向莫斯科推进，给敌以最大限度的挫伤，争取时间，并为反攻创造条件。”为了实现这一企图，大本营采取了必要措施，向莫斯科的远郊派出了精锐的部队和兵团。但仍未改变对苏军不利的兵力兵器对比。

至9月底，西方方面军（司令为科涅夫上将）辖第22、29、30、19、6、20集团军，在奥斯塔什科夫、叶利尼亚西北宽达300余公里的地区担任防御。

按照西方方面军司令科涅夫上将的命令，在维亚济马以北对迂回我军的敌北部集团进行了反突击。可惜，这次反突击未能成功。10月6日日终时，西方方面军和预备队方面军的相当一部分部队在维亚济马以西地区被合围。损失惨重。朱可夫认为维亚济马地区的惨重失败本来是可以避免的。尽管敌人在有生力量和技术兵器上占优势，但是苏军军还是可以避免被合围的。为此需要及时而正确地判定敌人的主要突击方向，并从次要地段抽调兵力，集中苏军主力对付敌人的突击。预备队方面军（司令苏联元帅布琼尼）以两个集团军（第24、43集团军）的兵力在罗斯拉夫利方向宽100公里的正面上进行防御，其余的集团军（第31、49、32、33集团军）则配置于西方方面军后谢利扎罗沃、多罗戈布日以东、斯帕斯—杰姆斯克一线。布良斯克方面军（司令叶廖缅科上将）辖第50、3、13集团军和一个集团军级集群，扼守布良斯克以西和以南宽达300余公里的地区。总计在西方向上三个方面军共有125万人，拥有坦克990辆，火炮和迫击炮7600门，飞机677架。双方对比，敌人对苏军占有优势：人员多40%，火炮和迫击炮多80%，坦克多70%，作战飞机多一倍。德军不仅在数量上，而且在技术上也占优势，因为当时苏军的坦克和飞机有一半以上是旧式的。敌人在坦克、飞机、反坦克炮、高射炮以及摩托化部队方面的优势更为明显。

德军根据“台风”计划，于9月30日在布良斯克方向，10月2日在维亚济马方向先后发起进攻。尽管苏军进行了顽强抵抗，德军仍然突破了防御。可是由于科涅夫将军指挥失误，并未能阻止住德军进攻。在维亚济马战役（1941）中，10月4日，德军突破了西方面军的防线夺占了斯帕斯—杰姆斯克和基洛夫，10月5日，占领了尤赫诺夫，10月7日，进抵维亚济马地域，两个方面军相当大的一部分兵力在此被围，一直英勇抵抗到10月12~13日，被围军队有一部后来突出重围。陷入战役合

围困境的布良斯克方面军也进行了退却。莫扎伊斯克防线成了莫斯科附近的主要抵抗地区。在从莫斯科河至卡卢加这一地区（共 230 公里）上，4 个集团军总共只有 9 万人左右。这些兵力不足以在整个地带内建立起坚固的防御。为了加强对军队的指挥，大本营于 10 月 10 日将西方方面军和预备队方面军的部队合编为西方面军，由朱可夫大将负责指挥。复杂的形势要求：下决心从莫斯科疏散大批政府机关和最重要的企业；留下的企业则生产军用品；部队和劳动人民在莫斯科近郊构筑新的防御地区；组建新的民兵师；使全市做好巷战准备，等等。为修筑防御工事动员了 45 万首都居民，其中 75% 是妇女。10 月 20 日，国防委员会在莫斯科及其毗邻地区实行特别戒严。莫斯科的防空部队同敌机进行了顽强的斗争；10 月间，德军对莫斯科进行了 31 次空袭，共有 2 000 架飞机参加，其中 278 架被击落，只有 72 架闯入莫斯科上空。

德军损失惨重，但希特勒未放弃夺取苏联首都的妄想，他疯狂地叫喊，不惜一切代价，要拿下莫斯科。下决心一定要在冬季到来以前攻占莫斯科。敌人增调兵力，变更部署。用于进攻莫斯科的兵力有 51 个师，其中 13 个坦克师和 7 个摩托化师。兵力优势仍在敌人方面：人员多一倍、炮兵多一倍半、坦克多一半。个别方向上（如沃洛科拉姆斯克方向、图拉方向）的优势更大。德军企图击溃苏军，合围并占领莫斯科。

朱可夫识破了德军的意图，下决心以预备队和补充兵员加强了西方面军。11 月 10 日，布良斯克方面军撤销，所属第 50 集团军转隶给西方面军，第 3、13 集团军转隶给西南方面军。11 月 17 日起，加里宁方面军第 30 集团军编入西方面军。各方面军奉命固守所占的地区，阻敌人从西北和西南迂回莫斯科。

11 月 15~18 日，法西斯德军向莫斯科重新发起进攻。在加里宁—索尔涅奇诺戈尔斯克防御战役和图拉防御战役中，苏军阻止了在克林、罗加切沃方向和图拉、卡希拉方向上企图从北面 and 南面迂回莫斯科的德军。德军遇到了苏军的顽强抵抗。潘菲洛夫少将、别洛博罗多夫少将、多瓦托尔少将和卡图科夫上校和其他许多人指挥的兵团始终坚守阵地。“俄罗斯虽大，但已无处可退，后面就是莫斯科！”这是首都保卫者的口号。

德国法西斯军队向莫斯科推进的尝试均告破产。苏军虽然不时处于危急状态，但始终屹立不动并消耗了敌人。仅从 11 月 16 日至 12 月 5 日，法西斯德军在莫斯科附近就死伤 15.5 万余人，损失坦克约 800 辆，火炮 300 门，飞机约 1500 架。法西斯德军士气急剧下降。苏军转入反攻和粉碎莫斯科附近敌军的条件已经具备。

5 临危受命

朱可夫亲临前线，直接指挥各方面军进行反攻，同时粉碎了德国“中央”集团军群分别从南、北两面威胁莫斯科的最危险的突击集团。

在莫斯科上空夺取制空权的斗争中，西方方面军所属预备队航空兵和首都防空军的航空兵与前线航空兵联合作战起了巨大作用。反攻的准备是在复杂的情况下进行的，苏军的飞机虽略占优势，而炮兵几乎少一半，坦克少三分之一，人员也较德军为少。但是苏军指挥部也考虑到了

其他因素，如：法西斯德军疲惫不堪；没有预先构筑好的防御阵地，也没有战役预备队；缺乏冬季作战的训练，而苏军则士气高涨。

反攻计划是由朱可夫大将亲自制定并由最高统帅斯大林批准的，是在1941年12月5~6日开始的，这时德军的进攻能力显然已经衰竭。尽管天寒地冻，积雪甚深，反攻的发展甚为顺利。在加里宁战役、克林—索尔涅奇诺戈尔斯克战役、图拉战役、卡卢加战役、耶列次战役中，苏军在最初几天内就从德军手中把主动权夺了过来。12月8日，希特勒签署了在苏德战场包括莫斯科方向全线转入防御的训令。12月9日，苏军解放罗加切沃，11月解放伊斯特拉，12日解放索尔涅奇诺戈尔斯克，15日解放克林，16日解放加里宁，20日又解放了沃洛科拉姆斯克。大本营考虑到这一有利情况，要求各方面军司令扩大进攻地带，毫不停顿地进行追击。1942年1月初，西方战略方向的反攻乃告完成。苏军从侵略者手中解放了1.1万多个居民点，消除了图拉被合围的危险。进攻的苏军进到勒热夫、拉马河、鲁扎河、博罗夫斯克、莫萨尔斯克、别列夫、韦尔霍维耶一线，将德军击退100~250公里。德军38个师，包括15个坦克师和摩托化师遭受重创。进攻莫斯科的突击集团的溃败使德军惊慌失措，希特勒要求部队死守每一个居民点，寸步不退，战到最后—兵—卒、最后一枚手榴弹。

朱可夫对1月初的作战情况进行判断之后，立刻建议最高统帅下令在列宁格勒和在西、西南两战略方向转入总攻，合围并粉碎“中央”集团军群主力。但是以现有的兵力兵器不足以达到既定目的。在西方向上，双方步兵和炮兵的兵力相等，苏军仅在坦克的数量方面比德军多百分之三十。

1月8日至4月20日，西方面军、加里宁方面军和布良斯克方面军（于12月24日恢复建制）实施了瑟乔夫卡—维亚济马进攻战役、托罗佩茨—霍怔姆进攻战役、勒热夫进攻战役和博尔霍夫进攻战役。1942年1~2月间，在维亚济马以南地域使用了空降兵。由于缺乏实施大规模进攻行动的经验以及缺乏兵力兵器特别是缺乏快速部队，因而未能全部完成所受领的围歼“中央”集团军群基本兵力的任务，尽管如此，西方向上的总攻进展是顺利的。法西斯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首次遭到惨败。反攻和总攻的结果，敌人被迫向西退却100~350公里。莫斯科州、加里宁州、图拉州、梁赞州全部以及斯摩棱斯克州的奥廖州的一部分地区宣告解放。苏军在莫斯科近郊的胜利，大大改善了苏联的军事、政治地位和国际地位。这一胜利使苏联各族人民更紧密地团结在共产党周围，为战争的根本转折奠定了基础。打破了法西斯德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使德军遭到无法弥补的物资损失。德军损失50余万人，坦克1300辆，火炮2500门，汽车1.5万余辆，以及许多其他技术装备。德军士气更加低落，在冬季战局中，希特勒德军军事法庭以临阵脱逃、擅自退却、违抗军令等罪名给6.2万名官兵判了罪。35名高级将领，其中包括布劳希奇元帅、博克元帅、古德里安将军、施特劳斯将军等被撤职。

莫斯科会战具有巨大的国际意义。它促使反希特勒同盟更加巩固，使法西斯国家集团更加削弱，迫使日本和土耳其统治集团不敢肆意追随德国，为欧洲各国人民反抗希特勒暴政的解放运动开辟了新的发展时期。在这次会战中，苏联军事学术达到了新的发展阶段。最高统帅部大

大本营和总参谋部在复杂的条件下筹建和隐蔽集中预备队以粉碎敌人方面，在组织各方面军之间和各战略方向之间的密切协同方面，以及在使用陆军、航空兵和游击队共同粉碎“中央”集团军群方面都做得十分成功。组织防御和进攻的方法以及更加合理的使用炮兵、坦克和航空兵的方法均有所改进。此外，还积累了大量集中使用各兵种的经验，这表明朱可夫和苏联军事首长在战略上和战役战术上不断成熟以及各兵种军人战斗技能有了进一步提高。

第九章 斯大林格勒大会战

1 大反攻的前夜

1942年4月下旬，苏军经过10个月的激战，使不可一世的德国法西斯军队在莫斯科城下惨遭挫败。至此，希特勒速战速决结束苏德战争的企图化为泡影。

朱可夫虽然完成了保卫莫斯科的伟大使命，但是由于苏军兵力、兵器上的不足，没能实现在各个战略方向上的预定反攻。到1942年5月，德军仍然占据着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白俄罗斯、乌克兰、摩尔达维亚以及俄罗斯联邦的许多州。在西南方向，苏联失去了乌克兰的农业区、顿巴斯的煤和南方的巨大工业区；西北方向上，列宁格勒仍然处于德军重兵包围之中；西部方向，德军距离莫斯科也只有150公里。

苏德战场上的战略形势虽然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但此时整个国际政治军事形势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41年12月7日，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1942年1月1日，美、英、苏、中等26个国家在华盛顿签署了联合国宣言，反法西斯国家结成了战略大同盟。国际力量对比开始向不利于法西斯国家的方向变化。

苏德前线，经过莫斯科城下惨败后的德军利用苏军急于夺取战略主动而暴露出来的问题，向苏军发起反攻，重新站稳了脚跟。之后，他们计划向苏军发起新一轮进攻。为此，从1942年5月，德军四处调兵遣将，很快就集结了620万兵力、3000多辆坦克、6万门火炮和3400架作战飞机的庞大作战力量。

由于在前一段的作战中，德军损失惨重，加上苏军的不断壮大，此时德军已无力在苏德战场上发起全面进攻，于是，希特勒决定采取重点进攻的战略。他认为，这个重点要放在能给苏联的战争经济以最严重破坏，又能给德国的战争经济开辟新的原料来源的战线上。希特勒的眼睛瞄向了高加索油田，为此，他决定在斯大林格勒方向发起新的进攻。

斯大林格勒，位于伏尔加河流域，是这一地区的工业和内河航运中心，同时也是苏联中部地区通往南部重要经济区的惟一交通线上的咽喉，战略地位极为险要。

希特勒的如意算盘是先夺取斯大林格勒，占据这一有利的战略要地后，由此北进莫斯科，对莫斯科形成夹击之势。此外，还可以从这里南出波斯湾，夺取中东地区，实现同日本盟友的会师。这样，整个战略形势将对轴心国集团大大有利。

2 最高统帅部代表

莫斯科会战胜利后，朱可夫离开总参谋长的岗位，接管了西方面军指挥权，在这个最重要的方向上对德军实施反攻。

作为最高统帅部的代表，战争期间朱可夫经常被派往各重要战区，根据战略计划组织重要的现场行动，同时监督最高统帅部命令的执行情况，协调各方面军的行动。因此，他经常离开最高统帅部，有时甚至直接担任某方面军的司令直接指挥作战。

1942年8月27日，朱可夫正在波戈列洛耶戈罗季谢附近的西方面军指挥所里组织进攻战役。这时电话铃响了。

打来电话的是斯大林的秘书处主任，“朱可夫同志，昨天国防委员会研究了南方的形势，决定任命你为最高副统帅，作为斯大林的代表去斯大林格勒”。

稍后，斯大林亲自打来了电话，在询问了西方面军情况之后，斯大林说：“你立刻回莫斯科来。”

军情紧急，朱可夫撂下电话，立刻起身飞往莫斯科。

当天晚上，朱可夫到了克里姆林宫。在斯大林的办公室里，斯大林向朱可夫正式通报了国防委员会的决定，最后语重心长地对朱可夫说：“千万不能让斯大林格勒落到德国人的手上。”

朱可夫明白自己所要担负的是多么重要的使命。他将去的地方是苏德战场目前最重要的地段，那里正在进行的是一场决定性会战，而他的对手是德军第6集团军，这支部队在过去几年的战争中还从没有失过手。

朱可夫向斯大林表示：“给我一天时间来研究一下形势，我一定会完成这一光荣的任务。”

当晚，朱可夫在总参谋部彻夜未眠。在详细看完了所有的战情通报后，他对怎样采取行动有了一个初步的方案。

天一亮，朱可夫就动身前往斯大林格勒。4个小时后，他到达了目的地。已先期抵达那里的华西列夫斯基在机场迎接朱可夫，并向他介绍了最新的情况。

抵达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司令部后，朱可夫立刻召集各集团军的指挥员召开了形势分析会，根据前线当前的情况和双方实力的对比，朱可夫得出结论：至少要到9月5日以后新集结的预备队才能做好战斗准备，因此，只有在那以后才能对德军进行反突击。

朱可夫把这一结论向斯大林做了汇报。但斯大林坚持要尽快实施反突击。9月3日，斯大林向朱可夫发去电报，命令他必须毫不迟延地发起进攻。

朱可夫同斯大林发生了争执。他坚持说：“只有到9月5日以后，我们才有能力对德军进行有力的打击。”

朱可夫就是这样，当他认为正确的时候，他总是很固执，对斯大林也是如此。苏军的重要领导人中，他是惟一个敢于顶撞斯大林的人。在一次会议上，斯大林曾半开玩笑地说过：“你们当中的有些人只知道说‘是的，斯大林同志’，‘完全正确，斯大林同志’，‘英明，斯大林同志’，而只有从朱可夫那里，才可以听到真正有用的东西。”

这一次，朱可夫的固执再次战胜了斯大林的固执。最后，斯大林终于同意按朱可夫的计划在9月5日发起反突击。

9月5日拂晓，苏军第24、第66集团军和近卫第1集团军向德军发起了进攻。但是，由于德军的顽强抵抗，苏军还是没能突破德军的封锁。战斗进行到9月11日，苏军只前进了2~4公里。

9月10日，朱可夫奉命飞回莫斯科。在克里姆林宫斯大林的办公室，朱可夫向斯大林详细汇报前线的情况。他向斯大林提出，以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现有的兵力，要想突破敌人的包围，必须要补充一个坦克军和三个坦克旅，此外在作战时还必须要有空中火力的支援。同时，新的预备队

还需有一个月才能完成战斗编组，因此目前在斯大林格勒前线还应采取坚强的防御，待一切准备就绪后，再发动一次大规模的反攻。粗略地估计，反攻将会在 11 月中旬发动，反攻首先应打击敌军集团中较弱的罗马尼亚军队。

9 月 13 日，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带着更为详细的计划去见斯大林。这就是后来代号为“天王星”的反攻计划的雏形。

斯大林基本同意了朱可夫他们的计划，他命令朱可夫立即返回斯大林格勒前线，华西列夫斯基则稍后去东南方面军，研究斯大林格勒左翼的情况。

一个小时后，朱可夫已坐上飞机飞往他在斯大林格勒的司令部了。而这时的斯大林格勒，战斗已经发展到了白热化的程度。此后的两个月里，对朱可夫来说将是极其紧张的，他既要准备进行反攻又要考虑如何防御。

德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向北部方向开始了全线进攻，苏第 62、第 64 集团军在强大的德军压力下，不得不向后撤退，一直退到了斯大林格勒城下的最后阵地。

这时，斯大林格勒的苏军防御前沿，距市区只有 210 公里。德军的突击集团已从东北和西南直接指向斯大林格勒市区。

9 月 13 日，德军攻占了南部的萨多瓦亚车站。苏军面临着被赶下伏尔加河的危险。

此时的苏军，由于战斗中的伤亡、退却，弹药和粮食的不足，人员与技术装备补充上的困难等等，士气消沉，有的士兵甚至希望尽快撤过伏尔加河，脱离这场苦战。但是，朱可夫责成集团军军事委员会做出决定：不许后撤，必须粉碎敌人的进攻。斯大林格勒城是最后的战场，要有与敌人背水一战的决心。集团军司令部留在右岸斯大林格勒城内，在任何情况下不得向左岸和岛上撤退。

从这时起，斯大林格勒战役开始具有阵地战的性质。战争由辽阔的平原转向伏尔加高地。部队的进展不再以公里来计算，而是以米来计算。因为争夺每一座楼房、车站、水塔、每一条街道、每一堵墙，甚至每一堆废墟，都要进行激烈的交战。

9 月 14 日，德军对市中心的马马耶夫高地和火车站发动了进攻。德军很清楚，要是占领了马马耶夫高地，就可以控制整个城市、厂区和伏尔加河。因此德军在不到 4 公里宽的地段上集中了 6 个师，并有数百架飞机从空中支援。短短的 5 个小时内，火车站曾 4 次易手。德军曾一度占领了高地。

苏军近卫步兵于 14 日和 15 日夜冒着敌机轰炸，坐汽艇、驳船渡过伏尔加河，去增援市区的战斗。以后的日子里，他们配合第 62 集团军夺回了马马耶夫高地。战斗进行得异常激烈。德军以 50~60 架飞机为一批，对苏军进行密集轰炸，成吨重的炸弹，203 毫米口径的炮弹，把整个地面都翻过来。德军曾一度前进到距苏军第 62 集团军指挥所仅 600 米的地方。

市区巷战也达到了白热化程度。每条街道和广场都变成了激烈的战场，德军不顾伤亡，每天从早到晚连续不断地冲击，苏军和斯大林格勒市的市民则顽强抵抗，寸步不让把可以利用的地方都变成堡垒，每个街

区、每幢楼房、甚至每层楼，每间房，每个街垒都经过了反复地争夺。一天内都几易其主。德军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在经过连续 13 天的战斗后，德军终于于 9 月 25 日占领了市南和市中心的部分地区，并前进到伏尔加河河南，所有渡口都处在了德军的枪炮火力控制之下。斯大林格勒，几乎没有一座建筑物、工厂、住宅保持完整。

10 月 5 日，朱可夫命令新任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司令叶廖缅科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坚守城市，把每幢楼房、每条街道作为堡垒，抗击德军的进攻。每一座房屋，只要有苏联的军人，哪怕只有一个人，也要成为敌人攻不破的堡垒。于是苏军在连营里，除了已有的班之外，又组织了新的战术单位——突击小组。

尽管炮火连天、弹片横飞，炮击和轰炸的喧嚣声此起彼伏、震耳欲聋，被炸毁的工厂却成了苏联人的抵抗中心。一些工厂在炮火纷飞中也照常修理坦克和其他武器。如果工厂被炸得无法生产，工人们便拿起武器与正规部队一样投入战斗。

苏军在他们控制的地区为德军设下了特殊的“捕杀场”。他们在一些房屋、街区上埋下地雷，在每一个布雷区的外面都留下几条进路。苏军已把城市的每一个地方都变成了战场，使德军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

3 “天王星”反攻计划

为了在斯大林格勒前线战胜德军精锐部队——保卢斯领导的第 6 集团军，具体指挥和协调斯大林格勒前线的作战行动，此间朱可夫则频繁地来往于斯大林格勒与莫斯科两地。为了保证他的安全，统帅部要求给朱可夫派护航战斗机，以防止在空中被敌机袭击遭遇不测，但朱可夫拒不接受，他的理由是：“不能为我浪费昂贵的汽油。”结果，虽然敌机没有碰上，但有几次险些发生意外。

一次是因为天气寒冷，致使飞机结了冰，被迫临时迫降。还有一次在飞越莫斯科上空时，因能见度差，朱可夫的座机险些撞上地面的一个大烟囱。在紧急关头，朱可夫总是这样置个人安危于不顾。

10 月初，苏军 6 个满员师跨过顿河进入斯大林格勒，补充进第 62 集团军。第 62 集团军经过前一段的激烈战斗，伤亡严重，用朱可夫的话讲：“除了后勤部队和司令部外，已经不剩什么了。”与此同时，罗科索夫斯基的顿河方面军也得到了加强。

就在这时，希特勒为集中力量拿下斯大林格勒，命令：除在斯大林格勒外，整个苏德战场转入战略防御。

德军又开始了第三次进攻斯大林格勒，企图通过这次攻击来夺取决定性的胜利。德军的进攻，最后进至伏尔加河，在约 5 公里宽的地段上，集中了 2 个坦克师、3 个步兵师，出现了 2000 架次飞机作为支援轰炸市区。战斗空前激烈，仅朱可夫的司令部里就有 61 人牺牲。

10 月 15 日，德军突破防线攻占了拖拉机厂，冲到了伏尔加河边。17 日，苏军第 138 师赶来增援工厂区的战斗。苏军的顽强抵抗，大大地杀伤了德军，终于迫使德军减弱了进攻的势头。

10月17日，苏第62集团军司令部和军事委员会带着文件和指挥器材离开了掩蔽部，到伏尔加河以南约1公里没有任何掩蔽的露天河岸上进行指挥。这里距前沿阵地马马耶夫高地只有1公里。

在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德军又连续发动了多次进攻，但并没有取得多大的进展。到10月29日晚，战斗开始平静下来，第二天只有零星的交火。在苏军顽强地抵抗下，德第6集团军终于无力进行大规模的进攻了。

11月11日，德军重新集结力量，发动了最后一次进攻，动用了5个步兵师、2个坦克师和2个工兵营在宽5公里的正面上对斯大林格勒发起第四次强攻。一天之内，双方为争夺每一寸土地、每一块石砖，都进行了异常激烈的战斗。苏第62集团军虽然再次被德军分割成三部分，但仍然坚守阵地牵制着德军。苏军在伏尔加河右岸坚守住了自己的阵地，这就为即将进行的反攻准备了先决条件。

早在10月初，最高统帅部就正式批准了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签署的反攻计划，代号为“天王星”。

“天王星”战役计划规定，苏军从斯大林格勒西北部和南部向卡拉季奇方向进行向心突击，合围那里的德第6集团军和第4集团军。

根据反攻计划，苏军不断地把部队调往准备实施突击的方向。为了迷惑敌人，在朱可夫的指挥下，苏军采取了一系列的伪装措施。

10月中旬，当德军的进攻陷于停顿之时，斯大林格勒前线各方面军接到命令，停止一切具有攻势的作战行动。这一命令通过未加密线路发布，同时命令中详细地讲述了如何安排冬季的防御、如何构筑工事、如何在支撑点储备给养、弹药、装备等。与此同时，苏军在莫斯科西部方向做出准备采取大规模冬季进攻战役的架势。

德国情报机关上钩了。

苏军源源不断地开往斯大林格勒前线。到1942年11月19日，苏军完成了集结。这时，苏军在斯大林格勒前线已有3个方面军：顿河方面军、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三个方面军的总兵力达到110万人，1.5万门大炮，1400余辆坦克和1400架飞机。而在斯大林格勒方面作战的德国军队有101万人，1万余门大炮，600余辆坦克和1200架飞机。

苏德两军的军力对比发生了变化。苏军在坦克和火炮上占有优势。但是，决定战役命运是指挥员的指挥艺术和前线官兵的战斗技能。

苏最高统帅部考虑到交通线的重要，首先恢复已被德军破坏的铁路、桥梁、车站，并修建了新的交通线。从1942年10月到1943年2月共修建了1160公里长的铁路支线，恢复了1958公里的铁路线和293座铁路桥，保证了斯大林格勒地区的交通运输。

为了使反攻达到出奇制胜的效果，苏军最高统帅部还特别要求加强隐蔽和伪装部队的措施，尤其是要求炮兵一定要在敌人防御的主要突击方向上，建立重兵集团，达到德军两倍数量的优势。

1942年11月19日7时30分，隆隆的炮声宣告了西南方面军和顿河方面军揭开了苏军反攻的序幕。

根据最高统帅部下达的进攻命令，集结在三个狭长突击地带上的大炮和迫击炮向预先侦察到的目标一齐开火。在实施了一个小时的破坏性

射击和 20 分钟的压制性射击后，8 时 50 分，支援步兵的坦克群首先发起进攻。

举世瞩目的斯大林格勒大反攻正式开始了。

在斯大林格勒西北部，苏军西南方面军的 3 500 门大炮直射德军阵地。然后，以坦克和机械化部队为先导，苏军越过草原，首行突向德军薄弱阵地——罗马尼亚第 4 集团军。罗马尼亚军不战而溃。苏军向前推进了 35 公里，由于德军派出装甲部队前去支援，苏军才减慢了反攻的速度。

德陆军参谋长向希特勒报告了前线的进展情况，同时建议从斯大林格勒撤退，即将第 6 集团军撤出，调转方向，加强后卫，巩固新前方，然后进攻突入罗马尼亚军阵地的苏军。这样可在更靠西侧的地域建立一条牢固的防线，既为第 6 集团军解围，也给苏军造成困境。

刚愎自用的希特勒根本听不进下属这一还算明智的建议，他暴跳如雷：“你只有一个建议——撤退！你的对手又是朱可夫，就认输了吗？”接着，他又愤怒地嚷着：“我决不允许离开伏尔加！我决不许从伏尔加撤退！”

然而，德军已经无法阻挡苏军的前进步伐了。22 日夜间，苏军占领了顿河桥，并分批强渡顿河。

为了迅速断敌退路，防止德军龟缩，苏军第 26 坦克军军长罗金少将决定利用夜暗，先夺取卡拉季奇附近顿河上唯一剩下的一座桥梁。22 日凌晨 3 时，他命先头部队的上百辆坦克全部打开车灯，成纵队沿着从奥斯特罗夫到卡拉季奇的公路，穿过德军数十公里的防御阵地向大桥开进。

苏军的先头部队迅速控制了左右河岸，并发出信号弹，通知后续部队加速前进。

德军发现中计，但为时已晚，苏军坦克里应外合，迫使德军向两翼败退。苏军第 26 坦克军固守在桥梁附近，切断了敌军的退路，粉碎了敌人向西面德军靠拢的企图。4 天之后，苏军两支先头部队在斯大林格勒的西面、德军第 6 集团军背后 20 公里的地方会师，这一会师不仅决定了斯大林格勒城内 25 万德军士兵的命运，而且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在苏联战场上的转折。

斯大林格勒方面军根据朱可夫的命令，于 11 月 20 日拂晓从城南发起反攻，也像在斯大林格勒西北部那样，苏军突破了罗马尼亚第 4 集团军的防线后，向西北推进。

眼看斯大林格勒的德军受到两面包围，德军集团军司令部命令后方梯队和后勤部队组成战斗队进行抵抗。但这支部队没经过训练，装备不齐，只能延缓苏军的进程，并不能挽救第 6 集团军被围歼的命运。

23 日，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在卡拉季奇与西南方面军会合，于是，斯大林格勒地区的敌军全部落在网里。

伏尔加河东岸的苏军也开始了反击。他们向城内的德军阵地发起了猛烈地炮击。斯大林格勒正北面的顿河方面军也发动了攻势。自 11 月 22 日起，他们与斯大林格勒方面军一起对德军进行压缩。

战斗进行至 11 月 30 日，苏军已完成了对德军共 22 个师 33 万人的合围，将其压缩在 1 500 平方公里的地域之内。斯大林格勒前线德军的

日子已越来越不好过了。

4 横扫“冬季风暴”

当苏军揭开斯大林格勒反攻序幕的时候，朱可夫已离开了斯大林格勒，转往加里宁方面军，部署该方面军的进攻。

就在这时，斯大林对前线的形势感到忧虑，他给朱可夫打来电话，要求朱可夫对斯大林格勒前线的形势做一次冷静的分析。

斯大林此时的担心是，由于被合围的敌军数目过大，一旦德军决心突围，苏军可能会支持不住。

朱可夫全面分析了战场的形势后，于 11 月 29 日向斯大林发去一份电报。电报中说：

目前，被合围的德军迫于现状，是不敢轻易冒险突围的。不过，如果有自下奇尔奇卡亚—利捷利尼科沃地域的辅助突击，则另当别论……为不使下奇尔奇卡亚和利捷利尼科沃的敌军集团同斯大林格勒的敌人会合，必须先集中力量对付敌军的这一集团。

与此同时，德军那边紧急组建了担负解围任务的“顿河”集团军群，司令是曼斯坦元帅。曼斯坦因是 1940 年进攻法国的“黄色方案”的策划者。他上任后，很快就制定了两项解围计划，其基本结论和朱可夫如出一辙：德“顿河”集团军群的主要兵力应从利捷利尼科沃地域向苏军发起进攻，以支援第 6 集团军和第 4 集团军。另外，作为一项备用方案，应派坦克师秘密而迅速地沿顿河西岸向下奇尔奇卡亚出动，从那里发起进攻。

曼斯坦因得意地把自己这个战役计划起名为“冬季风暴”。

不幸的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朱可夫早已料到 he 这步棋，指挥加里宁方面军在下奇尔奇卡亚和利捷利尼科沃一带严阵以待，12 月 12 日，德军的“冬季风暴”打响了。

德“顿河”集团军群沿着铁路线北上，不顾一切伤亡地向斯大林格勒方向猛冲。16 日，他们渡过阿克塞河，受到了苏军的顽强阻击。双方指挥官都知道这场搏斗的意义。德“顿河”集团军群需要尽快地冲过去解救第 6 集团军，并且要重新占领斯大林格勒城近郊的战线。而苏军则是向着德军愿望相反的方向努力，拼力粉碎德军的企图。

12 月 19 日，德军同苏军在卡尔穆克草原与苏军展开了激战。21 日打到了米什科沃地区。这时，德援军同第 6 集团军防守的外围只有 40 公里。精疲力竭的德军人员和技术兵器受到了重大损失，给养供应接济不上，风餐露宿，士兵长时间得不到休息，部队疲惫不堪。德军进攻的势头减弱下来，攻势陷于停顿。

“冬季风暴”开始时，曼斯坦因要求第 6 集团军配合向西南方面突围。但被围的德军经过旷日持久的激战，也已精疲力竭了。再加上燃料缺乏，给养不足，已无力再战。而西南方向的苏军，则以 450 辆坦克为先导，发起了强大的攻势。来势凶猛的苏军在粉碎了意大利第 8 集团军后，于 12 月 23 日已经直接威胁到“顿河集团军群”后方。在苏军的强大攻势下，“顿河集团军群”的左翼发生动摇，被迫向西撤去。

为了不遭到同第 6 集团军同样的命运，曼斯坦因下令北上的德军向

南后撤，并将第 6 坦克师调到顿河以西，抵挡来自北方的苏军，同时还下令第 6 集团军停止突围。

朱可夫抓住这个机会，于 12 月 24 日发动了新的攻势，紧追退却之敌，将其从斯大林格勒推出 200~250 公里以外。处于包围之中的德军阵地也被压缩得越来越小，到了弹尽粮绝、山穷水尽的地步。

德第 6 集团军对于他们的处境非常清楚，他们一再请求希特勒准许他们突围。但希特勒却要求他们“死守斯大林格勒”。希特勒把斯大林格勒视为东线前出的堡垒，第 6 集团军则是堡垒的守备队。而堡垒守备队的任务就是经得起围困，如果必要的话，要一直坚守到第二年春天。

希特勒的固执为朱可夫实现战役目的创造了条件，正是希特勒无知的固执最终葬送了保卢斯的第 6 集团军。

气温这时下降到零下 30 度，德军大批官兵被冻伤，另有数千人患有伤寒痢疾。由于苏军的空中封锁，就靠空运维持供给日甚艰难，德军每日所需的作战物资最少为 750 吨，但实际上运到的每天还不足 100 吨。1 月 6 日只运到了 45 吨，到 1 月 21 日起空运停止了。显然，德军距末日来临已经为期不远了。

5 瓮中捉鳖

在斯大林格勒前线，被团团围困的德第 6 集团军此时已内无粮草，外无援兵，奄奄一息。1943 年 1 月 8 日，苏军指挥部向被围德军发出了最后通牒，命令他们停止抵抗，缴械投降。但德第 6 集团拒绝了苏军的要求。

1 月 10 日，苏军开始执行代号为“指环”的围歼德军的作战行动。鉴于敌军的实力已大大削弱，这一任务只交给了一个方面军——罗科索夫斯基的顿河军去完成。

该方面军在 5 000 门大炮的火力掩护下，以坦克和步兵发起冲击，德军全线溃退。仅 6 天的时间，德军的阵地就被缩小了一半。

这时，苏军从人道主义出发，再次敦促德军投降，顽固的德军再次予以拒绝。

1 月 16 日晨，苏军占领了皮托姆尼克机场。这样，被围德军就只能通过仅存的古姆拉克机场接受空投援助。

1 月 22 日，苏军发起全线总攻，切断了古姆拉克的铁路线，占领了斯大林格勒南部，夺取了古姆拉克机场。至 26 日，德军只剩下南北长 20 公里，东西长 3.5 公里的地带。在此情况下，德第 6 集团军再次向最高统帅部报告说：

当前的处境是：部队弹尽粮绝，通讯联络中断，只能同 6 个师保持联系，南线、西线和北线上的部队无法统一指挥。东线局势严峻，1 万名伤员得不到起码的保护，步兵第 44、第 76、第 100、第 305、第 384 师已被歼，敌人突入许多地区，战线已经破裂。只在城区有一些支撑点和掩蔽工事，继续抵抗毫无意义。覆灭是难免的，为了挽救还活着的人，请即刻允许我们投降。

但第二天，第 6 集团军接到希特勒的回电却是：“不许投降，应固守阵地，战斗到最后一个人，最后一粒子弹！”

第 6 集团军指挥部只得继续执行希特勒的命令，毫无目的地拖延战事。

1 月 26 日晨，苏军实施决定性的突击。

当天傍晚，苏第 21 集团军由西向东进攻，驻守市区的第 62 集团军由东向西进攻，在“红十月工厂住宅区和马马耶夫高地胜利会师，将德第 6 集团军切割成南北两部分。苏军开始缩小包围圈。前出到市中心。

三天的时间里，德军 1.5 万人放下武器。一支罗马尼亚部队带着全部武器和装备集体向苏军投降。

1 月 30 日，苏军直插市中心。

1 月 31 日中午时，刚被希特勒晋升为陆军元帅的德第 6 集团军司令保卢斯和他的助手们向苏军宣布投降。

到 2 月 2 日，被围德军全部投降或被歼灭。至此，历时近 200 天的斯大林格勒大会战以侵略者可耻的失败而告终。

斯大林格勒会战标志着苏德战争，同时也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根本转折。至此，苏军开始掌握了战略主动权，德国被迫转入了战略防御。

在这场举世瞩目的大会战中，朱可夫功不可没。为了表彰他在这场会战中对斯大林格勒前线苏军卓越的全面领导，朱可夫同其他几位重要将领被授予重新设立的苏沃洛夫一级勋章。在朱可夫的勋章背面，赫然标着“第一号”的字样。与此同时，1943 年 1 月 18 日，朱可夫被晋升苏军元帅，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军荣膺这一荣誉的第一位前线指挥员。

第十章 血战库尔斯克

1 暴风雨前的平静

胜利结束斯大林格勒会战之后，苏军实施了一系列气势如虹的战略进攻，给予法西斯德国及其仆从国军队以不停顿的打击。在 1942 年至 1943 年之交的冬季战役中，苏军共粉碎了德军 100 多个师，在各个方向上击退德军 600~700 公里，特别是 1943 年 2 月 15 日，夺回了苏联第四大城市哈尔科夫，使德军整个南部战线都面临崩溃的危险。

为了改善帝国内部困境，防止法西斯集团分崩离析，希特勒决定于 1943 年在苏德战场发动大规模夏季进攻，夺回战略主动权，扭转战争进程。

这时苏军由于一路势如破竹，过于乐观，无视长途进击的消耗，一心希望造成德军更大的混乱。德军在“顿河”集团军群司令曼斯坦因元帅的指挥下，利用铁木辛哥的一次失误，于 2 月底发动逆袭，成功地夺回哈尔科夫，而且稳住了南部战线。这样，整条战线形成了一个以库尔斯克为中心的突出部，苏军在这个突出部内楔入很深。

库尔斯克是一座有 12 万人的小城。这一带的地形以草原和丘陵为主，其间散布麦田、甜菜田、果树园以及农舍。苏军在库尔斯克一带的突出部正面约长 240 公里，宽 160 公里。突出部的顶端较窄，大约是 110 公里左右。

对交战双方而言，库尔斯克突出部具有相当重大的意义。苏军可以以此为进攻前进基地，对德中央集团军群和南方集团军群的后方实施突击；而德军统帅部也认为由于苏军在库尔斯克一带过于突出，为德军从南北两个方向向库尔斯克根部地区实施向心突击并围歼那里的苏军创造了良好条件。

双方各打各的算盘。这样在 1943 年春，苏德战场上出现暴风雨前的平静。苏德双方都利用这个时机休整部队，并为在此地区进行一场大规模的战役集聚力量。

为了能投入更多的力量同苏军较量，希特勒宣布在国内实行总动员，采取各种手段来加强和完善第三帝国战争机器。与此同时，德军统帅部紧锣密鼓地制定战役实施计划。

德军在拟定自己计划时是从这样的估计出发的，即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命运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苏德战场目前几场交战的结局。希特勒认为，总动员已为对苏军实施积极的进攻行动提供了必需的物力和人力，可望重新掌握战略主动权，扭转战争的进程，使之对己有利。在东部战场的胜利可以重新建立在其盟国中已动摇了的德军的威信，巩固德国人民和军队的士气。经长时间的讨论，希特勒最后决定以粉碎苏军中央方面军和沃罗涅日方面军及库尔斯克突出部地域的战略预备队，作为在东方发动新的夏季战役的开端将是最适宜的。这次战役代号叫“堡垒”。

1943 年 4 月 15 日，希特勒签发第 6 号作战指令，称：

只要天气条件允许，我决心进行今年的首次进攻——堡垒进攻。这一进攻具有决定性意义……库尔斯克的胜利应当成为全球的火炬。

希特勒的计划是：“中央”集团军群所辖的第2集团军以8个师防守库尔斯克突出部的西部；第9集团军在奥廖尔以南共23个师，以15个师组成突击集团，任务是从北面向库尔斯克进攻。南方集团军群在别尔哥罗德地域共19个师，分别以8个师和6个师组成突击集团，从南面向库尔斯克进攻。以上共计50个师。此外约有20个师在突击集团翼侧行动，第4、第6航空队进行支援。

根据这一计划，德国共集结了90万名官兵，50个师（其中有16个坦克摩托化师），约1万门火炮和迫击炮，近2700辆坦克和强击火炮，2000多架飞机。用希特勒的话讲，他向库尔斯克弧形地带根部调动了“优秀的兵团、最好的武器、优秀的指挥官和大量的弹药”。

德军统帅部企图在顺利完成对库尔斯克的进攻之后，立即对苏西南方面军的后方实施代号为“金钱豹”的战役，从而把战线向东推移。希特勒认为，德军通过这两个行动，将消灭苏德战场南翼的苏军，从而导致苏德战场前线的战略形势发生利于德军的逆转。

希特勒的想法过于乐观了，也过于天真了。

1943年4月8日，朱可夫从沃罗涅日方面军向斯大林发去一份形势报告。这份报告是朱可夫同沃罗涅日方面军和中央方面军的指挥员经过讨论后提交的，其内容反映了以朱可夫为首的总参谋部的意见。在这份报告中，朱可夫谈了他对苏军在1943年夏秋两季采取行动的几点看法，朱可夫写道：

1.由于在1942—1943年冬季战局中遭受惨重失败和缺乏庞大的预备队，敌人于1943年春或初夏沿较窄的正面展开了进攻.....我认为敌军集团是针对我中央、沃罗涅日、西南三个方面军的.....

2. 在第一阶段敌人将从东北和东南实施突击.....敌人投入进攻我库尔斯克集团的兵力，可能达到15~16个坦克师，坦克总数约2500辆.....

3. 为了通过防御打败敌人，我们不但必须采取措施加强中央方面军和沃罗涅日方面军的反坦克防御，还必须在叶夫列莫夫、利夫内、卡斯托尔诺那、新奥斯科尔、瓦卢伊基、罗索什、沃罗涅日、叶列茨地域尽快部署战略预备队。预备队的主要兵力应部署在叶列茨、沃罗涅日地域.....

我认为我们部队近日内先敌转入进攻是不合适的。最好是先通过我们的防御消耗敌人击毁敌坦克，然后投入新的预备队转入总攻，彻底击溃敌军主要集团。

斯大林接到朱可夫的报告，极为重视，他立即通知总参谋长华西列夫斯基同各方面军司令商量一下。

根据斯大林的指示，4月初，苏军总参谋部召开大本营会议，讨论夏秋季计划，并征求各方面军司令关于作战行动的可能样式和德军可能的突击方向等意见。

4月11日晚，朱可夫从前线返回莫斯科。一到莫斯科，朱可夫立刻同华西列夫斯基及安东诺夫等人一起商讨前线的情况。三人取得了一致的意见：德军企图吃掉孤立的库尔斯克突出部，如果他们进展顺利并在库尔斯克突出部击溃苏军的部队，那么总的战略形势就将变得有利于敌人。

在统帅部大本营会议上，中央方面军司令罗科索夫斯基和沃罗涅日

方面军司令瓦杜丁也都表示与朱可夫等人看法相同，确信德军将在库尔斯克地域方向发动进攻。

朱可夫还进一步指出，德军夏季进攻之后，可能会在东面和东南方向发动进攻，同时不排除德军向东北方向进攻迂回莫斯科的可能性。

尽管苏军此时掌握着战略主动权，并有能力进行积极的进攻行动，最高统帅部大本营还是在事实上下了进行预先防御计划，并决定在所有方向上，首先是库尔斯克突出部建立坚强的大纵深多梯次的防御。

在大本营会议上，朱可夫强调指出：“为实施这一战役，应当保证牢固掌握战略主动权，最终在重要方向上转入总进攻。必须把德军的进攻阻止在防御的战术地幅内，否则，德军坦克兵团一旦突破了库尔斯克地域，将使中央方面军和沃罗涅日方面军处于困难境地。必须在库尔斯克弧形地带使德军主力遭受决定性的失败，因此库尔斯克弧形地带的会战计划是全部夏秋战略战役计划的核心。”

斯大林这一次对朱可夫和总参谋部的计划没有提出一点意见，他完全赞同朱可夫等人的看法，并责成朱可夫、华西列夫斯基等拟定出具体的实施方案。

4月12日晚，朱可夫等人向斯大林提交了详细计划，计划的主要内容是：为通过防御作战消耗德军突击集团并最终转入进攻，决定以3个实施防御。罗科索夫斯基大将指挥的中央方面军，由两个梯队组成，第一梯队编成内辖5个集团军，第二梯队编成内辖坦克第2集团军和坦克第19集团军，由空军第16集团军支援战斗。瓦杜丁大将指挥的沃罗涅日方面军也由两个梯队组成，第一梯队编成内辖4个集团军，第二梯队编成内辖坦克第1集团军和坦克第69集团军，由空军第2集团军支援战斗。这两个方面军总兵力达13万人，火炮和迫击炮1.9万门，坦克和自行火炮3444辆，飞机2172架。中央方面军的任务是抗击德军从奥廖尔方向的进攻，沃罗涅日方面军抗击德军由别尔哥罗德地域的进攻。此外，新组建的草原方面军作为预备队，由科涅夫上将指挥。

计划中还谈到，当苏军防御阶段作战取得成功后，将在奥廖尔和别尔哥罗德—哈尔科夫方向转入反攻，这一进攻任务将由西方面军、布良斯克方面军的左翼军队和中央方面军右翼军队实施；围歼粉碎德军别尔哥罗德—哈尔科夫集团由沃罗涅日方面军和草原方面军在西南方面军的协同下实施。

朱可夫等人的计划得到了批准。与莫斯科和斯大林格勒不同，在库尔斯克弧形地带转入防御不是被迫的，而是预先计划的，苏军并没有丧失在冬季战斗中夺得的主动权，只不过选择了对己有利的军事行动。

2 “库图佐夫”战役

为了迎接即将来临的大战，从4月份开始，苏军不断地向库尔斯克增兵，昼夜不停地修筑工事。

苏军充分地利用了库尔斯克一带略有起伏的地形，把防御的重点放在了突出部的南北根部，以高地为中心，设置反坦克掩体，在高地的两端修筑坦克和自行火炮掩体。短短的两个半月时间，苏军在巨大的库尔斯克突出部挖出了近1万公里的反坦克壕、堑壕和断崖，铺设了大面积的

雷场和 1200 公里的铁丝网。对此，美国作家凯登曾在《虎式坦克在燃烧》一书中写道：

在研究俄国人准备库尔斯克会战时，有一点很明显，德国人对战役的准备一向是有计划、讲效率的，从不忽视任何细节。这一点早就闻名于世。但现在俄国人在战役准备的细节和周密程度上却胜敌一筹……朱可夫在库尔斯克会战中的主要作战意图，是在莫斯科猛烈战斗结束后采取的，是在斯大林格勒会战中所拟定的那些措施的发展。防御开始了，德军在强攻中力量已经消耗殆尽……于是交战进程发生了变化。

1943 年 5、6 月间，朱可夫几乎寸步不离沃罗涅日方面军和中央方面军。他关心作战准备中的每一个微小细节，任何疏忽都休想逃过他的眼睛。朱可夫每天、有时一天几次，给斯大林发去电报，报告拟采取的各种措施。

在朱可夫的亲自过问下，苏军进行了周密的战前训练。特别是针对步兵对坦克的恐惧心理，专门开设了用 T—34 坦克对步兵进行的“碾压”训练。同时还对炮兵进行了快速变更发射阵地的训练，坦克兵则着重进行从掩体中进行精确射击和遭遇战的训练。

整个库尔斯克地区一片热气腾腾的景象，无数苏联军民投身于这场大战的准备之中，很快把库尔斯克突出部变成了一个坚不可摧的大堡垒。

在战线的另一端，德军也在进行着最后的准备。希特勒原本打算在 5 月份发起进攻。可是，由于 5 月的融雪，以及 25 万轴心国军队在北非的覆灭，使希特勒不得不再一再拖延攻击的发起日。而受命指挥“堡垒”战役的德军指挥官曼施坦因和莫德尔越来越感到不安。他们眼见苏军防线日渐坚固，认为德军已错失战机，硬发动进攻肯定会碰个头破血流。希特勒这时也变得信心不足，但他仍对德制的“虎”式和“豹”式坦克抱有幻想。这样，到 6 月底，当德军已集结起足够的新式坦克后，希特勒终于决定放手一搏。

7 月 4 日，希特勒向突击部队下达了临战动员令，定于次日发起进攻。

而苏军统帅部已于 6 月确定了前线作战指挥体制。6 月 30 日，朱可夫接到命令要他在奥廖尔方向协调中央方面军、布良斯克方面军和西方面军的行动，以实施击退敌人进攻的向奥廖尔突击的“库图佐夫”战役；华西列夫斯基被派往沃罗涅日方面军，在那里用该方面军和与之毗邻的西南方面军实施“鲁缅采夫”战役计划——在库尔斯克会战防御阶段结束后，向别尔哥罗德、哈尔科夫方向实施突击。

7 月 4 日晚间，朱可夫来到中央集团军司令部，在那里，他从白天抓来——一名德军俘虏口中得知，德军将于次日凌晨发动进攻。凌晨 2 时，苏第 13 集团军报告发现德军正在进入阵地。

朱可夫当机立断，决定先发制人，他一面向最高统帅部通报情况，一面决定实施炮火反准备，即在德军炮兵开始进行炮火准备之前的一刻，先敌开火，打乱德军阵脚。

20 分钟后，在朱可夫的指挥下，苏军阵地上的所有火炮突然向德军阵地开火，整个库尔斯克地区顿时火光冲天，把夜晚映照得如同白昼一般。

根据战役结束后得知的情况，苏军开火的时间比德军预定的炮火准备时间正好提前了 10 分钟。正是由于朱可夫的临机决断，苏军才得到了这重要的 10 分钟，使德军完全丧失了战机。

由于苏军的行动极为突然，德军进攻部队被打打了个措手不及，损失惨重，原定开始进攻中央方面军的时间推迟了两个半小时，进攻沃罗涅日方面军的时间则推迟三小时。

5 时 30 分，在苏军炮火打击下刚缓过气来的德第 9 集团军在奥利霍尔特卡主突击方向上向罗科索夫斯基的中央方面军发起强大的坦克冲击。

德军进攻部队前面是“虎式”重型坦克和“斐迪南”强击火炮群，每群 10~15 辆，随后是中型坦克群，每群 50~100 辆，以后是摩托化步兵。

在由北向南的 40 公里长的战线上，近千辆德军坦克像一群狂奔的野牛，扬起冲天的烟尘，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铺天盖地向苏军压来。

苏军沉着应战，一次次地打退了敌人的进攻。

库尔斯克北端转眼间弹片横飞、横尸遍野。

7 月 5 日全天，德军先后发动 5 次进攻，但最后只突入苏军防御地带 6~8 公里。

第二天，德军在莫德尔的指挥下不顾一切损失继续向前冲。可是，罗科索夫斯基这时把作为预备队的坦克第 2 集团军拉了上来，没等德军往前再走一步，就一棍子砸将上去。

莫德尔只得迎战，一场大规模的坦克决斗爆发了。

在烟尘滚滚的平原上，苏德坦克缠在一起，在炮弹的呼啸声中，一辆辆坦克化为烟柱……

战斗结果是德军装甲兵挫败了苏联坦克的反突击，但自己的炮弹也已用尽，而且陷入了苏军预设的无边无际的雷场。莫德尔自知已无力进攻。这样，德军在库尔斯克突出部北部的进攻，48 小时后就告失败，被迫转入防御。

朱可夫把发生的一切都详细报告了斯大林。在报告的结束部分，朱可夫写道：

我们的步兵和炮兵，尽管有一些损失，但打得很出色，有组织地迎战敌人大量坦克的冲击，今后还会继续这样打下去。

德军并不甘心失败，他们重新部署力量，改变突击方向，投入了全部坦克预备队，再次杀向中央方面军。他们有时从波内里发起冲击，有时从奥利霍瓦特卡发起冲击，可是他们到处都碰到了坚固的防御。

尽管德军不顾一切疯狂猛攻，但是在近一周的苦战中，他们只向前推进了 6~12 公里。由于朱可夫和罗科索夫斯基的高明指挥，中央方面军根本不需要草原预备队的支援，靠自己的力量打退了敌人的进攻。

朱可夫非常满意地向最高统帅汇报了交战的初步总结，并开始着手进行转入进攻战役的准备。7 月 11 日，朱可夫向斯大林报告：

进攻战役的准备工作已全部结束。为了查明敌人的防御前沿的情况，今天已进行了有力的侦察。据所有在这些方向上的集团军和兵团司令们报告，我们的部队已经接近敌人前沿。

在突出部的另一端，德军的运气似乎要比他们的同伴好一点。德军

在这一路集中了其所谓“军中之花”、武装党卫军的3个坦克师——“帝国师”、“骷髅师”和“阿道夫·希特勒师”，其新式坦克的数量大大超过北路德军。

南路德军的进攻开始于7月5日6时，在德军发起进攻不久，天降大雨，许多小溪成了坦克无法通过的激流，待工兵架好桥后，已过了12小时。可继续前进后又进入了苏军的雷区，遭到了苏军反坦克火车的沉重打击。但是，由于苏军的反坦克炮无法击穿“虎”式和“豹”式坦克的厚装甲，因此德军尽管处境困难，到夕阳西下时还是在两处楔入了苏军第一道防线。

鉴于德军来势凶猛，为保存力量、避敌锋芒，瓦杜丁下令将部队撤至由坦克第1集团军守卫的第二道防线。

德军第4装甲集团军司令霍特将军见第一天没有什么成果，于是在第二天把6个装甲师聚集成密集队形，每一公里进攻正面都配有100多辆坦克，继续向苏军进攻。

7月6日天刚破晓，德军坦克、自行火炮就蜂拥而出，拖着遮天蔽日的灰尘，杀向苏军。

瓦杜丁见霍特来势汹汹，也毫不示弱，立刻出动坦克第1集团军迎战。

于是，苏德双方在奥博扬附近爆发了又一次大规模坦克会战。一时间，天昏地暗，在几小时内，成百辆的坦克变成一堆堆破铜烂铁。炮弹、炸弹的爆炸和坦克的吼叫使大地呻吟，数百架飞机在空中穿梭不断。坦克的奔驰以及炮弹和炸弹的爆炸掀起满天尘土……

这场坦克会战中，苏军在战术运用方面犯了一些错误。苏军战斗机飞行员只顾着同德军战斗机角逐，却忘了去攻击对坦克威胁极大的轰炸机和攻击机。结果，德军的俯冲轰炸机和对地攻击机，不断地从高空直扑而下，向正忙于与德军坦克厮杀的苏军坦克开炮。而德国的新式坦克的火力和装甲防护也要优于苏联的T—34型和KB型坦克，结果在正面对抗中占了上风。

战斗至正午，瓦杜丁意识到苏军坦克第1集团军的损失大大超过德军，便果断命令退出战斗，依托第二道防线转入防御。

德第4装甲集团军虽然在这次战斗中取得了战术上的胜利，但是并未能突破苏军的整个防线，只是在苏军的防线上砸进去一个坑，楔入不及10公里。

德军最高统帅部经过这两天的激烈战斗感到情况不对，开始给自己找台阶。德国电台报道说，发动进攻的不是德军而是苏军，声称：“苏军指挥部接连不断地把战斗部队投入战斗，但是在所有的地段上，我军防御的主要阵地均牢牢掌握在我军手里，在正面的任何一个地段，我军都没有把像样的装甲兵投入战斗。”

找台阶归找台阶，希特勒并不想就此了事，原先反对发动“堡垒”战役的曼施坦因也不愿草草收场，7月7日，霍特的第4装甲集团军又运用与前一天相同的战术，在空军的密切支援下，连续猛敲昨天在苏军防线上砸出的那个坑。经过3天的苦战，终于在9日切入苏军防线35公里，到达奥博扬。

3 坦克肉搏战

此时苏军在库尔斯克南部的情况已非常危险。沃罗涅日方面军的全部预备队已经投入战斗，但德军细细的楔子已经砸入苏军防御纵深，到达一个集团军的后方，德军似乎真的要砸漏苏军的防线了。如果在一年前，德军真有可能得手。但此时情况不同了，斯大林见南路德军缓缓向前推进，即根据华西列夫斯基的意见，亲自下令命草原方面军的近卫坦克第5集团军日夜兼程，向北开进，把这支新锐部队交给瓦杜丁。

与此同时，斯大林紧急命令朱可夫转向南部战线，负责协调沃罗涅日和草原两个方面军的行动。

瓦杜丁预计近卫坦克第5集团军在7月11日能赶到，于是收缩兵力，死守奥博扬。挡住去库尔斯克最近的道路，把另一条通道——普罗霍罗夫卡留给赶来的近卫坦克第5集团军。

曼施坦因见德军在奥博扬方向已经楔入苏军纵深，想乘胜长驱直入，不料遭到苏军的迎头痛击，经过连续两天的激战一无所获。于是，曼施坦因转而调头北上，直插普罗霍罗夫卡，想通过该城捅破苏军铁桶一样的防线。

曼施坦因的这一决定从战术上讲，无疑是对头的。可是，他所面对的是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这样的对手。早在7月9日，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就估计到南线德军在进攻奥博扬失败后肯定会调头冲向普罗霍罗夫卡，必定会同近卫坦克第5集团军和近卫第5集团军遭遇，届时定会有场大规模坦克遭遇战。因此，苏军早已做好了遭遇战的一切准备。

一切正如朱可夫所预料的那样，德国第4装甲集团军果真在奥博扬受阻后冲向普罗霍罗夫卡，恰好与赶来的苏近卫坦克第5集团军和近卫第5集团军遭遇。

于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规模最大的坦克决战在普罗霍罗夫卡爆发了。

决战的一方是德军装甲兵老将霍特和他的400多辆(门)坦克和自行火炮，其中100辆是世界最先进的“豹式”坦克。决战的另一方是苏军坦克兵新秀罗特米斯特罗夫将军和他的750辆(门)坦克和自行火炮。7月12日清晨，这两股钢铁洪流在普罗霍罗夫卡相碰了。

这天清晨，坚守在普罗霍罗夫卡西南的苏军第69集团军受德军200辆坦克的攻击，形势紧迫，向瓦杜丁求援。瓦杜丁立即命令罗特米斯特罗夫向德军发动反突击。

8时30分，罗特米斯特罗夫进行了15分钟炮火准备后，向德军发起了进攻。

几乎在同一时间，德党卫军第2装甲军的3个师——“帝国师”、“骷髅师”、“阿道夫·希特勒师”也发起了进攻。这次坦克大会战中，苏德双方一共投入坦克和自行火炮1200辆(门)，战斗进行得极为激烈。在双方坦克交战的同时，在普罗霍罗夫卡以西地域的上空，双方在一天时间里还进行了12次激烈的空战。

德国的新式坦克虽然在装甲方面和火力方面优于苏军坦克，但由于双方进行的是坦克大战，德军坦克的火力优势体现不出来，而其厚装甲在近战中也显得不够灵活。在激战中，苏军坦克勇敢地冲入不灵活的德

军坦克的战斗队形，进行猛烈的摧毁。

德军用重型坦克投入战斗的计划破产了。

这时，霍特感到形势不太妙，决定撤出战斗，重新部署兵力。可是，由于双方坦克搅在了一起，根本无法重新组织战斗队形，只能按不情愿的方式继续打下去。

苏军在战斗中勇猛顽强，在极端情况下宁肯与敌人相撞而同归于尽，也不让敌人活着逃走。

一个德国坦克兵对这次会战胆战心惊地回忆道：

敌人无数坦克向我们猛冲，我对俄国人压倒一切的威力的印象从来没有像那一天深。团团的硝烟使航空兵无法支援我们，大量 T - 34 坦克很快冲破我们的队形，向整个战场猛攻。

战斗进行得异常惨烈，华西列夫斯基元帅后来在他的回忆录这样写道：

我目击了两股钢铁洪流于 7 月 12 日在库尔斯克突出部进行的真正规模的坦克决斗……数百门火炮和我们所拥有的全部火箭炮同时参加了战斗，结果在一小时内燃烧着的德军坦克和我方坦克遍布战场。

这场空前血腥的大战从上午一直进行到夜幕降临，整整持续了 8 个小时。德国人最终支撑不住，丢下熊熊燃烧的 300 多辆坦克，仓皇逃去。苏军近卫坦克第 5 集团军也损失过半，700 多辆坦克残骸有的紧紧撞在一起，有的炮塔被掀掉，遍地都是被烧成焦炭的尸体……

尽管在这次战斗中苏军的损失超过德军，但是战场的真正胜利者是苏军。正如一位西方历史学家所写的那样：“傍晚，俄国人成了战场的主宰。历史上最伟大的坦克会战以俄国人的胜利而告终。”

在这场历史性交战结束的 7 月 13 日早晨，朱可夫来到沃罗涅日方面军指挥所。通过研究司令部的文件和审讯战俘，朱可夫看出交战的危机已要过去了。到 7 月 16 日，德军已完全停止了进攻并逐渐开始向出发阵地退却。

现在，决不能错过时机！必须及时切断退路，不让敌人回到自己的堑壕里，恢复其火力配系。朱可夫决定立即组织部队按预定计划对德军展开全面进攻。

7 月 12 日，就在普罗霍罗夫卡大战的同一天，库尔斯克突出部北面的布良斯克主方面军，西方面军按计划发起了“库图佐夫”战役，杀向奥廖尔。

7 月 15 日，罗科索夫斯基的中央方面军也开始反攻。

8 月 3 日，南线的布良斯克方面军也转入进攻。

战斗到 8 月 5 日，苏军解放了别尔哥罗德和奥廖尔。

8 月 23 日，苏军又乘胜解放了哈尔科夫。至此，规模宏大的库尔斯克战役以苏军的辉煌胜利而告结束。

在库尔斯克战役中，德军损失了约 50 万官兵，1500 辆坦克，3 000 门火炮和 3 400 多架飞机。装甲部队这根德军突击力量的脊梁柱被苏军的铁拳打断了。苏军在库尔斯克发动的进攻最终发展成为战略总攻，使苏德战场扩大到 2 000 公里。德军从此转入了全面战略防御。

战后，斯大林在谈到库尔斯克战役时，这样说道：……库尔斯克会战的胜利，这是我们给德军挖坟墓的开始……从 1943 年冬季开始，我军

攻克了被德军占领领土的一半，在南部战线，我军逼近波兰和罗马尼亚边境……

这就是库尔斯克战役的伟大意义。

如果说斯大林格勒会战预示着德国军队的没落，库尔斯克会战则使它遭到了灭顶之灾。

第十一章 攻克柏林

1 挺进“狼穴”

在苏军最高统帅部的英明指挥下，五路大军以秋风扫落叶之势，横扫苏联境内的法西斯残余匪帮，经过“三大战役”、“十次打击”后，从不同战略方向，挺进希特勒老巢柏林。

4月5日，朱可夫把所有的集团军司令、军事委员会的委员、军的指挥员都召集到设在门泽胡德小城的方面军司令部。在房间的墙上都是用亚麻布遮盖着的地图。大约有一百多将军和军官聚集在大厅里，朱可夫用庄严而平缓的声调宣布：

“同志们！我请你们到这里来是为了宣布斯大林同志的命令。”

全场鸦雀无声。朱可夫提高了嗓音，继续说：

“最高统帅，苏联元帅斯大林同志命令我们方面军的部队在柏林方向从4月16日凌晨转入进攻，包围法西斯德国首都——柏林，粉碎和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在柏林的上空升起胜利的旗帜！”

朱可夫的话音刚落，大厅里就响起热烈的掌声，持续了几分钟才逐渐停下来。接着，朱可夫像往常一样，详细说明了方面军、各集团军和各兵团在这次决定性战役所承担的具体任务。为了使到会的将军们更好地领会战役意图和受领的任务，朱可夫在会议厅的地板上铺开一张大比例尺地图，按照地图上的各种标示符号，进一步交待进军战线，战役各阶段的明确要求、突破口、敌人的兵力部署等等，同时还进行了柏林市区的沙盘作业。作战会议开了两天，尔后，这些将军分头返回自己部队，层层动员、层层交待，朱可夫又深入到每个集团军和兵团进行详细讲解，力求每个指战员都能准确领会统帅部的意图。一杆子插到底，深入动员，反复交待，这是朱可夫的一贯作风，他认为，惟有每个指战员都真正领会了统帅部的意图，行动起来，才心中有数，便于他们减少盲目性，发挥积极性和主动性。

朱可夫一再强调，虽然取得了重大胜利，敌我兵力对比发生了根本变化，也丝毫不可掉以轻心，决不能轻敌，让指战员充分认识到：在整个战争期间，还没有碰上夺取像占有90平方公里面积的柏林这样大的、具有强大防御工事的城市。第一白俄罗斯方面军司令部知道：实际上柏林已变成一座堡垒。

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在柏林地区，敌人还有214个师其中34个坦克师，15个摩托化师，有100万人以上的军队，1.04万门大炮和火箭炮，1500辆坦克和自动大炮，3300架飞机。此外，陆军总司令部预备队有8个师。柏林市民还组建了200多个人民冲锋队营，守备部队总数超过20万人。法西斯德军在柏林方向上的防御是兵力密集的纵深防御，它包括奥得河—尼斯河地区及柏林防御地域。奥得河—尼斯河地区构筑有三道防御地带，纵深20~40公里；柏林防御地域包括外层、内层和市区三道环形防线。在屈斯特林登陆场之前和科特布斯方向，防御工事尤为坚固，每3公里正面有1个师，每1公里正面有60门火炮、17辆坦克。希特勒德军指挥部曾采取种种措施阻止苏军夺占柏林。

苏军最高统帅部在准备对法西斯作最后决战——强攻柏林时，严格

遵循反希特勒同盟各国商定和宣布的迫使法西斯德国在政治、军事和经济各方面无条件投降的政策。为实施柏林战役而动用的兵力有：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白俄罗斯第2方面军、乌克兰第1方面军、波罗的海舰队部分兵力、空军远程航空兵第18集团军（飞机800架）、国土防空军以及第聂伯河区舰队，还有波兰第1、2集团军。该集团编成共计有162个步兵师和骑兵师，21个坦克军和机械化军，4个空军集团军，合计兵力250万人，拥有火炮和迫击炮约4.2万门、坦克和自行火炮6250余辆（门）、作战飞机7500架。这样就造成了兵力兵器的对敌优势：人员比敌人多1.5倍，炮兵多3倍，坦克和自行火炮多3.1倍，飞机多1.3倍。各方面军主要突击方向上的对敌优势更大。柏林战役的目的是，粉碎防守柏林方向的法西斯德军集团，攻占德国首都柏林，为了给柏林守敌以决定性打击朱可夫元帅在部署兵力，采取密集突击的战术，把68个步兵师、3155辆坦克、2.2万门大炮和火箭炮集中到突破口比较狭窄的地段上，1公里战线大炮和火箭炮的密度超过了300门。

2 揭开决战的序幕

4月16日凌晨3点钟，苏军向柏林发起总攻，开始是炮兵准备和航空兵准备。

在夜间3点钟，炮击开始了，万炮齐射。无论什么都不能同它相比较：第一白俄罗斯方面军在战役第一天消耗的123.6万发炮弹和迫击炮弹中，50万发炮弹用在这次对柏林的25分钟的炮击行动中，方面军司令朱可夫有意识地计划用前所未有的猛烈和短促的炮兵准备，使敌人惊慌失措。希特勒分子立刻遭到了不小损失，使调集到前沿阵地的德国军队处在毁灭性的炮火之下。

在突破地段相隔200米的密集炮群还没有停止轰击，143台对空探照灯突然发出了闪烁的强光。从下面照射，步兵和坦克的推进使希特勒分子产生了惊慌，他们得出的结论是，俄国人有了新的武器——这些新武器可以使人变成瞎子。在深夜，几百架轰炸机对准敌人防御阵地纵深处的目标进行袭击，而到了黎明，轰炸机和强击机就威胁着战场。在战役的第一昼夜，空军就出动了6550架次。

守敌遵照希特勒宣布的关于保卫柏林的命令，进行浴血顽抗。苏军不得不进行艰苦的巷战，付出很大代价，为了尽快结束巷战，使敌人士气沮丧，最后决定，用1.1万门大炮同时向城市开火，从4月21日至5月2日向柏林整整发射了80万发炮弹，把筑垒地域的街道几乎全部夷为平地。

3 红旗插上帝国大厦

在大炮轰隆声下，红军进入了帝国办公厅地区。4月24日，第5突击集团军司令别尔扎林上将被任命为苏军的柏林卫戍司令。4月29日朱可夫写道，“在城市中心展开了最激烈的战斗”。第1008步兵团第1营共青团组织负责人格罗莫夫少尉这一天在市政厅大厦上升起了红旗。因为这个伟大的英勇行为，他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第二天，也就是在5

月1日夜间，红旗在国会大厦上升起来了。

5月1日早晨4点钟，丘依科夫将军向朱可夫的报告，授权来进行停战谈判的德国总参谋部参谋长克雷勃斯将军已被送到第8近卫军集团军指挥所。克雷勃斯通知，希特勒已经自杀死了。朱可夫指派自己的副职索科罗夫斯基将军同克雷勃斯进行谈判，而自己则用电话同最高统帅联系。斯大林听了朱可夫的报告，希特勒自杀的问题，他骂道：

“这个卑鄙的家伙完蛋了！可惜没有活捉到他。”

斯大林指示：对德国根本不能谈判，只能无条件投降。

接着，就这样突然地结束了谈话：

“如果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情况，在早晨之前不要给我打电话，我想稍许休息一会儿。今天我们要举行五一节阅兵式。”

听了这些话，朱可夫心里感到很温暖。不知为什么他十分突然地感到：盼望已久的和平终于来到了。五一节的莫斯科！“我清楚地想象”，朱可夫回忆，“正是在现在，莫斯科的卫戍部队在向红场走去。在早晨，他们就来到自己的位置，在开始进行阅兵式的演说以后，他们在列宁墓前面，在政府和党的领导人前面，以检阅的分列式走过去，沿着古老的克里姆林宫的围墙走过去，踏出清晰脚步声，他自豪地显示出从法西斯主义威胁下解放欧洲的苏联武装力量战无不胜的强大威力。”

可是在这里，在柏林，一片交战隆隆声……正在进行光明和黑暗的最后决斗……大地已经出现了黎明的曙光。

朱可夫强硬地宣布，在早晨10点钟以前，要在所有盟国面前宣布德国无条件投降。可惜，没有得到戈培尔的回答。于是，只好继续对城市进行猛攻。

5月2日1点50分柏林城防司令部的无线电台宣布停止军事行动。5月2日早晨，被俘虏的柏林城防司令官魏德林格命令德国军队停止抵抗。到15时全部放下武器。希特勒分子7万多久经沙场的士兵举手投降，不包括伤员。“他们之中许多持枪作过战的人，很显然，在最后几天里他们都逃跑或者躲避起来了，”朱可夫更准确地说明了这些数字。

4 胜利阅兵

攻克柏林，德军无条件投降，经过四年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苏联人民终于战败德国，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彻底胜利。

在这万民欢腾的日子里，斯大林在一次会议上向当时任苏军总参谋长的安东诺夫提出举行胜利阅兵式的建议：

“为了祝贺战胜法西斯德国，我们是否就在莫斯科举行一次胜利阅兵式，并邀请立功最多的英雄——士兵、军士、准尉、军官和将军们前来参加呢？”

当时，总参谋长和在场的各位将帅都对这一想法表示热烈支持，并当场提出了许多切实可行的具体措施和建议。

关于谁当阅兵首长和谁当受阅部队总指挥的问题，当时未作讨论。大家心里都认为，阅兵首先理所当然地应由最高统帅担任。

安东诺夫根据斯大林的指示，为阅兵做好一切必要的准备，并拟制出阅兵训令。到第二天，所有文件都呈报给了斯大林，并得到了批准。

预定由卡累利阿方面军、列宁格勒方面军、波罗的海第一方面军、白俄罗斯第一、第二、第三方面军、乌克兰第一、第二、第三和第四方面军，以及海军和空军各派出一个混成团参加阅兵。

每个混成团的编成内，应包括有苏联英雄、光荣勋章获得者、著名的狙击手和战功最多的勋章获得者——士兵、军士、准尉和军官。

各方面军的混成团均由方面军司令亲自率领。

并决定将曾升起在柏林国会大厦圆顶上的红旗，以及苏军在战斗中缴获的法西斯德军的战旗运来莫斯科。

在5月底和6月初，为阅兵进行了紧张的准备。6月中旬，全体受阅人员都穿上了新制的礼服，并投入了节日前的操练。

6月12日，加里宁授予朱可夫第三枚苏联英雄金星奖章。

6月18日，斯大林将朱可夫元帅请到他的别墅去。

他问朱可夫骑马的技术是否已经生疏。朱可夫回答说：

“没有，没有生疏。”

“是这么一回事，你将担任胜利阅兵式的阅兵首长，受阅部队总指挥由罗科索夫斯基担任。”

朱可夫立刻回答说：

“谢谢给我这样的荣誉。但由您来阅兵不是更好吗？斯大林同志，您是最高统帅，就权利和义务来说，都应由您来担任阅兵首长。”

斯大林对朱可夫说：

“我当阅兵首长已经太老了。还是你来当吧，你年轻一些。”

阅兵时，受阅部队是按各作战方面军的顺序，从右向左排列。排在最右翼的是卡累利阿方面军混成团，然后是列宁格勒方面军混成团、波罗的海第一方面军混成团。这样按照顺序下去。排在左翼最末端的是乌克兰第四方面军混成团、海军混成团以及莫斯科军区的卫戍部队。

每一个混成团都专门挑选了各自特别喜爱的军队进行曲。在中央机场举行了多次阅兵式的预演，而最后的总预演是在红场上进行。在短短的期限里，各混成团都演练得很出色，给人以很深的印象。

6月22日，各报刊载了最高统帅的下述命令：

为了庆祝在伟大卫国战争中取得的对德国的胜利，定于1945年6月24日，在莫斯科红场举行作战部队、海军部队和莫斯科卫戍部队的阅兵式——胜利阅兵式……

阅兵首长由副最高统帅、苏联元帅朱可夫担任，受阅部队总指挥是苏联元帅罗科索夫斯基。

最高统帅苏联元帅斯大林

莫斯科，1945年6月27日

那盼望已久的、令人不能忘怀的日子来到了！苏联人民四年来一直期待着这一天，最后终于打败法西斯德国，取得了光辉的胜利。

1945年6月24日，朱可夫比平时起得早些，想弄清气象预报是否正确，他朝窗外一望，一片细雨蒙蒙，他多么希望他们这次的预报是错误的啊！

但是很遗憾，这次的天气预报是准确的。莫斯科的天空一片阴沉，还下着毛毛细雨。他打电话问空军司令，回答说大多数机场的天气都不宜于飞行。看来，胜利阅兵式将不会像想象的那么隆重。

然而，情况并非如此！莫斯科到处都洋溢着节日的气氛，人们正怀着高昂的情绪，在乐队的伴奏下，从四面八方涌向红场，以便参加这具有历史意义的游行。他们露出愉快的笑脸，举着大量的标语和标语牌，唱着歌曲，这一切形成了万众欢腾的景象。欢乐的浪潮和祝贺战胜法西斯的“乌拉”欢呼声，把游行队伍及受阅部队联结在一起。这种团结一致，使人感到苏维埃国家有一种不可战胜的力量。

差3分10点时，朱可夫已在斯帕斯基门附近骑上大白马。

朱可夫听见受阅部队首长罗科索夫斯基发出的清晰的口令声：“受阅部队，立正！”随着响起了一阵掌声。这时，时钟正敲响了10点。

自然，朱可夫心情是紧张而激动的……他骑着马向红场走去。传来了格林卡《光荣颂》的庄严而雄壮的乐曲声，它使每个俄罗斯人的内心感到无比亲切。忽然，乐曲声和欢呼声都停了，又是一片寂静。这时，响起了阅兵总指挥、苏联元帅罗科索夫斯基作报告的清晰的声音。显然，他的激动程度也不亚于朱可夫。他的报告吸引了朱可夫的全部注意力，使朱可夫顿时平静了下来。

呈现在朱可夫面前的是各部队的军旗，它曾鼓舞部队彻底战胜了敌人；战士们经受过战火磨炼的英雄的面孔，和流露出欢乐心情的眼睛，战士们穿着新制的军装，战斗勋章和奖章在军装上闪闪发光。所有这一切构成了一幅动人心弦的、令人永远不忘的景象。

在这举国狂欢的时刻，祖国的许多忠实儿子，在同万恶法西斯匪徒的战斗中光荣牺牲了，他们未能活到这欢乐的一天，活到庆祝胜利的这一天。

当朱可夫元帅在检阅部队和向部队问好时，雨水在军人的帽檐上直淌，然而大家的情绪是如此高涨，仿佛谁也不曾注意到这一点。

当英雄的团队从列宁陵墓前通过时，大家特别的兴奋。走在各团队前头的，是在同德军作战中战功赫赫的将军、兵种元帅和苏联元帅们。

随后，200名老战士在隆隆的战鼓声中，把200面法西斯德军的军旗投到了列宁陵墓的台阶下，这时，无比欢乐的情绪达到了顶点。

让法西斯分子和军事冒险家永远记住，不能战胜俄罗斯人民正如不能毁灭太阳一样。

胜利阅兵式结束后，政府为阅兵式的参加者举行了盛大招待会。出席招待会的有党和政府的领导人、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成员、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人民委员、著名的军事家、科学家、艺术家、文学家，以及工、农业方面的著名人士。

当胜利阅兵式的参加者各自返回工作岗位以后，庄严的阅兵式和克里姆林宫热情的招待会的印象，仍留存在他们心中久久不忘。

回到柏林后，朱可夫元帅代表苏联军队向美国人、英国人和法国人建议在柏林也举行一次庆祝战胜法西斯德国的阅兵式，得到了他们的同意。苏军和同盟国军队的阅兵式，决定9月份在国会大厦和勃兰登堡门附近举行。因为1945年5月1~4日，苏军攻克柏林的最后战斗就是在这里进行的。

经与盟军商定，阅兵首长由苏军、美军、英军和法军的总司令共同担任。参加柏林阅兵式的，有各国的陆军各兵种的部队。空军和海军部队因距柏林太远，故决定不参加。

阅兵时间临近了。苏军做了十分仔细的准备。苏军尽量让那些在强击柏林以及敌人主要抵抗基点——国会大厦和帝国办公厅建立有特殊功勋的士兵、军士、准尉、军官和将军参加柏林的阅兵式。一切都是按照与同盟国商定的办法进行的。

但是在阅兵的前一天，盟军突然通知，各盟国军队的总司令由于一系列原因，不能来柏林阅兵，而已委托他们的将领出席。

于是，朱可夫立即打电话给斯大林。报告这个变化。

“他们想贬低反希特勒同盟各国军队的阅兵的政治意义。你等着瞧吧，他们还会耍新花招的。各盟国军队总司令拒绝出席，没有关系，你就担任阅兵首长好了，何况我们在这方面比他们有更多的权利。”

反希特勒同盟各国军队的阅兵式于1945年9月7日准时开始。参加阅兵式的，有曾强击过柏林的苏军部队，以及到西柏林各区来执行占领勤务的美军、英军和法军部队。

在乘车巡视了排列着的受阅部队后，朱可夫发表了讲话，在讲话中赞扬了苏军和同盟国远征军的历史功勋。

成分列式通过主席台时，苏军步兵、坦克兵和炮兵的队伍非常整齐。苏军的坦克和自行火炮给人以特别深刻的印象。各盟国军队中，队列训练较好的是英国军队。

在举行阅兵式的地方，聚集了近两万柏林市民。这是象征着反希特勒同盟战胜法西斯血腥侵略的庆祝大典。

第十二章 苍凉岁月

苏联的历史翻开了胜利的篇章。莫斯科满怀喜悦地跨进了 1946 年。克里姆林宫斯巴斯塔顶的红五星在熠熠闪光；红场和大街小巷都穿上了节日的盛装，红旗招展，在各个重要场所都可以看到大元帅斯大林的醒目画像；到处可以听到悦耳的歌声，到处可以看到人们幸福的笑脸。这一切都意味着和平的新时代已经开始了。

当时，朱可夫还在柏林军管会。有一天，斯大林给他打来电话，征求他的意见。

“朱可夫同志，蒙哥马利和艾森豪威尔都应召返回英国和美国了，你是否也应该回莫斯科？”

朱可夫立刻回答斯大林说：“我同意回去。我建议由索科洛夫斯基大将接替我的工作，因为他最了解管制委员会的工作，并且也熟悉部队情况。”

“好吧，我们研究研究，你等待指示吧！”说完，斯大林就放下了电话。

这时，沉浸在战后胜利喜悦中的朱可夫哪里知道，在他的头顶上已经阴云密布。莫斯科正召开会议研究代替他赴德国的人选，也在讨论他下一步的职务。按战功和指挥才能，应该说朱可夫是国防人民委员的当之无愧的最佳人选。可是斯大林对朱可夫进入柏林后擅自做主，和盟军艾森豪威尔打得火热，搞易北河会师，造成东西柏林等后果，十分不满，于是下决心要贬谪他。

几天后，斯大林打来电话通知朱可夫，政治局经研究同意由索科洛夫斯基接替朱可夫的职务。接着斯大林又以试探的口气说：“还有一个问题，我们决定撤销第一国防人民委员这一职务，而设常备副国防人民委员。这个职务由布尔加宁担任。华西列夫斯基担任总参谋长，库兹涅夫担任海军总司令。你想担任什么职务呢？”

朱可夫，作为一个军人，从来认为，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所以不假思索地立刻回答：

“我可以在党中央委员会认为我最适宜的任何岗位上工作。”但此时从斯大林说话的语气中，使他疑团密集心中倍感悲凉。

“按照我的意见，你应当负责陆军的工作。我们认为，陆军应有一个总司令。你不反对吧？”斯大林言不由衷地说。

“同意。”朱可夫立刻回答。

“很好，同布尔加宁、华西列夫斯基一同回莫斯科，先在各自的职务上同人民委员部领导成员工作一段时间。”

1 坠入深谷

1946 年 4 月，朱可夫踌躇满志地告别了柏林市，告别了生死与共的战友们，回到了苏联去迎接命运的无情挑战。

朱可夫深知，在硝烟弥漫和枪林弹雨的战场上，他可以驾驭战争，运用自如，可在政治斗争的漩涡中并不如他在军事上指挥打仗那样能运筹帷幄、稳操胜券。特别是他那种敢于坚持真理的倔强、豁达的性格，

大胆果断的处事作风，再加上独特和创造性的工作方式，使他与斯大林本人贯有的武断专横、沉醉于个人崇拜的作风难以相融。

4月10日，朱可夫离开柏林，回国就任苏联陆军总司令之职。可是到了7月份，《真理报》却莫名其妙地刊登了一则消息：“朱可夫被调到敖德萨军区，担任一个不重要的职位。”这则消息传开以后，外界的传闻和猜测沸沸扬扬。有的说，朱可夫由于骄傲自满，和斯大林顶撞失去了斯大林的信任；有的说他看不起国防部长布尔加宁一心想当国防部长；也有人认为朱可夫不存在失宠的问题，他另有重任派往中国，帮助中国共产党解放全中国；还有的说，朱可夫被派到敖德萨，是为了向伊朗、中东和希腊进军做准备。艾森豪威尔得知老友朱可夫突然隐没，他分析道：“人们对于他实际上已不公开出面所推测的原因之一是：他与我有人所共知的友谊。我不相信这是原因。因为尽管有这种友谊，但是他似乎始终深信共产主义学说根本上是正确的。他知道我是共产主义的不共戴天的敌人，因为我认为它是独裁的同义词。我向他说，我憎恨每一种有国家统治主义味道的东西，我们整个西方传统就是献身于个人自由的观念。我说这些时，他总是耐心地听着。但他自己对共产主义的坚信，似乎是出自内心的信念，而不是由于任何外界的强迫。”他意味深长地说：“我们既是朋友，又是敌人。”

随着时间的推移，真相逐渐大白于天下。朱可夫突然被贬，据说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功不该盖主”，战争结束后，斯大林作为最高统帅，他在取得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中的作用和地位是绝对不能受到威胁的。以专断著称的斯大林不能容忍他周围的人因名望太高而喧宾夺主。这正如在朱可夫当时出席的一次党的会议上所发生的情况那样，会议主席粗暴地大声对朱可夫嚷道：“我们胜利的功劳不属于你，而属于党及其领袖！”；二是朱可夫对于斯大林贪天功为己功，把战争的胜利完全归功于他自己的天才，越来越轻蔑，以至到了十分厌恶的程度，在一些场合他公开流露了这种不满情绪。秘密警察把朱可夫的言论报告了斯大林。三是朱可夫历来主张一长制，轻视党和政治工作在军队中的地位和作用。在战争时期，斯大林曾对坚持搞一长制的朱可夫做了让步，在军队中取消了政治委员。现在斯大林再也不能容忍朱可夫那排斥党政工作的态度。另外斯大林还有一个用意即撤去朱可夫的重要职务，可以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从而吓唬住那些不听召唤的将领们，使他们始终与自己保持绝对一致。事实证明，斯大林的这一手是成功的，在之后的多年中，苏联最高统帅部始终处于安分守己明哲保身的状态。

当朱可夫离开仅仅坐了三个月的陆军总司令的交椅后，顶替他的是与他有宿怨的老对手科涅夫，科涅夫取代朱可夫喜出望外，可朱可夫则感到愤懑和不平。

斯大林这时对朱可夫的态度非常恶劣，他极力贬低嘲笑这位被他当年称作为“胜利的象征”的副统帅。赫鲁晓夫在1956年的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上详细披露了斯大林对朱可夫的攻击和谩骂，他说：

“更为可耻的是，在我们付出了巨大代价，取得了伟大胜利之后，斯大林开始将许多对取得胜利有很大贡献的指挥员加以贬低，因为斯大林把在 frontline 取得的成就完全归功于他自己，而不许归于任何别人。”

“斯大林曾经对朱可夫同志作为一个军事领袖应如何评价很感兴

趣。他时常问，我对朱可夫的看法。于是我告诉他，‘我认识朱可夫已经很长时间了，他是一个优秀的将军，一个优秀的军事领袖。’”

“战后，斯大林开始讲些关于朱可夫的各种无稽之谈，例如他说：‘你曾经赞扬过朱可夫，但是他不值得赞扬。据说在每次战役开始之前，朱可夫总是做出这样的动作：他取一把泥土，嗅一嗅，然后说——我们可以开始攻击，或者相反地说——原来计划的战役不能进行。’当时我就问：‘斯大林同志，我不知道这是谁捏造的，但这是不真实的。’”

“可能是斯大林自己捏造了这类事，为的是要贬低朱可夫的作用，低估他的军事才能。”

走倒运的朱可夫万万没有想到，1946年的失意还不是他下坡路的终点。他在敖德萨住了两三年后，又被调到乌拉尔军区更为低下的工作岗位，对他而言，这更是雪上加霜。

朱可夫这一次的落难，起因于当时任苏联武装部队监察部长的戈沃洛夫元帅的报复。在战争年代，当列宁格勒被德军围困之际，作为最高统帅部代表的朱可夫与当时任列宁格勒方面军司令的戈沃洛夫在作战意见上发生过一些冲突。由于戈沃洛夫坚持自己的错误意见，朱可夫当时严厉地批评了他。对此，戈沃洛夫长期怀恨在心。当朱可夫走倒运、被贬谪在敖德萨任职期间，戈沃洛夫以监察部长的身份，对敖德萨军区作了一次视察。专门找朱可夫的碴子。回去后，打了一份小报告给斯大林，诬告朱可夫心怀不满，在下面散布流言蜚语，攻击斯大林同志。据说，这份视察报告对朱可夫极为不利几乎将他置于死地。于是朱可夫再一次蒙受了不白之冤。

这一时期对朱可夫这个不可一世的风云人物来说，恰似从峰巅跌到了谷底。他在精神上难以承受连续不断的打击，他要求离开他终身为之服务的军队。他的理由有三点：一是党和政府对他在军事上的成就一笔勾销，只字不提，这是不公平的；二是他经常受到秘密警察的盘查，使他失去了应有的自由，造成精神紧张；三是完全缺乏私生活，感到十分孤独。

朱可夫的要求如泥牛入海，杳无回音。此时，他的地位仍在继续下降，他的消息在新闻界也越来越少。根据斯大林的命令，他的照片从所有军队驻地拿掉了。他的私人朋友艾森豪威尔将军再也收不到朱可夫的信了。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朱可夫又开始逐渐露面了。就在朝鲜战争爆发的那个月，他回到了莫斯科，并且被通知出席最高苏维埃的一次会议。

1950年，在苏共第19次代表大会上，军人在中央委员会中的人数空前增加，朱可夫也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尽管此时朱可夫偶尔露面见诸报端，但是与过去相比，这种变化仍然是缓慢和微不足道的。总之，仍是寄人篱下，在斯大林的严密控制下，不让他过分出头露面，生怕他冲淡了斯大林的荣誉。

2 迎来复苏的春天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突然病故。随着斯大林的逝去，斯大林专

制的时代毕竟结束了，人们已经认识到应该超越这个伟人而跨入新的里程。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

3月6日凌晨，莫斯科电台宣布了斯大林逝世的消息。同一天，朱可夫被任命为国防部副部长，并同时负责苏联陆军部队。斯大林的去世和朱可夫的重新起用，在时间上安排得如此紧密，无论怎么说，朱可夫的重新发迹与斯大林的猝死这两件事发生在同一天绝非巧合。这是赫鲁晓夫为拉拢军界泰斗为其所用而精心安排的。

朱可夫回到莫斯科不仅使苏联军界获得了巨大力量，而且无须置疑这对当时稳定军心和民心也起到了良好的效果。斯大林去世后，苏联国内发生的第一件重大事件，就是贝利亚及其一批秘密警察官员由于篡党夺权阴谋败露而被捕。

贝利亚长期担任内务部长的要职，他是秘密警察的总头目。党和政府要员的一举一动，都在他们的严密控制之下，谁也无法逃脱他们的监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贝利亚掌握着他们的生杀大权。

贝利亚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不知有多少优秀共产党员和忠诚勇士惨死在他手下。

朱可夫也和许多人一样对贝利亚早有仇恨，他始终认为，1946年他之所以被贬职，祸根就是贝利亚派秘密警察诬告了他。

此时，贝利亚想趁斯大林的去世夺取政权的计划败露，赫鲁晓夫要趁机除掉他。朱可夫当然不想错过这一难得的报仇机会。他立即与布尔加宁、华西列夫斯基和部长会议主席马林科夫一起讨论对策，决定采取特殊手段，逮捕和处决贝利亚。

由于在莫斯科军区中没有可以信赖的部队完成这一极为重大而又极具风险的任务，他们秘密地从朱可夫过去驻防过的乌拉尔军区调两个绝对忠于朱可夫的近卫师来替换贝利亚的嫡系部队。

逮捕贝利亚的前前后后，全是赫鲁晓夫一手策划的。他决定由部长会议主席马林科夫出面，预定于6月26日在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动手。

贝利亚不同于一般的人，他是秘密警察的总头目，是老牌克格勃，克里姆林宫内的武装警卫队由他领导，主席团的卫兵都是忠于他的。每次召开会议，他的随从都会坐在会议室隔壁的房间内。所以要逮捕他，相当棘手，一旦走露风声，后果不堪设想。

赫鲁晓夫只能依靠军队帮忙。开始，赫鲁晓夫让莫斯科军区空军司令员莫斯卡连科和另外5位将军执行拘留贝利亚的任务。后来，经马林科夫建议，又把参与此事的圈子扩大，其中包括朱可夫等10位绝对可以信任的将帅。

按内务部原来的规定，所有的军人在进入克里姆林宫时一律不准携带武器，并受到严格检查。这次会议之前，布尔加宁出面破例允许元帅和将军们随身携带他们的腰佩武器。

会议按预定计划召开。朱可夫等10名将帅躲藏在隔壁房间内，只等马林科夫发出信号，他们就一起动手。

这次会议从表面上看与平时没有什么两样。会议开始前10几分钟，贝利亚大摇大摆地走进会议室。但是赫鲁晓夫和马林科夫装作若无其事，和贝利亚打招呼，会议刚开始，马林科夫便突然宣布：“我们现

在讨论贝利亚的问题。”当时贝利亚紧挨在赫鲁晓夫的右边坐着，贝利亚一看风头不对吃惊地张大嘴巴，紧接着抓住赫鲁晓夫的手，疑惑地问道：“尼基塔，你们想干什么！？”

赫鲁晓夫便法官宣判似地厉声回答：“注意听吧，你很快就会知道的！”接着他就发言，历数了贝利亚的罪恶活动和阴谋企图。接着伏罗希洛夫和布尔加宁和与会的每一个人都发言用大量确凿的事实谴责了贝利亚充当英国间谍，里通外国的罪行。

按事先安排好的计划应由马林科夫总结并宣布对贝利亚的处置，但是事到临头，马林科夫临场由于心情紧张不知所措，致使会议长时间地停顿。贝利亚利用这个空隙将手伸向他放在室小桌的公文包。赫鲁晓夫见势不妙，立即使劲地按了一下秘密电钮，向隔壁房间发出了信号。

朱可夫等将帅立刻冲进会场，用手枪对准贝利亚，并从他手中夺下公文包，打开一看，里边恰有一枝白朗宁手枪，子弹已上膛。

马林科夫用一种微弱的声音向朱可夫说：“作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我要你们把贝利亚先关进监牢，以待调查对他进行的控诉。”

朱可夫怒视贝利亚，大声喝道：“举起手来”随后，所有元帅和将军们都打开了他们的手枪皮套，以防贝利亚的反抗。贝利亚及其同伙一开始被秘密关在莫斯科军区院内“魔窟”里，直到1953年12月24日才宣布对他们处以死刑。

贝利亚事件后，朱可夫被提升为党中央委员会的正式委员。揭露和处决刽子手贝利亚以后，朱可夫在军队地位才得到彻底恢复。1955年，连一级取消了政治军官的职位，取而代之的是一长制的推行。

朱可夫元帅从来没有动摇过“军事一长制”的立场。他始终认为，国家的文职当局必须放手让军事首长来处理部队的事务，而不要让政工干部来干涉。他痛恨那些不正派的政工人员，“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在朱可夫这一坚定而又大胆的观念指导下，苏联的军事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军事指挥员再次成为惟一出头露面的显赫人物。

1955年2月，朱可夫接替布尔加宁的职务，担任了国防部长。

1956年1月，在莫斯科军区一次党的会议上，朱可夫极力强调要维护军事首长的特权，他说：

“在莫斯科军区，有人企图对司令的正式活动在党的会议上加以批评。这种企图是应该受到谴责的。我们的任务是对指挥员权力予以全面加强，对于严格要求部下的军官和将军要给予支持。”

后来，朱可夫在另一次政工会议上，他强调地说：

“宣传的任务不仅在于解释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理论，而在于要对实际工作的执行做出贡献。一个不懂得军事责任的政治官员，就不能应付他面临的各种任务”。1957年4月，苏共中央根据朱可夫的建议，公布了一项《对苏联陆军和海军中党组织的指令》。这份材料对党在军队中的地位，采取了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的办法。在具体指令中，却规定了“军事司令对军事训练和政治训练两方面都要负责，不容许在党的会议上对司令的命令和规定提出批评”。这一内容，显然是朱可夫思想的具体体现。

在朱可夫这种主导思想影响下，许多军事指挥员对政治学习、思想教育和党的领导越来越不感兴趣。他们都集中精力从事军事专业，掌握

新的、复杂的军事技术和探索未来战争的手段和方法。军队中的政治干部无形中受到了冷遇，人数锐减。政治机关的权限也受到限制，政工干部只是副职，是军事首长的助手。军队中政工干部的地位越来越下降了，使它的职能仅仅局限在政治教育方面。

朱可夫极力推行单一首长制，不管其最终目的是什么，但客观上则明显地削弱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否定了党的工作人员的地位和作用。这不能不引起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的警觉和不满，因为他自己的权威正是建立在党的各级权力基础之上的。但是斯大林死后，继承权的斗争还没有获得最后结果，朱可夫的支持还举足轻重，赫鲁晓夫不会为此与朱可夫摊牌。相反，他对朱可夫给予了最大的尊敬和特殊的待遇，并将他选进最高苏维埃主席团。

随着朱可夫地位的上升，他在军队中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他的思想得到了最有效的贯彻。

根据现代战争的发展趋势，朱可夫决定加速发展远程航空兵，加强空军远程攻击力量和核武器力量。与此同时，他也强调大规模的陆上作战的重要性。他说：“空军与核武器本身并不能决定武器冲突的成败。尽管原子武器和氢武器具有巨大的破坏力，在战役中不可避免地还要使用大量陆军部队和大量的常规武器与之相配合。”

朱可夫担任国防部长以后，不仅经常发表文章，照片也多见诸报端，所有重要会议和事件，都少不了他的身影，在党的主席团中他也常居显要位置。他似乎已成为苏联的政治领袖之一。人们注意到，在他之前还从来没有一个职业军人能在政治上升到如此高的地位。

3 陷入政治斗争的漩涡

1956年，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做秘密报告，彻底揭露斯大林搞肃反扩大化造成的严重后果，攻击斯大林的独裁与专断，使他获得了不少政治资本。赫鲁晓夫不仅否认了斯大林在军事上的天才神话，而且把许多荣誉归还给了那些著名的军事将领。

赫鲁晓夫采用实用主义的政客手法，肉麻地献媚和别有用心地拉拢朱可夫，他拍着胸膛大声疾呼：我从来都反对斯大林对朱可夫的谴责和贬谪，我始终把朱可夫当做忠实的朋友……”

朱可夫也投桃报李。1957年4月，他帮助赫鲁晓夫清除了马林科夫集团，使赫鲁晓夫稳固了自己的权力。然而，随着个人权力的巩固，赫鲁晓夫对这位功高盖主的老元帅不放心起来，特别是朱可夫不断地在报纸杂志上发表文章，表白他在卫国战争历次战役胜利中的重要作用，更引起了赫鲁晓夫的猜忌。

“朱可夫想干什么？”这个问题不断在赫鲁晓夫的脑子里打转转。

“不管怎么样，不能让朱可夫为所欲为。”赫鲁晓夫暗下决心。

正当朱可夫沉醉在频频喝彩声中，稳稳地站在权力阶梯顶点的时候，可怕的厄运已悄悄向他走来。

他的这一切荣耀和权力，立刻又像烈日下的雪人一样，融化得无影无踪。

1957年10月，当朱可夫正按原定计划在国外进行访问时，赫鲁晓夫

的秘书却突然给他打去电话说：“赫鲁晓夫同志要元帅您直接飞返莫斯科。因为定于11月7日革命节40周年时举行盛大的军事检阅，有许多事情等着您回来处理。”

朱可夫认为赫鲁晓夫的要求似乎在情在理，便欣然同意。他根本没有想到赫鲁晓夫早已经在莫斯科为他设好了陷阱。

此时，赫鲁晓夫正在秘密召开一次不寻常的会议，决定朱可夫的命运。

在会议上，赫鲁晓夫明显地表现出对这位国防部长的力量和声望的惧怕，但他又没有足够的依据和勇气把这位重臣拉下马。他打算用明升暗降的策略把朱可夫提升到部长会议副主席的岗位，从而剥夺他对军队的控制权。

朱可夫被从机场直接接到主席团会议室。在主席团会议上，当他得知赫鲁晓夫的打算后，他面孔涨得紫红，脖子直挺挺地梗住了，双眼射着愤怒的光，死死地盯着眼前赫鲁晓夫那圆滑的胖脸。他猛然间有种受骗上当的耻辱感，怎么也难以相信，4个月前，正是由于他的保护和支持，赫鲁晓夫才免除了灭顶之灾。可是转眼之间，赫鲁晓夫却翻脸不认人，向他狠狠捅了一把“软刀子”。“这大概就是政客们常玩儿的把戏……”他在心里默默地猜摸。

朱可夫越想越气，怒火中烧，他断然拒绝对他的“提升”意见，于是双方开始摊牌了。辩论的时间很长，双方各不相让。但对朱可夫来说，这一切早已无济于事。

赫鲁晓夫早有预谋，在朱可夫返回莫斯科6小时以后，塔斯社发表了一项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会议公报，公报说：会议任命苏联元帅罗季翁·雅科夫列维奇·马林诺夫斯基为苏联国防部长。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免去苏联元帅格奥尔基·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的国防部长的职务。不到1小时，莫斯科电台在晚间新闻节目中广播了这一消息。第二天早上，《真理报》也刊登了这则消息。立时，这一新闻传遍了世界各地。

“朱可夫出了什么事？”围绕朱可夫的沉浮，一时间人们议论纷纷。

一周后，赫鲁晓夫在一次外交场合向记者透露说：

“朱可夫还活着，并且身体很好，我们将给他安排别的工作”。当记者进一步追问时，赫鲁晓夫又说：“我们对他的新工作还没有最后确定，但他将得到一个合乎他的经验和资历的工作。”为了增强他这番话的可信度，赫鲁晓夫补充说：“我今天还看见了朱可夫元帅。我同他谈了话，他的身体很健康。”

赫鲁晓夫还极为隐晦地向记者打了个比方，他说：“就一个生命来说，一个细胞死亡，另一个细胞代替它，生命才能继续下去。”

在苏联公布朱可夫被免职的公报之后的一个星期里，朱可夫和赫鲁晓夫在中央委员会内展开了一场权力之争。但是，朱可夫毕竟势不力敌，他在政治舞台上又一次遭到失败。

在新任国防部长马林诺夫斯基的控制下，《红星报》不指名地说：“一个高级军人”被他自己成功的军事经历迷住了心窍，他为此犯了严重的错误，受到了党的严厉制裁。同时，海军杂志《苏维埃舰队》也旁敲侧击地批判朱可夫说，那些大模大样的军事领袖们贬低政治机关在军

队生活中作用的企图，必须加以严厉谴责。同时申明，“不论一个共产党员的级别多高，如果玩忽职守，必须在党的会议上对他加以批评”。

他们指责朱可夫失去了党员应有的谦虚，自认为是取得一切战争胜利的惟一英雄。他辜负了党对他的信任。在与朱可夫的斗争中，赫鲁晓夫成功地利用原来与朱可夫相处在一起的同事们，有些甚至是朱可夫亲自提携起来的亲密战友和部下，如罗科索夫斯基、索科洛夫斯基、扎哈罗夫等人，让他们出面来批斗朱可夫，异口同声地声讨他。

这种有组织的、大范围的批判，对朱可夫元帅的自尊心和心灵是一次十分深重的摧残。他开始变得心灰意冷了。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他竟自己投票赞成把他从主席团清除出去。大会投票表决的结果是一致同意取消他的主席团成员和中央委员的资格，同时他也失去了国防部长的职务，而惟一保留下来的是他的党员资格。最后他被宣布退休，并且可以得到每月 5 500 旧卢布（约合当时 1357 美元）的养老金。

第十三章 不灭的巨星

1 一个最普通的人

驰骋沙场数十年，戎马一生，二战中立下赫赫战功的国防部长，苏联元帅朱可夫，在他还有能力报效祖国献身国防事业的年龄，一夜间被贬为庶民，成为领取养老金者。这对性格刚烈的朱可夫来讲，无疑是个非常沉重的打击。然而，他又是个意志坚强的人，任何逆境都不能使他倒下。

朱可夫过去作为国内外许多重大事件的核心人物，在众多荣誉面前和伟人的光环下，他个人的情感和私生活被淹没了。被淡忘了。是的，过去他太忙了，无暇照顾家庭，甚至无暇享受那本该属于他自己的人间温情和爱。现在，他退了下來，让我们随着他个人的回忆，去揭示朱可夫作为最普通人的内心感情世界。

朱可夫年轻时有过最纯真的初恋，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硝烟隔断了他的恋情，破灭了他初恋的美梦。

1922年，朱可夫在骑兵第38团当连长时，结识并爱上了该团的文书，一个文静的，年轻貌美的少女亚历山德拉·季耶芙娜。他们很快相爱，并在那一年成为伉俪。婚后生了两个女儿，爱拉和艾列拉。

朱可夫非常热爱自己的妻子，给她起了个别名叫舒莉（爱称叫舒莉克），而且一直这样亲切地称呼她。朱可夫作为丈夫，他善解人意，对妻子体贴入微，温情脉脉；作为父亲，他慈祥，对女儿们爱的深沉。他内心的感情世界是丰富的。他把对祖国的和对家庭的爱有机地融为一体。为了战胜敌人，使祖国和人民尽快摆脱战争带来的灾难和痛苦，使祖国昌盛、人民幸福，他呕心沥血，奉献了全部智慧和力量。

朱可夫博览群书，除了博览从恺撒到克劳塞维茨；从苏沃洛夫《制胜科学》到中国《孙子兵法》等军事理论著作以外，他还爱读文艺作品。他非常欣赏俄罗斯文学之父普希金、莱蒙托夫的优美诗篇，也牢记了匈牙利诗人裴多菲这样铿锵有力的诗句：

生命犹可贵，
爱情价更高。
若为自由故，
两者皆可抛。

战争年代，朱可夫南征北战，席不暇暖，转战在最艰苦和最危险的战线，出生入死，奔走在枪林弹雨之中，一天要工作“48小时”，每根神经都绷得紧紧的，连睡觉的时间都没有，因此，很少给家中妻子、女儿写信，他把这种深沉的爱埋在心底。因此，家书是有限的，而保存下来的就更少。

这里有仅存的三封信是写给妻子的：

我的亲爱的！
向你问好。让我紧紧地单独来吻你一个人，让我们共同来亲吻我们的孩子们。

谢谢你的来信，谢谢你寄来卷心菜、越橘以及所有的东西。谢谢你的一片深情。

应该说，我们的仗打得不错。统帅部拟定的所有战役都完成得很好。

应该说，希特勒一定会彻底垮台，我们祖国一定能胜利，苏军一定能胜利。

总的说来，前方都能完成自己的任务，现在的问题是在后方，后方有很多工作应该要做，为了保证前方的需要，后方应该很好地学习，在精神上应该坚强，那么胜利将一定属于俄罗斯。紧紧地、紧紧地吻你。”

另一封信（1943年10月5日写给妻子的信）：

亲爱的舒莉克，您好！我向您问候，紧紧地吻您。拥抱和紧紧地吻爱洛契卡和艾尔洛契卡……

我给你们寄了一点葵花籽。在你们没事的时候，最好是嗑嗑葵花子。

我寄回一件穿着暖和的女短棉大衣，是大翻领，希望你能喜欢。若能配件轻软的高领绒衫会更好。

我们的仗打得不错，我们要攻占第聂伯河。德国人虽然想千方百计地扼守住第聂伯河，但是，他们是办不到的，我仍然坐吉普车到各个集团军去，我不愿坐火车，很明显，我这个人性格就这样，在野外能接触大自然，时时有微风拂面，令人心爽。到了部队，在那里我就更是如鱼得水了。

我的健康是不错的。我的听觉不大好。需要治一治耳朵，可惜暂时不能够安排。有时候，头和脚也有点痛。嘶，这就是我暂时想给您写的一切。

我祝您和孩子们健康。紧紧地、紧紧地吻你们大家。

还有一封是同年10月23日写给妻子的信：

我亲爱的舒莉克，您好！我向您致以由衷的敬意，紧紧地吻您。我向爱洛契卡和艾尔洛契卡问好，请代我吻吻她们。

您的信我收到了，为此我要格外地热烈吻您。寄来的内衣收到了。这件睡衣令我捧腹大笑，因为穿上它，我活像玛特琳娜或者是阿克琳娜。

在前线，我们的战斗目前进行得很好。说实话，在有些地段发生过一时的不利，但是，在这样进军中，有些失误，这是不可避免的。本想更快一些结束基辅战役，那时我会来莫斯科，但是暂时遗憾地延迟了。

我的健康仍然是时好时坏。不知为什么，我的脚现在又痛起来了。我想来莫斯科稍微治一治。耳朵的可听度仍然像以前一样，耳鸣暂时还没有消失。很明显，人到了老年（朱可夫当时才46岁！）什么病都会找上来的；但是别惦记我，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从上边那简短三封家书中，我们窥探到朱可夫对妻子的一片深情和对女儿们由衷的爱。

朱可夫非常关心孩子的学习进步，大女儿爱拉1947年考入大学后，朱可夫定期打长途电话，询问她的学习情况，了解她交往的朋友、爱好兴趣，甚至了解她喜欢读什么作品，有些什么相法、思考什么问题，询问得十分仔细认真。当他知道女儿有了男朋友尤拉以后，并没有粗暴干预，只是劝她不要因为交朋友影响学业；“要集中精力，抓住重点，切不可因为交朋友而偏离重点，那将是得不偿失！”

朱可夫当时虽然军务繁忙，日理万机，但他还经常挤出时间认真检查女儿的作业，尽可能抽空教女儿游泳、射击、打猎、骑马。更值得一提的是想尽一切办法争取参加学校召开的家长会。他参加家长会可不是应点，而是十分认真，听老师对孩子的评价，看老师在孩子作业本上写的评语，积极发言，主动给校方提出合理化建议，得到校方的称赞。

孩子们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大女儿爱拉后来得了法学副博士学位，同华西列夫斯基元帅之子结婚。艾列拉也学有所成，后来同伏罗希洛夫的孙子结了婚。

朱可夫与他的妻子季耶娜·朱伊科娃，即他的舒莉克感情一直很好，可是由于朱可夫的坎坷经历，使她神经受了很大刺激，主动要求离异，朱可夫答应了她的要求，离婚后，朱可夫把分给他的城里那套政府提供的公寓让给了她，自己暂住到郊区别墅里。

与妻子的离异对朱可夫而言，又是一次沉重的打击。幸好，两年后一位比他年轻 25 岁的中校军医格林娜爱上了他。他们是在外出途中偶然相识的。他们十分投缘，彼此相处的很好。

婚后，格林娜又为他生了一个女儿，名叫玛沙。此时，朱可夫那颗早已冷却的心，似乎又从格林娜和新组建的小家庭中得到了温暖与慰藉。

2 永远是胜利的象征

退休后的朱可夫，多数时间住在莫斯科郊外的别墅里，这幢别墅是他任国防部长时由政府分配给他的，后来允许他保留下来。他以打猎、钓鱼和写回忆录打发余生。

赫鲁晓夫在为朱可夫突然下台寻找注脚时曾说：“一个细胞死亡，另一个细胞代替它，生命才能继续下去。”不过这一次不是给别人做注脚，而是轮到他自己了。

1964 年 10 月，在苏联，1957 年的历史令人吃惊地重演了，可惜这次再没有像朱可夫那样的铁腕人物来支持他赫鲁晓夫了。赫鲁晓夫正在格鲁吉亚的黑海海滨度假，当他心安理得地坐在海边钓鱼的时候，他一手提拔起来的最信任的勃列日涅夫等同僚们却在莫斯科秘密地商讨如何把这位老主子撵下台。

1964 年 10 月 18 日，苏联报纸宣布：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已“同意赫鲁晓夫的要求，由于年岁大和健康状况不佳等原因，解除他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等职务”。

赫鲁晓夫的下台，为恢复朱可夫的名誉扫清了障碍。

1965 年 5 月 8 日，勃列日涅夫上台，担任苏共中央书记并在克里姆林宫发表重要演说。当他提到了朱可夫的名字时，听众席上掀起了暴风雨般的热烈掌声且持续了 5 分钟，这反映出人民的意志和心声。第二天，莫斯科举行大规模的军事检阅。这时人们看到多年不曾露面的朱可夫正与布琼尼、伏罗希洛夫、铁木辛哥等几位元帅并列站在列宁墓前面。

人民群众满心欢喜地迎接朱可夫重新回到他们的生活中来。这一天，当他穿着元帅制服走在街上时许多退役军官，将元帅团团围住，同

他亲切握手，他感动得流下了眼泪。在晚间的招待会上，苏联军官争先恐后地向他敬酒，祝他健康长寿。

1966年12月，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为表彰朱可夫对军队的贡献和庆贺他70岁生日，授予他国家的最高勋章——列宁勋章。朱可夫受到了应有的尊敬和爱戴。为此，他写信给《红星报》编辑部说：“由于对授予我列宁勋章和对我的70岁生日的许多祝贺不能一一作答，请允许我通过《红星报》向所有组织、苏联陆海军军官们、预备队的将军们，以及一切公民们对他们的热烈祝贺表示我深切的、衷心的感谢，同时为了祖国的利益祝愿他们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颠倒的历史，又重新被颠倒过来，朱可夫在他的晚年又出现在人们面前，并且重新得到了本来就应该属于他自己的荣誉——他永远是胜利的象征。

3 荣获勋章最多的人

朱可夫元帅是苏军历史上，甚至是世界军史上荣获勋章、奖章和光荣称号最多的人。

只要你看看他胸前佩戴的那一大片辉煌夺目的勋章和奖章，你便会意识到他一生中创造了多少奇迹。每个勋章上都记录着他的赫赫战功，都体现了他的文韬武略和聪明才智，都表达了他对祖国、对苏联人民和全人类的杰出贡献；都表达了人民对他的尊敬和爱戴。

他在国内战争中，于1922年，在肃清安东诺夫反革命匪帮的战斗中，建立奇功，荣获第一枚红旗勋章；1936年，在西班牙前线出色地完成特殊使命，荣获第一枚列宁勋章；1939年，在哈勒欣河战役中，大败日本关东军，荣获第一枚英雄勋章；1943年，由于组织计划三大战役和十次打击有特殊贡献，两次荣获苏沃洛夫一级勋章；1944年4月，荣获“胜利”勋章；1944年8月，荣获第二枚红旗勋章和第二枚英雄勋章；1945年3月荣获第二枚列宁勋章；1945年6月由于柏林战役胜利，战败法西斯德国，荣获第三枚英雄勋章；1949年6月，荣获第三枚红旗勋章；1956年12月，由于支持赫鲁晓夫挫败马林科夫集团有功，在他60岁寿辰时，授予他第四枚英雄勋章；1966年，在他70岁诞辰时，荣获第三枚列宁勋章；1968年纪念建军50周年时，授予他十月革命勋章；在他75岁诞辰时，又授予他第四枚列宁勋章。朱可夫一生中共荣获15枚苏军最高级勋章，这是破纪录的。苏军有史以来，任何人也没有能够获得如此多的殊荣。

此外，他还荣获11枚奖章，其中：1938年，工农红军建军20周年奖章；1942年12月，列宁格勒保卫战奖章；1942年12月22日，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奖章；1944年5月1日，莫斯科保卫战奖章；1944年5月1日，高加索保卫战奖章；1945年5月9日，战胜德国法西斯奖章；1945年6月9日，解放华沙奖章；1945年6月9日，攻克柏林奖章；1947年9月20日，纪念莫斯科市建成800周年纪念章；1948年2月22日，苏军建军30周年纪念章；1957年5月16日，列宁格勒市建城250周年纪念章。

世界各国政府授予朱可夫元帅的勋章和奖章共有15枚，其中：蒙古

人民共和国授予的红旗勋章和共和国英雄称号；波兰人民共和国授予的一级“维尔杜奇·米利塔里”勋章；法国授予的荣誉军团勋章；法国授予的棕榈树十字勋章；英国授予的巴尼龙骑兵大十字勋章；美国授予的统帅级“功勋”勋章；捷克斯洛伐克授予的十字军功勋章；南斯拉夫的自由勋章；两枚波兰纪念章；意大利的游击队金星奖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苏友好”纪念章；埃及大军官十字勋章等。

在朱可夫元帅胸前佩戴的勋章和奖章共计 41 枚，加上第一个钮扣上佩戴的帅星，总计 42 枚。

朱可夫胸前那每一颗闪闪发光的勋章都表明了他对世界对俄罗斯祖国和人民的巨大贡献，都折射出他一生的伟大与辉煌。

4 不朽的丰碑

1974 年，朱可夫在自己家中，平静地闭上了双眼。一代帅星殒落了。但是，朱可夫作为“胜利的象征”，人们将永远铭记他的殊功伟绩。

战争给朱可夫提供了展示统帅才华的历史舞台，他凭借这个舞台导演出一幕幕惊天动地、气势磅礴、铿锵壮丽的宏伟史诗，创造了史无前例的赫赫战功，在人类战争史上写下了不朽的光辉篇章。

朱可夫元帅，一生虽然十分坎坷，步履艰难，三上三下，从门庭若市到空谷足音，从坠入低谷到迎来复苏的春天，但是，他无论处于巅峰，还是低谷，他都表现出大将风度和统帅胸怀，得势，不居功自傲；失势，不气馁悲伤，淡泊名利，泰然自若，严于律己，宽于待人，深受众人由衷的爱戴和尊敬。俄罗斯各界人士为了缅怀这位英雄，纷纷向政府提出强烈要求，希望在元帅当年举行过胜利阅兵的地方，为元帅建造一座纪念碑，永远寄托人们崇敬与哀思。国家杜马经表决一致同意，在莫斯科市中心红场革命博物馆前，建造这座纪念碑，请最著名的雕塑专家精心设计，用青铜铸造出朱可夫元帅横跨他心爱战马在红场上进行胜利阅兵时的雄姿。

这座纪念碑于 1995 年 5 月 9 日二战胜利五十周年前夕落成，供人们瞻仰。

其实，朱可夫元帅，用他的光辉的一生，不朽的业绩，早已在亿万人民心中建造起了一座非人工的纪念碑，在走向哪儿的路径上青草不再生长……